大時代文藝叢書

鄭振鐸
王任叔
孔另境
主編

橫眉集

孔另境
王任叔
等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文系

鄭振鐸　王任叔　孔另境　主編

大時代文藝叢書

橫眉集

孔王文周周風柯
另任載木黎
境叔道齋庵子靈
作者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橫眉集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孔另境　周木齋　王任叔　周黎庵　風子　文載道　柯靈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大時代文藝叢書序

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裏必須更勇敢，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如椽的筆，作爲刀作爲矛，作爲炮彈，爲祖國的生存而奮鬥。在這個大時代裏，文藝工作者成爲無量數的羣衆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於象牙塔裏的人物了。他要應用着他的特殊的技能與工具爲無量數的羣衆寫作，咏歌，演奏，呼號。他要貢獻他的一切給祖國；沒有例外，沒有躲避，沒有退息與閑暇。山林的清音告退，個人的牢愁靠後；不再歌頌愛情，不再讚美自然，沒有例外，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他必須負擔一切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與苦難。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因之，他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要爲祖國與無量數的羣衆在最黑暗的漫漫長夜裏擎起火炬，

照耀到天明。

在過去的無數世紀裏，偉大的文藝家們，沒有一個不是在苦難中生長的；沒有一個不是爲祖國而貢獻了他的一切的。孔子爲周與魯而殫其一生的力量；其道不行，則退而講學。Aeschylus 生在希臘與強大的波斯帝國作着生死鬥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家，同時也是一個出現於波斯戰役裏的勇士。西班牙的 Cervantos 也是一個戰士；他在被俘囚的時間裏寫作着不朽的 "Don Quixote." 屈原寫離騷，不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寫，他所反復叮嚀者只是『恐皇輿之敗績。』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憂天下』的。『自了漢』與禁閉在象牙塔裏的人物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當我們的祖國在作着生死鬥的大時代，一切文藝工作者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貢獻一切給我們的祖國；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躲藏，沒有例外。

這是一個開始。當天色明亮了的時候，當光明的時代到來的時候，Aeschylus 般的偉大作家們必定就會在苦鬥的一羣裏產生出來的。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在遠處了。』

耐得住冬天的寒冷與風雪的，就會見得到繁花如錦的春天。

不要在苦難前面退縮，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裏躲藏起來，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當全民族在經歷着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長夜裏，照耀到天明！

而天明已不在遠。東邊的天空已隱隱的顯出曙光了。Aurora 已經在飛翔，在向我們走來了。

我們這一羣文藝工作者們，力量雖然薄弱，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這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著，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是東方將曙以前的一羣叫曉的鷄鳴聲。

然而衆籟皆將響應。天色就要明亮。一個光明的大時代，就將到來。

以此自勵，並以勵人。

是爲序。

主編者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廿九日

序言

右雜感隨筆七家，都文一百十三篇。

文藝雜感是文藝工作者最警覺性的表現。魯迅先生已經有很偉大的業蹟，留給我們作模楷。從他數百篇的雜感文裏，反映了各時代的輪廓和特質，而同時也充分表現了作者對社會和政治的警覺性。我們這一羣，既無先生的博洽多聞，又乏先生的洞見卓識，所以作爲和先生同一發展而存在的時候，實在顯得非常淺薄和幼稚。雖然如此，在我們的每一篇文字中，仍包含着一個文藝工作者對社會和政治的警覺性。

在目前，文藝雜感的任務較任何過去的時代來得繁重，因爲牠不但要暴露和襲擊國內各階層的惡劣傾向，而且還得貧着剝露和擊刺國外侵略者的醜態和毒計的責任。也因爲此，所以每一篇文藝雜感的內容，必須是代表着純潔的正義的大衆的吼聲。

我們誠然是作爲一羣文藝雜感工作者而與社會相見，然而因爲生活的環境的限制，使我們

的體驗和聞見都十分狹隘，因此反映在這些篇裏的內容不免偏枯，我們誠摯地希望全國各地同道者來彌補這個狹隘的不足，使這一文藝部門能獲得全面的發展和遠大的前途。

收在這裏的七位作者，各人文章的風格都不一樣，有的率直顯豁，有的迂迴曲折；這些不能苟同的作風，卻無妨我們觀念的一致，因此我們就應了出版者的要求把它結集在一處，與讀者見面了。我們等待着賢明的讀者的指教。

本集命名「橫眉，」亦無深意。魯迅先生在他的「自嘲」詩中曾有兩句云：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我們自然沒有先生的涵養，所以「俯首」而爲「孺子牛」也許還不成；但橫一下眉總是可能的，而且這集子裏的文字也不免確有這姿態，因此太家就同意摘取了詩中起首兩字作爲集名。

至於篇什的說明，各有後記，不贅。

孔另境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

橫眉集目錄

孔另境作

論文藝雜感……三
「就義」種種……一一
人類的恥辱……一四
雜感和預言……一六
才和實……一九
嚼雪零感……二二
談懷舊的情愫……二六
談文藝與武藝……二九
談恩惠的贈與……三三

年 記……三九
後 記……五〇

王任叔作

自由談復刊獻詞……五三
略論刺激性……五六
從吐哺說起……五八
抽 思 一至八……六〇
超越魯迅……六七
曲的效顰……七〇
中國沒有「佛朗哥」……七三
略論王皙南的被槍決……七五
關於「邊鼓集」……七七

周作人先生的悲哀……八一
(附)關於周作人被刺……八二
斷章取義……八四
(附)關於周作人先生被刺……八六
略論叫化之類……八六
論「沒有法子」……九五
後記……一〇〇

文載道作

略論「瓜子文學」……一〇五
掃除逸民氣……一〇七
秋窗隨筆……一一〇
檢討……一一四

初寒隨筆……一一七
幽冥不隔喜悅的傳遞……一二〇
病後漫筆……一二三
「學而優則仕」……一二六
糾正與批判……一二九
國破山河在……一三一
說到「流寇」……一三四
槍與筆……一三七
踢走它……一三九
今與昔……一四三
閉眼與搔頭……一四六
從兩句舊詩說起……一五〇
後　記……一五四

周木齋作

坐實……一五七
「具有歷史意義」……一六〇
逢惡……一六一
算命看相者流……一六三
賣弄……一六四
男盜女娼……一六六
「誰會笑的，誰最後笑」……一六七
栽刀……一六九
飛渡……一七一
「固有精神」……一七二
望火止寒……一七五

需要批判論爭……一七七
樂觀和悲觀……一七八
游擊戰的雜感……一八〇
相提並說……一八二
流寇新義……一八四
吳佩孚的「三不主義」……一八八
凌遲……一九〇
取消的放大法……一九二
後記……一九五

周黎庵作

救火者的工作……一九九
血肉的演習……二〇一

文士的沒落……二〇三
勸　懲……二〇六
商辦祭孔……二〇八
時代與時代……二一〇
遺民今昔……二一二
救國的幫閑……二一六
戰爭和犯罪……二一九
新朋黨論……二二一
論「痛論焦土抗戰」……二二四
血……二二七
定命論者的寓言……二二九
略論王韓南夫人事……二三二
梁實秋的「自由」……二三五

順民之路……二三七
後　記……二四一

風子作

「和敵人一起倒下」……二四五
血寫的歷史……二四七
遣送回籍……二四九
所謂上海中立區……二五〇
粉碎敵人的計劃……二五二
我也爲傷兵請命……二五四
記念魯迅先生……二五七
文藝界的團結……二五八
九國公約會議……二六〇

爭取自由……二六二
感舊……二六四
禪理……二六六
從雜文得到遺教……二六八
「時代的悲哀」……二七一
剽竊和模仿……二七三
夜讀一章……二七五
急就艸……二七七
從「抓周」說起……二八〇
不通和不懂……二八一
懷曼殊上人……二八三
闢「兩亡論」……二八五
後記……二八八

柯靈作

招牌文化……二九一
讀報偶筆……二九三
「許案」漫感……二九四
看熱鬧……二九六
湊熱鬧……二九九
人生快事……三〇一
名勝之國……三〇三
英雄的今昔……三〇五
高爾基氏致孫中山先生的信……三〇七
債……三〇九
看錯了「病徵」……三一一

哀　調……三一五
過去未來……三一七
禁書詩話……三一九
算舊賬……三二一
一個高大的背影……三二二
焦土上的新芽……三二六
後　記……三二九

孔

另

境

作

原

书

空

白

页

論文藝雜感

【一】正名

近來「雜文」一語，馳騁文場，論辯駁雜，日有宗風，可見社會對之已甚重視，文場天地，得佔一席了。

可是一個名詞的設立，應該有所確指；一種文體的建立，也應以內容的統一爲標準。現在的所謂「雜文，」究竟是指那一類的文章，牠的內容如何？一般論者都是略過不提，讀者也大都隨聲附和，無暇去仔細揣摹。這情形，於「雜文」的發展實有害而無利，因此就大膽地來範疇一下，也是所謂「愛之欲其生」的微意吧。

所謂「雜文，」其實是不足爲一種文體的專名的，猶之從前雜志上有「雜俎」一欄，牠裏邊可以包括着序跋、書簡、墓誌以及詩、詞、歌賦，因爲名目繁雜，分量太少，不足分立欄目，於是統歸之曰

「雜俎」然而現在的所謂「雜文」其意並非如此，牠是指一種含有文藝性的政治和社會的雜感，我們覺得若被以「雜文」之名，實在有些不成話了。

現在有所謂「雜文集」這名詞是可以成立的，因爲牠裹邊包含着各種體裁的文章，猶之把出版的刊物名爲「雜誌」，然而倘將上述的文藝性雜感的文集而名曰「雜文集」就不通了，因爲內容實在並不「雜」，我們無論從牠的內容或形式上都可以找出牠的統一性來的，因之所謂「雜文家」一名——倘是指上述的寫雜感文藝的一般作家而言——也是不切實的。現在有一種人專把「雜文家」的帽子套在寫文藝雜感的作家頭上，意思彷彿譏笑他什麼正品都寫不來，只好寫寫不成品的雜文，是含有惡意的侮辱的。其實要是嚴格的說，那一個作家不是「雜文家」，誰生平僅寫一種體裁的作品，我們所謂「小說家」「詩人」者，無非以他的主要作品和寫的分量而言而已。所以被稱爲「雜文家」者大可不必氣憤，而給人戴帽子者的微意倒是落了空的。

其實是文藝性的政治和社會的雜感而名爲「雜文」是應該糾正過來的，所謂「雜文」該是指各種文體的綜合而言，爲容易使人理解起見，我以爲「文藝雜感」一詞最爲妥當，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乎「正名。」

【二】跡原

一種文體的建立，必有所自從，如曲之於詞，詞之於詩或賦，蛻變之跡可尋，而「文藝雜感」者，究何自而蛻變呢？查我國自來文體的分類，十分龐雜，要從這許多龐雜的分類中考跡牠的來源，實在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一般人認爲分類的最洽當的書，他把各種文體，分爲十三類，卽：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命、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照字面上看，也許「雜記」和「箴銘」近之，其實「雜記」乃是碑文之屬，爲記事之文，而「箴銘」一類，照姚氏說，則有一部分倒是稍近的，姚氏說：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意，其詞尤質，而意尤深。」

劉勰的「文心雕龍」上說：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貴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照此說來，則文藝雜感實含有箴銘之意在內，而劉氏所說的「文資确切」「體貴弘潤」和「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擒文也，必簡而深；」確爲文藝雜感的必要法則。然而文藝雜感究竟並非是「誦於官」或「題於器」的東西，牠是要給大衆讀的，有「箴」和「銘」的意思在內，然也不完全是「箴」和「銘」，牠裏邊也含有「論」和「辨」的，而且更有「議」和「難」的，可是我們倘把它入於「論辨」一類，又覺不倫，因爲「論辨」是屬於政治社會的時論，其中並無半點文藝氣味，而文藝雜感卻究竟是文藝的一部門。總而言之，我們若必要附會，則內容頗有些似「箴銘」和「論辨」，而形式則就「於古無徵」了。

我以爲這一種體式，於古雖無足徵，於近頃半世紀卻頗可一說的。

清代學術的中心是樸學，樸學是一種訓詁之學，牠所以興盛的原因，乃是清代文網之禍的結果。士人既迴避政治乃不得不從故紙堆中求生存。及其末造，政治日愈腐敗，國勢日愈凌替，於是前之拒漢人於千里外者，至此卽不得不稍假寬容。經太平軍後，前之不許漢人插足之軍權，至是全落入漢人之手，於是漢人在政治上的勢力也日漸發展，繼之卽有戊戌政變發生，政變之中心人物如康梁，卽爲一介文士，他們的政論文章，風靡全國。當時，寫政論文章的這般人，其實都並非政治家而

是學者，對於文學都是有着極高深的造詣的，如梁啓超的政論文章，嚴幾道的時事評論，清鬆流利之外，還包含有極濃厚的情感氣氛，讀之往往會使人忘卻是一篇嚴肅的政論，故雖數千言的長篇也自不覺其沉悶。像這樣的文章，在政論中固別開一生面，在文學上實亦有其地位。浸潤日久，漸漸造成了一種文章的風格，牠在論說文中雖覺組織欠嚴密和整飭，然在散文中卻覺別具風韻，浸潤日久，從之者衆，此後文人之對政治或社會有所發洩者，無不受此風格的影響。

稍後，文學革命發生，刊物之出版風起雲湧，如新青年，如新潮，都是當日最受社會歡迎的中心雜誌。因爲五四運動，並非是純粹的文學改革運動，乃是一般的社會和文化的改革運動，故反映在當時刊物中的，也往往是對社會多面的探討。在各種雜誌中，除了長篇論說以外，幾乎都另闢有「雜感」（名目則各有不同）一欄，這一欄的文字大都短小精悍，一針見血之言，對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給予無情的攻擊和譏刺，或明嘲或暗諷，其行文或質直或屈曲，現在我們從魯迅最早的雜感集「熱風」中還可看見這類文字的面目。

文藝雜感的泉源，稍遠我們可以追跡康梁的政論，略近則五四以來的「雜感」實爲其胎。不過現在的文藝雜感並不就和五四時代的雜感相同，牠還是有所改變和發展的。這祇要一看魯迅

先生的十多本雜感集就可看出這個變化之跡來的。大致在去今較遠的，文多率直，去今愈近，則文愈屈曲而澀晦，這原因可分爲兩方面說，一方面自然是隨政治環境允許給文人說話的自由的限度而不同，一方面則爲這一種文體的本身的發展和進步，而這兩者又實相成，因政治環境的不自由，使說話者不能不有所顧忌，因此作者要表達他的意思就不得不更技巧地來說，使統治者無所藉口，同時卻同樣達到作者的目的，這最好的方法莫如多用暗示，而暗示本爲文藝構成的一種要素，暗示愈多，文藝性也愈濃，結果就形成了借了文藝的手法達到了政治和社會的諷刺了。

【三】 發展之路

一種文體的發生和發展，必有其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存在。造成文藝雜感發生的，在客觀方面是對社會的指摘和暴露的需要，在主觀方面則爲文學者對於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關心和興趣。兩者相成，乃有成就。文藝雜感至今日，無可諱言已有甚大之發展了，然謂已發展至極峯，則亦未必。

在這方面最大的成就，自然要推魯迅先生。他一生十數本的雜感集，幾乎可代表了過去整個

文藝雜感的業績。從這些業績裏，我們不但可以追蹤出文藝雜感的發展之跡來，而且還可以使後繼者學得許多技巧和方法。

以內容說，文藝雜感的發展至今已入第二階段，這界限以抗戰的發生劃分。在這以前，作爲文藝雜感的內容的，是對統治者的攻擊和嘲諷，對社會惡劣現象的暴露和指摘，對新生中國的願望和鼓勵，對進步勢力的督責和宣傳。自從抗戰發生，全國民衆和各黨派團結成民族統一戰線，於是前之將統治者和自己劃分爲兩個階級的，至此已混而爲一，前之攻擊和敵對，現時已變爲擁護，前之將新生的中國僅作爲願望者，今已因抗戰建國而漸漸實現，故此時的文藝雜感的內容，勢必和以前完全異趣了。自然，文藝雜感的對象有許多還是繼續存在着的，如社會的腐化惡化勢力，統治者中的若干成分的不健全性，不過作爲主要的對象的顯然已另有所指了，那就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和一切漢奸的行爲。這些內容的更變，使文藝雜感跨上了一個新的階段，這階段自然並非永久的，會隨歷史的進展而有改變。在這階段中，我以爲文藝雜感的任務，應以襲擊性爲主，而輔以暴露。因爲在這個時候，無論國外和國內的敵人，已經十分明顯，而且他們已成爲全國一致的敵人，對於這般人，我們已無用其譏嘲或諷刺，只有給他們無情的剝露和襲擊，才能置他們於死地。

隨內容的更變，形式上也可以劃分着同樣的兩個階段的。不過在前一階段中，形式的發展還是有些變化的，最早的雜感大概比較來得質樸一些，文章的結構和文字的技巧大都不甚注意，文章往往近於隨筆，如把魯迅先生的「熱風」和以後的「僞自由書」等一較，則前者質樸得多了，我們要是以文藝雜感的標準尺度去衡量，自然後者較前者爲高，但此乃一種文體由新生而發展上的一般現象，要之，在前一階段中的文藝雜感，因政治環境的煎迫，使其形式方面近乎怪僻，彷彿是一種「預言」似的，讀者一定要詳細推敲，從牠的字裏行間去細嚼，才能透露出一點消息給你，否則讀完全文，一定仍是茫無所知的。然在第二階段的發展，應該是有所不同了，現在的政治環境已答應我們說話，而且需要我們說話，我以爲此後的發展應該從「言簡而深」的一點上去努力，至於行文，大可以直樸而雄渾一些了。

還有一點值得一說的，卽文藝雜感是否一定要像魯迅先生似的博古徵今，現在有的則在繼續魯迅先生的作風而發展，有的則認爲大可不必的。其實這一點，不必反對也不必提倡的，魯迅先生因爲博學，所以能隨手拈出古書古事爲證，則在學不如魯迅的人勉強東找西翻，是不可能的事，但倘有隨手記得的書，能博引一點自然也並非壞事，至於有人以爲一定要似魯迅那麼博古徵今

纔是寫文藝雜感的條件，那麼就不免謬於千里了。

「就義」種種

今天看見曹聚仁先生在本「風」上刊有兩幅照片，一張是「人頭展覽會，」另一張據曹先生說明是侵略者殘殺中國軍士時「一兵持刀，許多兵在賞鑑，有的側首凝視，有的張口欣笑，」因爲印得模糊的緣故，看去祇存一團黑影，據曹先生說：此兩副照片都得之日兵衣袋中，且題有「獸兵傑作」四字云云。前些時我在一本刊物上（大約是前二期的譯報週刊）看見過幾幅攝影，內中一幅固然就是這幅「人頭展覽會，」另一幅則爲「引頸就戮」時情形，不知是否就是今天的這一幅。我當時看了這兩幅照片曾經大爲憤慨，侵略者的殘暴使我切齒仇恨，而國人的「引頸就戮」卻使我感慨萬分了。那幅照片內是一位「同胞」跪着，上身赤裸的，把頭頸引得長長的，旁邊有一個日兵持刀作欲砍下去之狀，四周則已模糊，據猜想總有日兵在賞鑑吧。

抗戰以還，從各種記載上，我們已聽慣了侵略者的殘暴獸行，但總沒有照像那樣地更能給我

們眞實之感，一看到這些「獸兵傑作，」我們的血自然會沸騰起來，我們的牙齒自然會錚錚然發出切齒聲，同時一句常識的話就會衝到口頭，「血債總是要用血來償還的！」

關於反革命者虐殺革命者的殘酷我們知道得很多，在一本甚麼書上，曾描寫着虐殺革命者的情形，他們把屠場佈置在一個森林裏，在夜晚，四周點着火把，大批的革命者被送到場上，於是用種種殘酷的方法虐殺這批正義和眞理的鬬士，成羣的吸血鬼在四周賞鑑，然而到後來，屠夫們的手也不禁顫抖起來，觀光的鑑賞家也不禁低頭而掩面，其慘叫的聲音可聞數十里外。另外在一張影片上我也看到過一個場面，反革命軍打敗了革命軍以後，把革命軍的俘虜用槍尖抵着，逼他們倒退地走，一直退到塘堤的邊緣，於是噗咚噗咚一個個都倒落海裏去，有的還縛着一塊大石頭，使其最後的掙扎也來不及，不過沒有用，仍舊有一個善泅的傢伙死裏逃生，去討救兵來把這批反革命者打敗了。和這場面最好的對照是「夏伯陽」影片裏夏伯陽迎擊白軍的情形，大批服裝極爲整齊的白軍，用排列的橫隊向紅軍的陣地前進，夏伯陽在破屋的洞口把持一支機關槍向之掃射，於是一批批地倒下去，但是他們的隊形不變，仍慢慢而開步地前進，當我們看到這裏的時候，並不會引起悲哀或憤怒，只覺得滑稽而可笑，自然，實際的情形決不會如此，但也可看見作者的諷嘲的

手法吧。

近來有許多記載上，常寫着日軍命被殺者先掘好自己的坟墓，然後再驅之下坑而虐殺之等等，在記載者彷彿欲顯示侵略者的殘酷，其實卻正暴露了自己的同胞沒出息。我因爲自己沒曾親眼目睹過，對於這類的記載總是將信將疑。平日見屠猪的情形，當牠感覺自己將被屠殺的時候，也一定奮牠的全力來反抗和掙扎，不信生爲人類竟有如此馴服到掘好坟墓來埋葬自己的。要固然如此，則「夏伯陽」上所嘲諷的竟是我們現實的情形了，豈不可嘆！

寫到這裏，那幅「引頸就戮」的照片又浮上我的面前。我實在不能同情這位被戮者，這種任人宰殺的姿態實是我們民族的恥辱，我寧可見「人頭展覽會」，因爲我相信這批人頭決不是如此馴順被割下來的，也許他們曾討得了比這更多的代價。我們的抗戰原是爲了不願被人家任意宰割，我們最後勝利的信念是要築在「決不願做牛馬和奴隸」上，然而這「引頸就戮」的姿態卻連牛馬都不如，眞可謂「洩氣」之至了。

也許有人說這正是「從容就義」，其實卻大有分別，肯掘自己的坟墓來埋葬自己的決不是「從容就義」之流，至死不屈的好漢也不會像這樣「引頸就戮」的，抗戰以來的英勇的死已不

可勝數，今天的各日報上就載着一樁英勇的故事，把牠剪下來回答我們的敵人吧：

「前日（七日）清晨，有青年華人兩勇士，各藏一小型青天白日國旗，在浦東南碼頭日軍防區內，插於樹木上，以刺激人心。詎爲漢奸所見，報告日軍小川部隊，前往圍住，當即訊問，兩勇士自承爲游擊隊士，而云大隊兵士，即將來攻，至於何處何人之部下，即榜掠至死，不肯說出。日軍乃將其反綁後，解出槍斃，並將該兩面國旗，插在頸項，以代斬條，押於路上遊街。不料此兩勇士，神色自若，大呼愛國之口號，並大聲疾呼，若中國人多像我們二人，國必不亡。是以兩旁市民，無不落淚，即押解執行之日軍，亦爲感動。迨至下午一時，而兩勇士殉國，一坏黃土，埋葬忠骸，南碼頭之一角，浩氣長存云。」

人類的恥辱

對於法西斯的讎恨，是世界的，也是人類的！

一想到今天由德國逃來的五百猶太人，他們的精神上和身體上一定都受盡了法西斯的魔

爪，在無法忍受的情境之下纔只好扶老攜幼地投奔到外國來，他們平日儉積下來的財物，已被法西斯攫劫一空，現在是孤零地攜着他們受盡鞭撻的身體逃出了魔掌，要是一回憶，那不但是辛酸而已，我想也一定要切齒的吧。

對於法西斯，我們中國人正遭受和猶太人同樣的命運！

然而我們並沒有逃避，我們衝了上去，我們以戰鬪來回擊魔掌，爲了我們自身的解放，也是爲了全世界的被侵略者受難者。

法西斯的滔天罪惡，全世界的史家都在給他們記錄，全世界的文學家都在給他們描繪，可是總覺得不夠天才，還不能最準確的最概括的給大家理解，此刻卻可以抄幾句給大家看了：

「以現代獨裁主義，比之中古獨裁主義，實屬侮辱中古時代。吾人欲求一眞正比較，必須回至人類無文字、教化、黑闇、獸性時代，人類學家，今日大可在歐洲若干部分，研究原始時代人類狀況，而不必依賴牙骨，或極古時代所用數種器物！」

這位天才家乃是美國內務部長伊克斯，這幾句話乃是他在克里扶蘭猶太復國運動協會的演說詞，其解釋法西斯主義實在比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史家文人都高明，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所

謂法西斯者決非歷史上任何暴虐或黑暗所可比擬，必須回溯至人類的原始時代，然而那時代，人獸的相差何幾呢？

然則站在二十世紀文明人的地位而言，對於法西斯的存在，豈非是人類的恥辱麼？

雜感和預言

詩是預言，而雜感也是預言。

預言並非神秘，而世界上以預言家招搖的其實恰非預言，只是胡鬧；眞正的科學家是預言家。偉大的文學者也是預言家，因爲他們都能眞正把握現實，從現在看出將來。

我們尊重世故老人，因爲他們經驗多，他們可以從過去的許多經驗裏告訴我們現在應該這樣那樣，可是我們不完全信他們，因爲他們只能從過去以證現在，不能從現在以推將來。

從現在以推將來的是預言家，自然科學家從現在的天象中推知千百年後的天象，是根據物理學和數學；社會科學家從社會現象論證到社會進化的必然法則，是根據論理學的辯證法；文藝

家要是能以辯證法的慧眼來觀察和分析現實的，他的作品無疑的也將成爲預言。

雜感在文藝部門中是游擊隊，這不但從牠的性狀言，也是從牠的作用說的。雜感的作用在突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來去飄忽，有如游俠，「正人君子」惡之，說牠非正品，那是因爲自己的瘡癤常被搔住，有時簡直弄的無藏身之處的緣故。然而雜感文的作用還不止此，牠不但要揭破，而且還要預言；不但要使你覺得懊悔，還要使你覺得悲哀的；牠可以從一種科學的辯證中論斷了你最後的結果，注定了你的命運；謂其刻毒，其實自然。

像目前軍事家告訴我們：「敵愈深入我內地，則其困難愈多；而愈深入我內地，則於我愈有利益。」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敵人十八個月戰費已化七十四萬萬日圓，敵人的國債已達一百五十萬萬日圓，敵人銀行的金準備只剩五萬萬日圓，其他郵政、公司、公共團體的基金儘變爲公債。敵人每年國民總收入不過一百二十萬萬。除了消費可以蓄積的不過二十萬萬，而在戰事進行中，每年發行的公債須五六十萬萬之間，那有消化的能力呢？」政治家則說：「現在日內閣繼任者平沼係法西斯中堅人物，將來對侵華之策略無疑更爲積極，而國內則從事引誘一般資產階級，擬成爲法西斯派統一陣線，但結果定爲經濟日益崩潰，民不聊生，——平沼內閣祇可稱爲日本之末日。」

以上都是些觀察和論斷，但要是不尋出一點機兆，於讀者還只是一個概念，我們看吧：

「×地日軍一班攜機槍二支，步槍十支，自動向華方投誠。據其供稱：因痛恨日軍閥無端侵華，以日本民衆爲犧牲，彼等已親見日本民衆慘遭家破人亡之苦，又親見中國民衆遭日本軍閥之殘害屠殺，日本軍閥自稱侵華爲『安定東亞』，實則擾亂東亞，欲令全東亞人類滅亡。彼等久已同情中國爲民族生存及爲維持東亞和平發揚世界正義之抗戰，今特投誠反侵略之中國民族陣營；誓願與中國兄弟合作到底，服從中國最高領袖及各級長官之命令，爲世界正義道德爲中國民族及日本同胞之幸福自由而戰，並決鼓吹號召日軍中覺悟分子，大規模反戰，以達到此目的，雖萬死不辭云云。現彼等已由華方派隊護送至某地優予待遇，該地黨政軍機關及民衆正準備舉行盛大歡迎會。」

這就成爲預言了。因爲「此次日軍覺悟分子自動投誠華方者，其人數雖少，但以後必有大批絡續來歸者，可無疑義。」這論斷並非空想，卻是根據現實的觀察。雜感文主要是迅速的反映現實，給人以正確的暗示和論斷，比之文藝的其他部門有着直截和深刻的功用。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雜感文往往擔當着風的任務，使人預感，因此也使一部分人歡喜的。

才和實

一個人不能不說話。但不說話纔是絕頂聰明和惡辣辦法，世界上的人以啞子爲最聰明，就是因爲他不能說話，所以對付一個啞子實在非常爲難；遺憾的是啞子雖不說話，但還能從他的變形聲帶上發出幾個「喔——喔」的聲音出來，因此也仍是透漏了天機，我們從他的簡單的發音上，還是可以辨別出「是」或「非」，「願」或「不願」。

既說話了，情形就複雜起來。中國有一句古話，「是非都從口上來，」那確實是一點也不錯的。我們常見街頭逞罵，爲的都是一言之微，在原始時代文字尚未普遍被應用的時候，則一切都幾乎以口爲憑，說過算數，當時雖無錄音機把他的聲音錄下來，而說者卻也從未因此賴賬的。一入文明時代，狡詐之情，就隨之俱來，現在人有一句「舌頭扁的，說話圓的，」意思要對自己說出的話不負責任，不過也沒用，說話者雖在眼前彷彿佔得了一點實惠，而道義上的責任還是脫卸不了的。

因此古人早就預先告訴我們要「謹言，」要三思而後言，等到一說出口，就只好對自己負責

任了。於是在「謹」而外，還有「說話的技術，」就是所謂「口才。」「口才」之被世所重，我想怕是跟文明的進步有聯帶關係的，因爲想對自己的話少負些責任，或則想把自己說的話特別發生效力，於是研究起「技巧」來。外交家以口才爲要件，交際明星以伶俐的口嘴爲號召，都無非想達到上述的目的。古代的蘇秦張儀，因他們的口才而拜相封侯，眞是要被後代的口才家羨煞的盛業。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技巧雖爲世所重，然其本質仍不過一種輔助，猶之文藝中也有文藝的技巧，牠乃是爲輔助其內容使更有效的表現出來的，故講究一點表現的方法，牠的重要性決不能超過爲本質的內容的。說話也是如此，所謂口才祇不過輔助說話的內容，無論若何巧妙的口才，總無法掩護其眞實的內容的，例如我們近來看到有人其實是主張投降的，——說得好聽點是和平——然而故意扭扭捏捏說了許多抗戰的話，說者以爲是技巧之至了，其實卻是枉然，明眼人仍能從他的字裏行間看出其本意來的。又如有人借長沙大火來反對焦土政策，以部分不健全現象來根本否認遊擊戰術，說者自以爲神乎其技沾沾自得了，實在徒見其「圖窮匕見」的手法而已。

前天報上有一段電訊謂：

「月前僞蒙疆政府首領德王李守信、于品卿、夏恭等東渡，訪問日本軍政主腦人員，曾三次走謁西園寺，均被拒絕，

復由日首相近衞領見西園寺一言不發，近衞敷請，乃忿然曰：『現在講什麼中日親善，反正中國亡了，日本亡了，大家做亡國奴。』言畢揮之使去，諸人掃興而返。」

西園寺大概原想以沉默來代表回答的，不過經不起近衞的敷請，於是畢竟透露了消息，在西園寺也許還以爲自己的話很技巧，把自身幻滅的感覺以中國也要落水爲掩護，然而聽者竟「掃興而返。」和這有着聯繫性的是近衞最近的宣言，他說：

「中國如能承認僞滿，並劃內蒙爲防共區容日駐兵，及華北各地之資源日人得自由開採，則日當與中政府攜手，而決保持中國領土完整與獨立，並可將各地租界歸還中國。」

話是說得夠漂亮了，中國的和平論者，聽了一定會飄飄然的，而各國的評論家卻一致攻擊爲近衞的「讕言，」那是因爲唯恐中國當眞接受了這提議的原故。其實近衞的話並不「讕，」我猜想倒是近衞的由衷之言，而眞實的意義固然並不是近衞氏忽然仁慈或澈悟起來了，當眞要想和中國共存共榮。相反的，從他的貌似戰勝者的口吻裏，正透露了無法支持戰局的苦悶。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大可不必重視的，唯一回答他的是沉默，同時給他一個排山倒海的反攻！

嚼雪零感

【一】

世界的人類正在一個苦難的時代，無數的可貴生命都被侵略者吞噬了去，無數和愛的家庭因而顛沛流離，無數崇高的創造力被移擲在不相稱的工作中，無數健全的靈魂受着飲泣吞聲的磨折：這種樣的情態，特別在西班牙，在中國，在全世界正遭受法西斯毒掌的猶太民族。

人類怎麼樣來過度這個苦難的時代呢？唯一的方法自然只有熬持，即所謂咬緊牙關，但要是僅僅乎咬緊牙關而止，其價值也祇等乎長齋唪佛，其行動似乎超越是非好惡以外，其希望是建築在虛玄飄渺之境；等而下之，則猶之奴隸的命運，奴隸明知自己的命運不會超脫奴隸的境界，然而他仍在熬持地生活着，爲的僅是保持生命的繼續，然而這不過是生物的自然慾，不單人類如此，可見得根本還是一無所思念的。

因此我們的熬持不但要存着一個崇高的標的，而且還應該在熬持中促進這個標的的實現，所以有所爲是必要的，是非好惡之辨更是必要的。現在有人將不助虐卽算爲盡了熬持的本責，以蘇武的嚼雪番邦寄同情於流連獨善者，實在是大有問題的說法。嚼雪固然是熬持的表現，卽使能長相憶，其實與事卻並無補助，中國一向以獨善主義爲高尙的品格，所以隱士也成爲美談和盛事，然而我們要是把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看得明白些，則無疑地，這類人只好算是社會和國家民族的罪人。

於是熬持之外再加行動就成爲必要，熱望也就必不可缺了。不過一談到熱望，又不免有落入幻想的危險，因爲我們雖然已把握了最後勝利的信念，可是這結果究竟還得靠大家的奮鬪纔成，要是我們想得太快了，會感覺得疲乏；要是我們想得太美滿了，將來更會造成幻滅的悲哀。在蘇聯革命尙未成功的時候，有許多文人都同情革命歌詠革命，等到革命當眞來了而且很快地告成了，他們卻又對革命懷疑起來甚至於反對起來，結果有的去作海外寓公，有的終於自殺了。這原因就是他們的熱望只是一種幻想，等到現實不能給他們滿足的時候，於是就轉爲幻滅。現在我們，困苦誠然是困苦了，然而要是存着勝利以後卽刻可以解除這許多困苦的熱望，我怕也就有些危險性

了，爲免走從前人家的覆轍，理智是很要緊，把熱望壓縮一點也是重要的。

【二】

戰事發生以後，國內平添了許多「大義滅親」的事件，大致都是「子代」對「父代」的不滿和憤激所造成，這種打破天經地義的倫常觀念的舉動，自然值得我們的褒揚和尊敬。中國的世風至今日原已到卑屈萎靡的極度，倘再不振奮一下，我怕不但亡國而已，所以戰前日本的文化間諜數數來中國視察的報告總是中國已「沒有辦法」，那結論確乎也是一得之言。後來日本軍部毅然冒大不韙，我怕多少和這些視察報告有關，然而這些觀察終於成爲不正確，事實給自己陷入了泥淖，其間的關鍵也是侵略者的近視眼所始終不能透視的吧。

在中國的已快朽腐的軀殼裏滋長出來的更生的力量，牠纔是挽回了「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前線血鬬的不用說，火線後的民衆也隨地都有光榮的業績表現出來，例子不僅見於報端的「大義滅親」，上海前些時還有「大義殺主」的事件，而因「子代」的反抗使「父代」的逆謀不得不收斂的更不知有多少。可是我總覺得奇怪的何以這類光榮只被「子代」所獨佔，現下這

羣多如牛毛的漢奸中豈沒幾個大義凜然的「父執」，社會上也彷彿只有責「漢奸的子孫」是可恥，而未見將「漢奸的父母」責之於身負督教之責者，平時只見爲了一點家身小故卽向官廳告「忤逆」一到眞正叛國逆奸反而禁若寒蟬，天下可恥之事還有更甚於此麼！幸而還好，在本月三日的日報上發現一段小消息了，使常擔心「老人畢竟要不得」者也透了一口氣，那報上的標題是：鎭江教育家徐師竹投江明恥，因姪附逆憤而自殺，故事如下的記着：

「鎭江教育家，曾任丹徒勸學所長，鎭江縣教育局長之徐師竹氏，鎭江大港鄉人，道德文章，夙爲鄉黨及社會人士所推崇。近因胞姪徐某在該鄉附逆，力勸脫離不從，認爲奇恥大辱，竟於日前在新洲地方，投江殉國……」（一月三日文匯報鎭江通訊）

看了這一段慘烈的故事，誠如該報記者的評語「世之甘作漢奸父母者，當媿死矣！」然而這畢竟是「不足爲訓」的消極辦法，我則希望世之爲漢奸父母者，能來一下「大義殺子，」使「子代」的「大義滅親」不能專美於前！

此亦嚼雪之下的一點正義感吧。

談懷舊的情愫

【坐守閒談之一】

小言

近天來，家裏在刷牆壁，滿房間飛沙走石，工作是不成了，卻又走不開，要招呼和監工，於是乎坐守。

坐守無聊，於是乎冥想，冥想有得，不禁躍喜。平日人事沓雜，自己又嬾於手記，偶有所得，輒即遺忘，悵悵而無法補償。今則枯坐監工，一手支頭，一筆在握，二十年舊賬都能歷歷從鉛端勾引出來，即有傷感，亦爲快事。整整兩天工夫，彷彿把自己從新活過了一遍。現在冥索的時間過去了，又回到鈎鬥的人事中去，檢視日昨手記，纍纍不下數十端，要是已經鬆鬆之年，大可以據而寫回憶錄了，此刻則只好「藏之書夾」，以備他日。惟其中亦有較切近之事數端，則拉雜筆出而命曰「坐守閒談」云。

懷舊原屬人之常情，值不得厚非的，一個人既有記憶的機能，斷無不准懷念舊事之理。惟是世上有兩種懷舊，則頗覺使人噁心：其一是賣老的懷舊，這類多對年青小夥子說的，意思是輕薄這輩

年青人懂得什麼，他老人家是經驗過來的，所以句句是金玉良言。比如談起抵貨，他就說現在這般的抵貨眞不成，從前抵制英貨美貨的時候眞是澈底極了……於是他也把這些話寫成文章，小夥子要是駁了他一言半語，他就以見多識廣來教訓你，這樣子的文章雖不常見，但不能說沒有，而日常言談中，年長一些和年青一些在一塊兒的時候，就不自覺的會發生的。其二是賣關的懷舊。破落子弟數舊家珍，示人以闊氣過來也，你這一點算得什麼，要是在從前，哼……，於是他會背出家譜來給你聽，甚至把一間茅草屋渲染得皇宮一般，聽者會由驚嘆而佩服，或者會對你一掬同情之淚，阿Q式的精神勝利就根源於此。

自從抗戰以來，大江南北，盡爲敵騎所踐踏，廬舍爲墟，田園荒蕪，託身無處，於是浪跡異域，而心在家園，發而爲文，卽多滄桑黍離之感，有的寫得纏綿哀婉，令人不能卒讀。近半年來的報章雜誌上，這類的文章多得不可勝數。另有一種則並非感懷家園，而是憑吊舊游之地，他們的情緒當然完全給感傷所籠罩，眞有「故國山河在，城墟草木春」的情態。自然，我們是不能太苛責了人家，誰都是感情的動物，誰無懷舊之情，可是我們倘能過細一想，則這類的情緒實在不是一種高尙的情思，我們倘記得現在還在抗戰的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正在爲了爭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與敵人遂行

決死的鬬爭，我們的國家還沒有亡，我們的民族還沒有被滅絕，雖然我們的家園淪亡了，我們的游釣之地給敵人所殘踏得粉碎，然而這是關於整個國策的決定，戰略的遂行，祇要抗戰的領導者還在繼續着這個戰鬬，則我們就無發洩這種傷感的必要，這種傷感的氣氛與抗戰實有害而無利，站在大中華民族的兒女的立場上，應該排斥這類失敗主義的情緒，最後的勝利不是敵人而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何難在這些廢墟荒邱之上，斷椽敗瓦之下，重建起我們的樂園，重創起我們的勝跡和名山。一切文化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中華民族既創了四五千年的文化而至今日，則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也儘有能力肩起重創基業的信心，掉筆三嘆有甚用處，我們若不願學亡國大夫憑弔舊山河，破落子弟數舊家珍的濫調，則我希望永不再見那些自作多情的文字，藥味總是苦澀的，但爲治好病症，只能揑住鼻子喝下去，現在我們也只好咬緊點牙關，把我們的情緒寄託在抗戰勝利的信念上，我們應存着重創基業的雄心，這纔是高尚的情思，這是我們自己也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

「新生」

近見報載，有人以佈景搭出「西湖博覽會，」紙紮裝綴「故宮博物院」等來引吸遊客以貿利，這也無非利用一般人的懷舊的情愫，使人能在依稀彷彿中想像昔日的豪華，其實這是一種

「毒素，」站在抗戰的立場上，我們應指斥這些設計者！

談文藝與武藝

【坐守閒談之二】

從來文藝與武藝老是走在一條歧途上的。歷史上有所謂「偃武修文」時代，也有所謂「重武輕文」時代。金鑾殿上的文武百官，雖千年一日地分站着東西的方位，而時代的大半卻老在變幻彼此的衡量，大致承平的時代重文，而世亂的時代就重武了。可是無論文或武作爲時代的驕子，而文藝和武藝卻一直在互相煎迫中過活，武藝給文藝題上一個綽號叫「書獃子，」文藝給武藝的報復則「好男不當兵！」

到近年來，情形彷彿有些改變了。文學可以作爲武器，而「武器文學論」也跟着出現。這口號一傳到中國，引起「死抱住文學」的文藝清客們大大譏刺和攻擊，雙方曾爲此大開筆戰，然不好

久也就平靜下來了。這原因，據猜想，大致雙方都想等待新的強有力的證據出現吧。

後來也當眞出現過證據的，不過恐怕大家又未必在意了。黑衣宰相魔手下的義大利法西帝國主義在準備「膺懲」阿比西尼亞的時候，這位法西老頭子確確實實神往過「武器文學」的。法西老頭子可不是文學家，但他偏偏要談文學，而且提出了綱領來範疇文學，這雖不免汚濁了文學的「清雅，」使一般文藝清客們掃興，然成績也就跟着他的「殖民文學大綱」而出現了：A・摩納哥，派羅・布西，布羅西，白納丁亞，F・尼格羅等人都是這個大綱下的大將而受到國家的褒獎的，「里比亞蒙難記」「地中海探險記」「戍卒之歌」「兵士之歌」「在橫跨大西洋的翼上」「亞利爾戰爭的故事」「聖壇之燄」等等都被認爲最上乘的時代傑作。作爲這些作品的主要內容的是描寫舊日因開發殖民地而犧牲的英雄的故事，「文明人」在野蠻的非洲所遭遇驚心怵目的奇蹟，另外是歌頌戰爭的神聖和美麗。

其次是東方法西主義的日本軍部，他們彷彿也頗能理解「武器」和「文學」間某種關鍵，所以當他們的魔手攫去了整個的東北，以後，跟着就來個文化統制，於是新作家出現了，作品有「新生」「新東北」「皇道下，」寫着在日本法西主義統治下的人民如何「安居樂業，」如何

「建設猛進」「物產豐登，」總之使人家知道東北現在簡直成爲伊甸樂園了。

自然，東西兩法西的努力仍不免是白費心機的，紙上的淋漓究敵不過鐵般的現實，所以莫索里尼派出去的萬里長征的士兵到底免不了叛變；關東軍的鐵腕仍消滅不了數十萬的義勇軍。

時至今日，西方的法西老頭子和後起之秀的狂飈家究竟把「武器文學」已實行到何等樣程度，一時不易知道；而我們東方的法西軍閥，則正爲實現他們的幻夢與我們整個民族遂行着歷史的互鬬。在這血鬬中，老大的中國變爲年青，更生了；然而侵略家的日本，卻一天天掉深到泥潭中去，到目前，不但社會構結的各方面都呈現着崩潰之勢，卽文藝的部門也變成了一張白紙了，儘管軍部頤使下的「從軍文壇部隊」如何努力創造「戰線文學」或在國內鼓勵着什麼「銃後文學，」然而牠之無法挽救垂斃的法西帝國主義的命運乃成爲一定不移之鐵的。

另一方面，作爲被侵略者被壓迫者立場的文藝，卻確實完成了牠「武器文學」的使命了。整個蘇聯的文壇，不用說站在被侵略被壓迫的正義點而向世界法西斯怒吼和無情的攻擊，牠們的作品都一致地以「武器文學」的姿態而出現的。在美國，辛克萊的長篇和約翰李特的短篇作品，也作爲被壓迫者的武器而向這金元帝國主義下着總攻擊令。他如法國的羅曼羅蘭，巴比塞，英國

的蕭伯納等等，還有許多被壓迫者之友的文藝家，他們都一致地以文藝的武器來和法西斯作不妥協的決鬬。而在中國，爲着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整個的民族都浸沉在血鬬之中，除極少數漢奸以外的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以無比的英勇來貢獻他們一己的精力給國家。文藝工作者的一部分，已投身於實際的血戰之中，他們站在國民本位和文藝本位的統一崗位上，完成着最實際的武器文學的任務，而留在後方的文學者，也在爲抗戰創作出許多眞正的「銃後文學。」

法西主義者和被侵略者，雖同樣都以文學爲武器，而其結果卻造成斷然的不同，這原因自然不能從作爲武器的文學本身上去找，也不能從文學者的個人氣質等上邊去找，應從文學的社會關係裏去看，一件文學作品作爲社會大衆的吼聲而出現的時候，牠必然地會含有武器的作用了，反乎此者，雖滿紙槍林彈雨，仍不能達到牠鬬爭的任務的。

眞正能消滅文藝與武藝歧途的，不是法西主義的侵略者，他們雖以統治者的力量壓迫兩者結合，然而這祇是強姦的結合，與歷史上的廊廟文學同樣。我們固然覺得無病呻吟的無聊，因爲牠有氣無力；同樣，我們也決不會聽強盜們的獻笑和欺騙，因爲牠是連這一口氣都不過是臨終前的喘息而已。祇有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打成一片的國家和社會裏，祇有在社會利益就是個人利益

的時候，文藝和武藝的歧途纔能眞正協調起來，文藝纔變成眞實有力的武器，這階段在中國也已經到來了。

談恩惠的贈與

【坐守閒談之三】

去今一個月前，大美晚報的角落裏，以極小的標題載着一個電訊，是這樣的：

（哈瓦斯社瑪德里城十五日電）國民軍所屬轟炸機六架，頃於本日飛來本城，所投擲者，並非炸彈，而係麵包，旋卽爲政府軍高射砲隊所逐走。（十月十六日）

我當時爲一種粗疏的判斷所主宰，於是把這個電訊剪了下來，第二天遍檢其他日報，都看不見這同一的電訊，以爲是哈瓦斯社的造謠，各報的扣載大約與我是同一的觀念，卽大美晚報的編者大概也有些疑惑牠的確實性吧，因此雖把牠登出，也是十分勉強最好不爲人所注意。

後來我漸漸悟出當日設想的太粗淺了，其實這電訊是並不不確實的。法朗哥將軍的這一手段正和日本軍閥在牠的鐵蹄之下實行「王道」同一作用。日本軍閥唆使牠的乏走狗們在牠的大砲飛機之後建立起傀儡政治，用贈送些搶劫來的糧食或花布等來誘惑一般老百姓「歸附，」雖曰恩惠，其實卻是毒藥。法朗哥借了牠老祖宗的數萬大兵以二年多的努力仍不能戰勝國內的人民大衆所擁護的民主政治，因而他只好改投炸彈爲麵包了，雖似策略，其實就是他的窮途末路。

我們的老百姓會拒絕日本法西軍閥的「恩惠，」正如西班牙人民大衆也一定會不去啃嚼法朗哥飛機所投擲的麵包的。

* * *

記得魯迅先生在遺囑裏有一條說「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眞。」既曰應許給你，自然已是一種預約的恩惠了，然而偏要警告你不可當眞，則此中眞滋味他老人家一定嘗過。我們鄉下人做交易，一切全憑口頭信用，今年賒賣了幾擔穀子給你，明年收成的時候一定按數繳納，決不會因爲沒有契約而賴賬，也決不會因爲無中間人在場就少繳若干。這種口頭信用的方式在社會關係的發展史上是屬於最原始的形態。然而在比較落後的社會裏至今仍在沿用，說是落後，其實也

可見人之誠樸和天眞的。卽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大都會裏，至今尙流行着一句江湖式的信用：「閒話一句，」雖曰閒話，其實雙方都能至死遵守的，中國古書上有「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的訓示，可是並未知書識字的農夫村販，江湖上的幫口盜賊，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話由自己負責，決不肯將自己咀嚼出來的蛆蟲推給第三者或用什麼其他的花言巧語來掩飾自己的「醜」和「乏。」大概人一到有些智識，機巧也就多了，世界上有所謂「騙子，」我相信一定跟人類的智識有關，而商人和市儈的能夠生存，就靠他的欺詐，其實是「騙子」的一種，街坊上每以「拐子來了」來嚇唬孩子，「拐子」亦卽「騙子，」可見在孩子的心中亦以「騙子」爲世上最可惡最可怕的一種「人」的。我們在日報上常見有人遇騙的故事，騙子說一元法幣可以變成十元，這是他預約給你的恩惠，你要是信以爲眞，給了他十元，那不但百元的恩惠得不着，連自己的老本也會影蹤不見了的。魯迅先生一生受騙遇騙之事甚多，因此他給了我們「不可當眞」的遺訓，我們若當他是迂闊之談而自己仍以原始社會的口頭信用方式和人交接，則恩惠未沾，將先受騙，可無疑義的。

* * *

最近看見景宋先生的一篇「魯迅和青年們」的文章裏有一段說起魯迅先生和一位思想

家兼詩人接納的故事。這位思想家爲了愛人的病向先生借貸，先生借給了他而且允許他代守祕密的條件，後來他自己反告訴了別人，且唆人以此要挾向先生借貸，爲先生所拒，於是絕交了，後來更進一步搶譯先生預定之書擬斷先生生路，不過沒有成功。等到魯迅先生一死，這位思想家兼詩人又以「貓哭老鼠」的态態寫起追悼文來，於是景宋先生感慨道：「忘交誼於生日，灑清淚於死後，人間何世，我實在不能理解這矛盾的現象！」這前兩句話是極有力量的，因爲眞正道着了現下的所謂「人情，」然而後兩句卻不免多餘，我相信，景宋先生其實是並不理解這現象的。

朋友接納，自古重一信字，不過信是容易做到的，只要不是騙子，總不願把自己的人格輕輕賣給別人的。難的是朋友之間的「義，」要達到牠就非易易了。既無信，當然也談不到義；奸也可以有「信，」然而決不能「義；」投機份子也無義之可言，守財虜視財如命，自然更不必說。大致時代愈近，朋友間的信義愈益淡薄，往往雖如莫逆，其實乃完全根據於勢利，爲勢所劫，就不惜屈降以求交，爲利所動，亦不惜諂媚以事人，一旦事勢逆轉，卽可忘恩義於腦後，或且從而下石焉。此則雖關個人品格，然亦一時代之世風有以致之，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三有論歷代世風之變遷云：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光武

有鑒於此，乃尊崇師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

漢亡而魏興，魏武以權詐梟雄，崇奬跅弛之士，甚至下令求「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從此以後，姦僞萌生，東漢之尚氣節崇廉恥的世風，一掃殆盡。至五代而達到柔靡卑屈的極點。及宋太祖得天下，世風爲之稍振，而眞仁守文，頗提倡士氣，故宋俗之美，僅次於東漢。顧氏續云：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藝祖首褒韓通，次彰衞翮，以示意響。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胡元以游牧性之民族，蹴踏我漢族，文化學術摧毀無存，節義廉恥不屑一顧，終年征戰，民不聊生，弱肉強食，無復人性，九十年間，暗無天日。明祖以刻鷙之性，摧鋤民氣，戮辱臣僚，令士民田得以名節自保，其挫抑廉偶，達於極點。幸而其建國稍久，和平之時期尚長，及王學大興，士氣爲之一振，故晚

明之東林復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後，忠義相屬。有清三百年間，以外族入主中原，漢滿之畛域未泯，而專制之力又極強，故士氣消沉，民多逃世。其間尤以康雍乾三朝，摭拾文字小故，累興寃獄，搜輯四庫，以黜異端，其操縱馴擾之術，實遠逮歷朝。迨及末造，西洋各國挾其工業先進的利器，肆行侵略，敗辱之餘，屢訂城下之盟，國力因而大損，社會亦騷擾不寧，馴致上則盜國求榮，下則因循苟延，世風之頹唐萎靡，更超越前代百倍了。

辛亥鼎革，改專制爲共和，革命志士，固四處奮起，百折不撓，拋頭顱，洒熱血，以冀五族一家，奠中國於平等自由之境。不意外強內奸，交相煎迫，二十餘年，無復寧日，山河破碎，生民塗炭，中國之亡，已迫眉睫，迨「九一八」之東北砲聲，則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以起。

此時中國已至存亡一線之時，舍統一禦侮，別無他策，國內輿論，漸趨贊助，賢明的政治家亦接納求商，以圖最後之掙扎。「七七」蘆溝橋變起，中國即開始抗戰，至「八一三」滬變，全面抗戰之勢已一發而不可收了。

在抗戰一年又四個月到現在，一切政治軍事和經濟情形，都出乎侵略者及國際視聽的想像之外，眞正達到了「一心一德，貫澈始終」的良好現象，即有少數漢奸份子投機搗亂，仍無妨整個

局勢的勝利把握。消沉萎靡了三四百年的世風，至此又突告振奮和激礪，中華民族之不可侮性和韌性，這次統一抗戰給牠完全證明了。

我相信，抗戰不但增加了民族凝結力和自生力，抑且整飭了社會各階層的純潔性，凡是階層中的腐化份子和投機份子都將經鎔鍊而淘汰。同時，我也可以指出一條不變的原則；凡是不忠於朋友的人，亦即不能忠於國家和民族的人，個人間能忘恩負義者，豈能期望他爲國盡忠爲民族捨命嗎？「忘交誼於生日，灑清淚於死後，」這種人也定爲時代的巨輪所輾斃的，不信，等着瞧吧。

年記

人有日記，我則年記。年記云者，一年一記耳。人生一年，必有所事，微末者或有遺忘，較大者當留腦際，際此迎舊新之間，將年來所遇所感筆而出之，雖屬瑣人瑣事，要亦紀念云耳。

【一】

一月。從報紙上傳來家鄉淪陷的消息，接着就是和家中斷絕音訊。

說起家，其實對我是頗爲生疏的名稱了。十年來從沒有回去一趟的家鄉與家園，腦膜上只留着幼年時代的一點浮影了。別人聽了也許要說我心狠，爲什麼老不回去探望一下孤苦的老父和伶仃的弱弟呢！我的家鄉又不遙遠，只要半天的功夫就能望見家門的，而自己又並不忙得連抽出一兩天的時間也沒有，然而在這長長的十年流光中終於沒曾回去，也許連想回去的心情也沒有起過，這眞是怎麼說起呢？

我相信，世界上倘有由興盛而敗落的家庭麼，那麼也一定有我這種心腸的。

我是不願意回去的，我不願去看見那班浮滑勢利的臉嘴，我不願去看見那些頹敗的屋宇和凋殘的花木。我又何嘗不思念孤苦的老父，他已經六十六歲的耆年了，當年多麼舒適閑蕩的生活，現在只落得孤零零地終年看守這破敗的家園，我也曾多次地勸告他出來，然而他不願意，他情願遺留在那些破屋裏，伴着那些蛇蟲鼠蝠過度他的殘年。也許他在懺悔盛年時的蹤越的生活吧。說起我家的敗落，我的父親實在是負着最大的責任的，不過現在，我不欲再責備你了，即使沒有你的放浪，相信至今也一定同樣沒落了，所謂小資產者的歷史過程，早已把我們的命運註定了的。

除了這位孤苦的老父，我的家鄉僅留有一位弱弟。這位弟弟的命運比我更不濟，因爲他比我小了幾年，所以當他要跨入高級學程的時候，我的家已經破敗了，因此他落得一個半途而輟。十年來他轉輾地度着小學教師的生活，現在則留在家鄉的小學裏。他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待人接物柔和多情，和我的剛愎怪僻恰恰是一個反對，因此他服務十年，到處受人歡喜，從未和一人交惡。他辦事謹愼，欲望極小，每以終身從事小學教育爲志願，自以爲個性相近，然而從我看來，則他的個性是與文學更接近。十年以前，當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他已經寫過小說發表在某文學雜誌上，我發現他對文學頗有些天才，後來受生活所困只好終年從事粉筆生涯，已無暇尋思握筆，流光的飛駛也許已經把他帶到另一個惰性的小天地去了！我是多麼可惜可憐這一位弱弟呀！

留在家鄉的是狡詐和勢利，怠惰和苟安，我但願這次抗戰的火燄——即使是敵人的——把牠燬滅，同時帶走了這些舊時代的渣滓。

【二】

二月。戰事一大天地內移，上海孤島的政治形勢也跟着一天天惡劣起來。起初是政治的綁架

案日有所聞繼之恐怖事件亦層出不窮。居留在上海的我們，國家的保護已經脫離，侵略者的魔手隨時在我們頭頂，自二月初起，租界裏繼續發現五六顆被宰割下來的人頭，並附有「對抗日份子之警告」的字條，可見侵略者狠毒之一斑。

因爲人頭的發現，使我懷念起一個已失蹤數月的同事×君。這位×君是我們學校的音樂教師，生而黝黑，脣厚而眼異常，我每次看見他，常使我想起電影裏所見非洲土著的印象。他和我們並不很接近，因爲他除了擔任本校的音樂以外，在外邊還擔任着什麼工作，事情彷彿是很繁忙的。他的到本校來任課，還是一種特殊的因緣，但現在我們也不必再去說明它，總之他是一個稱福建籍的也許台灣人，這次失蹤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一個嚴冬的傍晚，一個常來找他的青年又到我們學校裏來，可是×君外出未歸，於是這位青年就在×君的臥室內坐等，不久，×君回來了，他倆談了很久的天，後來×君送這位朋友到校門口，不意門口還站着兩位非我族類，等到×君被他們嚇住，隨即從附近開來一輛汽車，此時×君大聲喊救，然已不及，終被拖上汽車馳去。約過一小時，忽來大隊武裝某國兵士，將學校各門把守，搜索×君寢室及其他教員住房達半小時之久，終無所獲而去。

這一去，×君就此「杳如黃鶴」了。——雖經過報告，營救，也終於沒有結果。

這次人頭案的繼續發生，忽然使我心血來潮，疑心這位失蹤數月的×君的腦壳，也被做了這次示威的材料，不過也終沒有去辨認。據我想，即使×君不在其數，也不會再在人世了。

【三】

四月。月初，報紙傳來，我軍在津浦線台兒莊大獲勝利。

老躭在一個地方，原是一樁夠膩的事情了，而況在這個非常的時代，眼看人家一批批地往邊鄙的地方跑，這種邊鄙的地方現在已成爲中國的脈搏，多少的血性青年在跳躍着，而被遺留在孤島上的我們，卻終年一日地沉悶的過活，也無刺戟，也無興奮，做着呆板的工作，享用乏味的食宿，說這也算是爲人之道，眞是夠寃枉了！

好了，正在這麼怨天尤人過着的時候，忽然傳來了台兒莊大勝的消息，這彷彿在煤氣薰人的房間裏，忽然撲進了一陣新風，使所有快要窒息的人得了一點蘇醒的機會，那意義的重大，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對於遺留在孤島上的人們，更是一件起死回生的興奮劑。

當這個消息由報紙傳遍了全上海的時候，全上海的人士都互相喜形於色的告訴着，詢問着，尤其是一輩青年，在他們熱情的眼瞳裏充滿了喜躍的希望的光芒，在這一天，整個的上海市容，彷彿變的活潑起來了，在街頭，在商店的屋頂，自動地掛出了青天白日的國旗，雖然因爲政治環境的特殊，沒有什麼提燈慶祝的遊行，但在各個團體裏，各個學校裏都召集了慶祝的大會。

我們的學校也召集了祝捷講演會，全體的學生都無例外的一致參加，他們雖然還沒有材料可作講演的內容，但他們卻仍勇敢地毫無羞澀地站出來發言，自然講的內容都是千遍一律地幾句口號，不過聽衆並不因此覺得厭煩，反而緊張地全神貫注的傾聽，從這裏，我們看出了中國新生的曙光！

後來日子一長久，各種戰地的通訊也有了，作家的分析文章也出現了，那時人們的感情也已稍爲鎮定，過份樂觀的見解也已變爲理智的認識。

無疑地，這一戰，在中國的抗戰全過程中，將是永可紀念的事件！

【四】

七月。着手搜集蘇浙皖三省淪陷史料，擬編一册「蘇浙皖淪陷記，」但與幾家出版商議論，都沒有成功。他們說不準有銷路，那也許是不錯的，不過站在國家和文化的觀點，這顯然是一樁值得做的工作。出版商不願印，自己又無力印刷，於是只好把材料擱置起來。

在這月起，我的生活稍有點改變。一年來把整部時間都交給了學校，今後決定分出一部分時間來寫些文字。現在的學校猶如政場，我有些過不慣，所以打算把我和它的距離隔的遠些。自然，我還不能整個和它脫離，因爲我從今年春天起還辦着一個夜學校，這學校雖一直在艱苦中生存着，然而並無政潮，我還打算一直把它生發下去的。

我開始寫些短文章投給報紙，因此卻就結識了許多文場新友，他們都是年青，都在艱苦的和這孤島環境奮鬪，因孤島上一般物價的高昂和稿酬率的低降，使撰稿者的生活非常困苦。這些朋友從前是不容易碰到的，但現在我們可以經常的會面了，後來又漸漸把範圍擴大起來，形成了座談會的形式。這一生活上的轉向，我覺得很愉快，雖然經濟上的困難是增加了，但祇要有一點可能維持的時候，我是想供獻出大部分的精力給牠的。

在這月初，留在家鄉的弟弟出來了。這是我多年來的想望，終因種種困難而沒有達到的目的，

現在給事實的煎迫而實現了。而且他這次出來，帶着許多親身感受經歷來的豐富材料，因此我鼓勵他把這些寫出來。果然，他生產了，生產出相當給人好評的作品，他的筆名已引起文場中的相當注意。後來因爲生活關係不能不仍舊繼續他小學教師的業務，然他也不就拋荒了寫作，這是我的希望。我每次讀他的文字，覺得農村的氣氛很重，他十年來的鄉鎭生活，使他對農村的情形很諳熟，而他的個性又是包含着很濃厚的農民型，我覺得他的作品頗有發展成中國農民文學的希望。

【五】

十一月。上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本月十二夜，長沙又發生大火，於是一般漢奸乘機活動，散佈謠言，而政府中某些妥協份子，故作恫嚇，一若抗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中國除了屈膝求降以外別無他道，罵焦土政策爲自殺，詆游擊戰略爲流寇，於是社會人心，頓生驚疑。幸抗戰領袖的意志堅定，大部分民衆對於國策認識的清楚，所以此種驚疑在極短時日中卽成過去，更生的中國仍向光明的前途邁進。

在這期間，上海的文壇上鬧着一些意氣的論爭，爭論所稍涉及的是魯迅風的雜感文在現階

段的作用和需要問題，但雙方都沒有把握問題去討論，於是表現出一種不甚冠冕的姿態出來。我曾經在討論開端時，寫過一段對於論爭中心——魯迅風雜感文——的意見，因編者不欲引起糾紛而沒有發表，等到看見後來的許多被發表的文章，卻頗有些使人感慨了，然而我也不想再發表自己的意見了。這問題的結束卻頗使人興奮，也是爲歷來論爭的結束所從未有過的創舉，雖然當我們「杯水言歡」時另外一角還在嘈嘈喳喳，但那畢竟是「另外」了，對於懷着爲文壇的明朗和前進的眞意的人是值不得注意的。我們已經有一篇公同的意見回答一切對這問題不想歪曲的讀者。

在上海這特殊的環境裏，一切表現着特殊的姿態——也許其實並不特殊，——雖然大家互相標榜是在同一國策之下努力，其實特殊的勢力畢竟隨時在囓嚙着國策和眞理的，第一樁是某大報副刊對於遵守國策的編者的撤換，第二樁是影業托拉斯對於電影國策意見的統制。自然，一切熱情的人都會因此義憤，但這原是特殊下的現象，我們的抗戰的終極目的是會變更這些特殊爲不特殊的，而目前的努力卻正爲使他漸漸接近起來。

在這個月的十二日，我要記下一樁紀念的事情：和K女士的結婚。

【六】

十二月。近半月來，日軍進攻浦東，非常積極，然而很少成效。不意在這進攻快將結束的時候，駐守泥城大團的周大根部卻受到意外的襲擊。周部人數不多，而日軍來數倍之衆，應戰開始，指揮周大根首受槍傷，當場殉國。部衆目覩首領被殺，痛憤不欲生，無不一以當十，衝鋒肉搏，日軍雖兇，終被擊退。指揮見日軍已退，乃命令撤退，而部衆於大根之死，尚有餘痛，不聽號令，反跟蹤前進，又遭遇衝殺一陣，侵略者乃狼狽遠遁。是役計斃日軍數十，而華軍除隊長周大根外，更傷亡二十三人。時爲十二月十六日。

大根爲我素識，雖過往不常，然知其爲一思想前進的勇者。當滬戰西撤，卽偕郭君返鄉，自動組織自衞團隊，既以護鄉，又以衞國，部衆全爲本鄉漁戶鹽民，勇敢善戰，故其部隊嚴整，與借游擊隊之名而魚肉鄉梓者迥異。以此特招侵略者之忌，屢欲大舉進攻，以地處偏僻，終未實現，此次則得漢奸之引導，致受其襲擊。不意周君竟死於大敵未殲，河山未復之時，惜哉！周君遺寡妻四子，身後之事，友輩正集議辦法。

最近得到MD先生自香港來信，決定西行內地，二十日成行，偕去者有他的夫人和一子一女。後來據L君告訴，則其目的地實在新疆。此公數年來困居滬港，早擬作一旅行，調劑生活上的單調，此次旅行數千里，自然宿願可償了，故所謂新大教書實一幌子，無非藉此可以免掉腰包，且聞有送其子女出國之想，則其計劃誠然得其所哉。他日旅行歸來，在其文學事業上當有一新境了。

一年已到了末尾，我們正預備慶祝新年帶着新中國到來的時候，忽然從報上看見汪精衛屈辱求降的通電，眞算喪氣之至了！各報的一致指責，民衆團體的通電反對，弄得人心又有些皇皇然的樣子。其實呢，汪氏眞不愧爲一笨蟲，虧他還談政治，還自以爲是一個政治家！連起碼的一點政治大勢也看不明白，連一點羣衆的心理也不理解，還以爲在君主專制的時代，可以由皇帝一念一言變更着天下的大勢，還以爲在前數年的政治腐亂時代，可以由一個領袖幹些翻雲覆雨的勾當！我可斷言，不但如汪氏這次冒失行動決不會發生任何影響，即是此後還有誰比汪氏更有計謀的任何違背國策的行動，也一定會變得毫無力量的覆滅的！時代已向前進了，倘有誰還戴着老花眼鏡去看將來的政治，怕比劉老老初進大觀園還要覺得驚奇不止的。如汪氏者，我以爲唯一消災懺悔的辦法是從此向禪吧！

後記

停筆者一年，其故爲忙在旁的方面。去秋因生活方式略有變換，乃應友人熱情的敦促，開始重作「馮婦，」然而所產有限得很，而且「別無分出」地祇給文匯報世紀風一家。

因了寫寫稿子，「文友」卻迅速地增多了，從前是祇聞名不見面的人，此刻就歡敍斗室了。我們雖不曾酸溜溜地「恨相見之晚，」但歡樂確乎是由衷的，於是在歡笑喫喝之後不免討論些正正大大之言，計劃些於人於己有益之事，這一册集子的合成正是表現的開端。

我的幾篇短文，並非正格的雜感，實兼隨筆的風格，此與其他諸公的謹嚴相較，未免大有愧色。而「論文藝雜感」一文，則又爲論說，更覺編排不倫，然以本集次序乃以姓氏之筆劃爲準，在下叨「老祖宗」之光，忝居首席，是則此一文正開門見山之論，不亦大爲得體乎？

是爲後記。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另境記

王

任

叔

作

原

书

空

白

页

自由談復刊獻詞

本報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停刊，本刊則於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卽已停刊。外界對於此事，頗多惋惜。猜測之詞，亦時有所聞。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刊名旣曰「自由談」，如無「自由」可能，還是不談爲妙。新生事件之於輿論界，這影響是並不少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應走的路：犧牲個別的自由，亦所以成全整個的大的自由，今天，中華民族是在侵略者的壓迫下，發動抗戰爭取偉大的自由了。本報爲不得自由而停刊，本報又爲爭取自由而復刊，而本刊又爲配合本報這個目的而同時復刊，——將以局部的本位的自由的爭取，造成民族的整個的偉大的自由。這使編者感到無限的喜悅與興奮！

民間的言論，以報紙的形式出現時，這就負了爭取自由的使命。本報發刊至今，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在這六十餘年的中國文化思想界裏，不管它思想派別如何不同，但有一個要求卻是一致的：那便是力爭言論思想的自由。康有爲以保皇黨政論家出現時，對於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

想，固多所排斥，但大同書數十萬言，其於學術有新發明者，亦主張「得殊獎。」譚嗣同著仁學一書，目的在「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思想及束縛。其言曰：「……網羅重重，與空虛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雖然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張，已成爲「透底，」而不是「澈底，」但對於思想自由的要求的熱烈，於此可見。梁啓超爲康有爲弟子，兩人政見，本同一轍，但梁氏對於思想自由一事，文中時有談及。他說，我國學術界的光明，人物的偉大，莫盛於戰國，而這就是思想自由的明效。（壬寅年新民叢報）他又說：「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此病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清代學術概論）嚴復思想最爲守舊，尊孔讀經，擁護禮教，反對新倫理觀與新文學；但主優勝劣敗之說。對於陳獨秀胡適輩之新文化運動，亦取「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的態度。（幾道書札六十四）況介紹西洋思想，自赫胥黎之天演論以至穆勒名學等，不遺餘力。對於中國思想界的新生的希望，未嘗不寄托於這思想的培植工作中。章炳麟爲清末惟一的樸學大師，在「癸卯獄中自記」中，竟以「上天以國粹付余」自許。但他挹源於明清遺老，倡爲

種族革命之思想，又復斐然可觀。王國維於北伐軍定都南京後，自沉於北京頤和園之昆明湖，雖然晚年專門研究甲骨文字，但早年研究哲學，吸收尼采叔本華乃至汗德的思想，極爲努力。其於戲曲文學，又都有獨到的見解。至於五四以後，文化思想的自由，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我們更不必說起了。

但自由的解說，也不一定人人一樣。譚嗣同的「自由，」我們說過已成爲「透底。」透底卽空洞無物。決不是我們所要的自由。一般人又以爲自由的界限，在於不妨害別人的自由。我們覺得也太過原則化了。社會的關係，不僅是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且有集體與集體，集體與個人的關係，我們決不能對於一個叛國者，以爲於己無關，或有妨個人自由，卽不加以攻擊。昂格爾以爲：自由是必然的發見。這意思就是說，不論世間是非如何分歧，但眞理卻是客觀存在着的。所謂自由，就是這客觀存在着的眞理的發見。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我們需要自由，我們爲的要發見眞理。

歷史規定了今天中國革命的任務，同時歷史也指示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前途。但在中國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國抗戰的勝利沒有獲得之前，我們還得努力去尋求這「完成，」這「獲得」的必要條件。這不是一句口號，一個指令所能爲事的。必須人人殫精竭力自由地貢獻各種意見與主

張，以備採擇施用，而求達到目的。我們就想在這小小的篇幅裏，負起這一小小的任務。

在這復刊伊始，我們很可坦白地對讀者聲明：這裏不是什麼「文化禁地」。這裏是極歡迎一切讀者作者來扶植來指教的。如其比爲「園地」，則編者頂多不過是一個「園丁」，異卉奇葩，佳禽茂木，更須多人的培植與養育。我們沒有文藝的派別，我們也沒有思想的成見。我們祇有一條禁律：不違背民族國家的利益。凡吾同志，盍興乎來！

略論刺激性

世上固然也有帶刺激性的物事，例如鴉片與嗎啡，叫人吃了，或興奮，或昏迷，沉醉不醒。賢明的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那不但正當合理，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作藥用的鴉片與嗎啡，不在違禁之例。這意義極其明白：雖然有刺激性，但有用，還不能廢止。

人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認識：鴉片與嗎啡本身並非想殺盡天下人，而讓它們來統治這世界。利

害是從人與鴉片嗎啡發生關係後產生的。那中間的標準，是適度。適度則有益，失度則有害。於此可知鴉片與嗎啡，本身並無刺激性，刺激性是起於人之應適程度。罵盡鴉片與嗎啡，其實這罵聲還是落在自己一邊。

捨此不談，因爲擬例未必全同。若言論思想，則一般人以爲有刺激性者，而實際也許是更深入的暴露與更扼要的揭發。俗話所謂「觸着了爛瘡疤。」被觸者給你的罪案，便是偏激，或曰刺激。然而眞的偏激嗎？不一定，也許是「正中。」

人固有以笑聲而遮掩自己的悲哀，也有以張威而僞飾自己的虛弱。人更有「笑裏藏刀，」「口是心非，」聞其聲則未嘗不宛轉委約。探其實則語語刺骨，或作離心之圖，或作分化之謀。若有人指而出之，則怕又是近於刺激性的宣傳了。

以言歐洲形勢，現在未爲定局。有人以預斷歐戰必不至爆發，張伯倫力謀「和平」挽回歐局爲可佩。固無論其用意何如，然今天希特拉對民主制的攻擊，已擱了此項論客一個耳光。

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言固炎炎而有刺激性者。況復今天是動員民衆的抗戰時期。若無激昂慷慨之語文，何來旁薄雲天之熱情。作此語者，無非要我們「白刃加頸，」猶須「少安

毋躁」也。

然而，我作此文，又有刺激性了。嗚呼！

從吐哺說起

古詩：「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這可見我們中國古聖賢的謙恭下士，勤於德政。而「學而優則士」的士大夫階級之足貴，也於此可見。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往古與近今，大概並無二致。魯迅先生曾經慨嘆過：現在爲勞働大衆革命寫革命文學的人，不要以爲革命勝利以後勞働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確也是彼時一小部分「革命文學家」的心境。待到牛油麵包終於無望時，也就「揭起小無恥之旗」了。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原需要別人「吐哺」的傢伙。

曾經在一條馬路上，我看到一個年老的父親，將餅屑嚼爛後，吐哺給臂抱裏的孩子吃。這是泱泱大國的往古的遺風，但引起我一種難耐的厭惡。然而我卻神往於梁上黃口小燕爭吃着母燕啣來的昆蟲。山居無事，長夏如年，聽屋後綠竹瀟瀟，坐簷下，搖大蒲扇。青空中交織黑色的剪影——待那剪影飛近簷下，梁間窠上的黃口小燕，便喝啾作聲了……那情景便十年來猶宛然如在目前。然而燕子的吐哺，和人類的吐哺比較起來，該是燕子的要進步一世紀吧。一則以嘴代手，將活的昆蟲，原封不動的給他小的；而人類的吐哺，則類多拌之以唾涎，將自己身上的毒素，作爲最大的親愛，送給小的。他不但效蜾蠃之於青蟲，日晚禱祝着：「類我！類我！」他還期望自己的後一代，從自己的唾沫中生長！

士大夫階級自然也有可誇之處：「我是精神食糧的製造者。」雖然食於人，卻也食人。然而食於人時，往往是勞働者雙手捧上來獻給他的。而食人之間，則以謦欬爲玄珠，以唾涎爲燕窩，吃的人一不小心，是會傳染到肺病的。魯迅先生在吶喊序中說：既然是吶喊，則須聽將令，往往不恤用曲筆，在「藥」的結尾平空添上一個花環。這用意，無非「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我們的面前，是個大時代；我們一樣也須用曲筆，添上花環。

但以活的昆蟲作爲飼養的材料的辦法不是沒有。過去的歷史，尙留着鮮紅的血漬；目前的現實，也正生龍活虎的在跳動；問題是在於你如何去捉住！能淺水者，然後能泅水。不停留於自己的階級之上，以觀游爲樂，是第一要着。至於負撒旦的使命，爲邪惡而張目者，那更須予以「粉骨碎身，」使無以爲聲，茲不具論。

抽思

【一】

有大澈悟，然後有大毅力。是則理論先於行動。

然而，必須有大認識，然後有大澈悟。行動固先於理論。

認識，澈悟，毅力——是行動的一環。

毅力，認識，澈悟——是理論的一環。

行動卽理論。理論卽行動。

【二】

今天要爲雜感而雜感了。

今天的雜感是「雜」而「不感。」

雜感不在於抓住一點意思，便而大做文章。拿住題目做文章是八股文的惡習，然而我不願說，這是「雜感」八股。

雜感不在於搬列骨董，「作小擺設。」尋章摘句，是陋儒積習，然而我不願說，這是「雜感骨董。」

有感必有情，有情則有藝術的凝結力。此魯迅的雜感之所以爲藝術品也。

有感必有識，有識則深入而有創見。此魯迅的雜感幾乎每篇等於創作也。

着墨濃淡，是畫家的自由。餘音繚繞，乃樂曲的上品。語惟恐不長，言惟恐不盡，我以是於雜感而有雜感了。

【三】

能提高，然後能普遍。能深入，然後能淺出。

家富百萬，散財濟衆，則萬民受惠。積杯水於堂奧之上，而欲駕舟行駛，雖孺子亦笑其無能爲濟。

然而積粟倉庫，徒供鼠竊；萬民嗷嗷，無門求乞。是則積學之士，亦如供壁，何與於民生。

故提高所以爲普遍，深入所以爲淺出。不能普遍，亦不能提高；不能淺出，也不能深入。

【四】

我無嫌於「風氣。」然而我有嫌於以「風氣」爲「風氣。」

以「風氣」爲「風氣，」則「風氣」卽代表一切——空虛而無物。

甲曰：「是。」乙應聲曰「是」而天下皆曰「是，」是些什麼，不知道。以「是」爲「是，」則仍無所「是。」

乙曰：「非。」甲應聲曰：「非。」而天下皆曰「非。」非些什麼，不知道，以「非」爲「非，」則仍

無所「非」以「非」見「是」以「是」見「非」而是非乃明

不以「風氣」爲「風氣」使「風氣」生長於堅實的土地之上，是在明辯。明辯則有識。有識則有悟。有悟則有力。

【五】

人莫不以己爲是，而以人爲非。

有己之是，而無人之是，則己爲聖賢而天下皆奴隸。

有人之非而無己之非，則天下皆卑汚而己獨純潔。

欲明是非，莫善於批評。欲明是非而定於一，莫善於相互批評。

封建社會，亦有其相互批評之道。君評臣下曰，諭。臣評君上曰，諍。友朋相評曰，規。況在今日民主之風盛行，而批評之道獨息，何哉？

相互隱忍，各懷鬼胎。見面握手，則今天天氣哈哈，十分客氣。

一轉過背，便兜的放出一支冷箭。是豈謀國，實則禍國而已。

【六】哀「和平」

一個生疎的聲音，一句久別的語言，又在我的耳邊浮起來了。然而稍爲有點異樣，那便是「和平之門未關」變做了「並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了。嗚呼！我們的好先生！

第三國調停嗎？捷克以是而被賣！「歐洲平靜無事，但捷克沒有了！」我們的好先生卻還沾沾自喜：「歐洲列強，因此可以將視線轉移到遠東來！」

「彼美人兮，西方之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好個轉來的視線呀，但我們眞的要一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了嗎？我以是有大悲哀，大煩惱與大憤怒！

然而，我們最高領袖，已雄獅一般的吼過了：「媾和卽是滅亡。」我們不甘於滅亡，我們全國的民衆也叫過了：「主和者卽漢奸！」我以是有大歡喜，大興奮！

【七】弔「多瑪斯」

世固有同病相憐，而我獨有感於狐死兎悲。嗚呼，捷京日爾曼族民主黨機關報捷京日報總主筆多瑪斯於十一日與其夫人同時自殺了！

是日爾曼族，不是捷克族，也不是斯洛伐克族。是希特拉大言不慚爲拯救日爾曼族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日爾曼人多瑪斯，卻以自殺，以生命的赤血回答希特拉的欺詐與奸險！我以是看穿了以「同文同種」相號召的「親善」者流的肺腑！

嗚呼！我不能無死，我也不能無生！以死爲生，我乃有大決心！以生爲死，多瑪斯乃有大解脫！我雖有感於狐死兎悲，然我將更有感於後死者的責任。

戰場的戰士不折槍，在他未死之前。文壇的鬬士不折筆，在他尙生之日。見正義之消亡，憤民主之摧折，擲生命於死之深淵，我不忍責備多瑪斯，然而我又不忍不責備多瑪斯！

囿視線於捷克一隅，你固無可生之理。然而世界的和平、正義，人道的潛力，在地下不在天堂，正在滋長，我們正是有生之年。以患肥大病者爲茁壯，是醫生的過錯。以法西斯的勢力爲不可侮，那是你的短視與軟弱！你們的血正在和我們的血凝在一起，這將是注射法西斯國家的唯一的「血清」——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終有一天，將會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

活着就是力量！我們要活，我們爲的要奮鬪！奮鬪到咽下最後一口氣，現在不是我們的死的時候。中國如有多瑪斯，那麼醒吧！

【八】 偕亡與遷怒

仇恨到了澈骨的時候，我們古代的先民就唱出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而後代的我們，正也有同樣的心境。

前幾天有隻小新聞，說是有個「日憲兵班長在三馬路外灘搭商辦輪渡返浦東時，在浦西碼頭被一華人抱之同入浦中溺斃。此案發生後，日『僞』方面大起騷擾，曾於連續一週中將渡客二百餘名，扣留審究，毫無眉目。乃轉怒輪船當局，責其當時何不撈救及保護，遂於前日將該兩商輪扣留，並封閉其營業」云云，這新聞實在說明了中國人「偕亡」的決心。然而抗戰是偉大的事業，不是個對個的問題。「偕亡」之後，還有「遷怒，」這也許是偕亡者所不及料的。而承候主子意旨供奉役使的所謂「商輪，」更料不到橫逆之來，終於封閉營業。那麼「遷怒」的結果，也許有一天所謂「商輪」的主辦者，也能抱起「偕亡」的決心來了。

自偕亡而遷怒，自遷怒而偕亡，這是抗戰必勝的一環！

超越魯迅

——爲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作

自由談復刊還沒到十天，而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又臨在我們的面前了。人都知道自由談和魯迅先生的關係，編者接編自由談以來，朋友間首先給我的批評和意見是，「應該多登些魯迅式的雜感文字。」然而魯迅不世有，而自由談還得「談」下去，這使我在今天益發感到這一文化巨匠的死去，對於中國文化界損失的重大了。

魯迅的精神固然是部分地活在人們的心裏，但魯迅的藝術的戰鬪的力，卻沒有看到活在後一代人的筆端，這是誰的過錯呢？難道我們眞讓他的死，帶去我們的一切，使前無古人，而後亦無來者嗎？在魯迅先生翻譯的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的小說裏，曾經有這樣的一節話：

「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

我可以斷說，魯迅先生期望於後一世代的，正也抱有這樣的心境。然而我們竟讓魯迅先生這一心境，寂寞，冷落，而終至於委爲塵土嗎？不，我們一定得大聲的叫出：「超過魯迅！」這是每一個文化人所應自勵而勵人的！

魯迅之所以爲魯迅，決不是偶然的。學習魯迅，並不是爲了「追隨」或「並駕，」而是爲了「戰取魯迅。」那麼我們看一看魯迅先生一生的學問，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戰取呢？六百萬字的魯迅全集，現在是展開在我們面前了，我們好容易瀏覽了過去，但作者每一字每一句所下的心血，那眞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祇要一展開他那手抄的「古小說鉤沈，」「會稽故書雜集，」「稽康集，」看到那裏面一筆不苟的字跡，我們就可知道魯迅對於任何一種學問的刻苦磨鍊的工夫。而我們呢，以皮毛爲豐肉，以躐等爲倖進，到頭來，還不免自示空虛。

魯迅固然是勇於和惡勢力戰鬪的，但他又勇於自鬪。記得他在一篇文章裏說起過：在他翻譯新興藝術理論時，有幾處，彷彿觸着了自己的瘡疤，但他還咬着牙譯下去。他在「二心集」序言裏說：「我說些自己的事，怎樣在碰壁，怎樣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

的：這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份子的壞脾氣。」祇有有自知之明者，才能知人。而祇有能與自己鬭爭者，才能與人鬭爭。然而，我們呢？

魯迅是毫無隱蔽的披露了自己的心境，要說的話，總得說去，這就成了他的深刻。將事實的眞相，掩飾於世故之下，於是人們的見解都成爲庸俗。正如魯迅先生在論諷刺文學中所說，所謂諷刺不過是現實的眞實的暴露，而人們卻以此爲諷刺了。魯迅先生就是個眞實的說教者。

魯迅先生最討厭的是專在背後嘁嘁嚓嚓的人們。有理說得淸，而無理可說者，卻在背後嘁嘁嚓嚓了。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有說，這些人「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鬭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但是，這現象僅限於文壇嗎？不，在我們的左右，在我們的前後，都有這樣人。我們所要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而另一些人所要的，卻是「三根椽下搬是非。」於是是非莫明，而中國也將亡在這一輩人的手裏。

有人說魯迅善放暗箭，魯迅先生回答道，放箭的人站在這裏呀，哪得說「暗」呢！祇有那無理可說的人，那祇好不拋頭露面放暗箭了。……

這一切克苦的精神，這一切戰鬪的手法，都是我們學習魯迅，戰取魯迅的必要條件。而不畏強權，不避強敵，不依附於豪貴而歪曲事實，敢說，敢笑，敢作，敢爲，以服務的精神，沒身於事業，學問，民族，國家，那將總有一日，以我們自己的力量，繼之以我們的子孫的力量，而超越魯迅！

「我們倘不是毫不顧忌地將魯迅作了踏臺，超過了他，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我們的錯！」

這該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應該記住的話！

曲的效顰

魯迅先生繼「麻將詩人」的「詞的解放」之後，有所謂「曲的解放」塡了一齣「平津會」雜劇，膾炙人口。我於詞曲一道，完全外行，但也不妨照樣葫蘆，算作東施效顰。至於「牛仄不調，聲律乖謬，」更不必說起了。

「無題」雜劇

【副上】四明文戲不堪唱，且來傀儡戲一場，莫謂牽線背後多，依然袍笏登殿堂。（白）老夫姓×名××，×××××人氏。年已七十有六，依然雄心未死。全憑「友邦」恩德，更賴祖宗風水，到今朝竟榮膺「××市長」，好不榮華富貴。剛纔在市政廳中行就職典禮，雖然到的人「雞零狗碎」，卻也鋪排得富麗堂皇。祇是「友邦」人士，咭唎括拉，不知說些什麼，眞叫老夫心裏着慌。

「短拄天淨紗」　小狗着慌——跳牆，
猴子學唱——裝腔，

【旦上唱】敲得一次竹槓，
一千元進帳，
今朝依然做市長。

【副】你你你……別要聲張，要是友邦人士聽到呀，不是說老夫不夠做傀儡資格了嗎？算盤進出我內行，國家大事管他娘，但願祖墳風水好，爾我有福總同享。小寶寶，虧你敢膽幫我，來此做市長夫人，要是像家裏那個，豈不辱沒煞人。可是你得和友邦人士多多周旋，免得我

不好下場也。

【旦】 那有什麼，全憑老娘身上。祇要老娘略施妙計，准叫你位保萬世。

【副】 好，這就有謝你了。（唱）

「顛倒陽春曲」 祇要有奶便是娘，
賣賣國，又何妨。

【旦唱】 傀儡戲算甚麼難唱，
你這裏假裝腔，
我那裏渡陳倉。

【丑送報紙急上】 啊喲喲，不得了了。

【副】 你作甚這樣慌張，莫不是游擊隊打到街坊，來來來，且拿報來給我望一望看。

【丑遞報介】 ××人要掘老爺祖墳，余大雄給兩下斧頭劈死了！

【副驚介】 有這種事嗎？那豈不大觸霉頭，新亞禁地居然也有人上樓，何況這荒涼的市郊，這麼想來，好不感傷人也：（唱）

「同上曲」賣國並非賣同鄉，
掘祖墳，太兇相，
雷龍斷掉好運難長，
何況斧頭鋒芒，
一下迸裂腦漿。

【副昏倒介】啊呀呀，我怎麼站不住脚了。莫不是祖墳眞的被掘掉了？

【丑扶持介】勸老爺到裏面休息則個。

【副醒恨恨介】上台不作下台想，（旦）萬難得已走扶桑，（丑）傀儡不是小子做，包袱雨傘回家鄉（下）

中國沒有「佛朗哥」

北方有所謂「中國的佛朗哥，」現在是伏誅了。近來忽然在報上又出現了「浦東佛朗哥，」

也爲游擊隊所圍勦，眞可謂咄咄怪事，何世上「佛朗哥」如此之多呢，而又如此之乏？

東方法西斯想在中國製造個「佛朗哥，」那是並不足怪的。要從自己國度內，調動百萬的大兵，來和中國人民火併，雖然仗恃機械的精銳，佔領了好些土地，屠殺了不少中國的士兵與人民，也算有點了「勝利」了，可是直到今天佔領廣州上海爲止，二百萬可動的兵士，已經損耗三分之一以上，就在進攻武漢的中間，實力消耗已有三十萬，一古腦兒就只有七千萬人民的這麼的一個小國，老這麼火併下去，沒有幾年也會併完的。勝利的背後，正潛藏着恐慌與空虛。製造「中國佛朗哥，」正是他攻下漢口以後藉以肅清佔領區域的中國游擊隊的最大的陰謀。——然而，敲不響的鑼，連號召也不中用。

中國不同於西班牙。中國的土地上活不了這「封豕長蛇。」封建地主已經「潰不成軍，」反動的「金融巨頭，」中國還沒產生，一年四個月的抗戰，目標甚爲顯明。中國人民大衆的憤怒的箭，正對中東方法西斯的心窩。漢奸雖多如猪毛，但是篩子下的糠秕，沒些兒斤量，一陣風，就會捲到不知去處，「佛朗哥」可沒有一個。

但不爭氣的卻在我們自己。把戰事推得老遠老遠，彷彿於已全不相關。站在台下看戲，自然希

望兩方都是好打手，一面是精悍善鬬的鐵公雞，另一面就得也是個梟雄猛將，向榮實在太乏，自然還得添上個張國梁。不是「浦東佛朗哥，」那就顯不出游擊隊的勁。論功行賞之間，固然不免減等。而執筆爲文之時，自也難傳聲色。可惜的是，游擊戰術並不是單純的軍事襲擊。多一個「佛朗哥，」正是自己少一分政治宣傳的力。不去消滅直接的敵人——侵略者，而偏要以全力來撲滅所謂「佛朗哥」者，正是自己的恥辱。危言聳聽，誇飾求美，本是文人積習，世固有相同的事理，但世無全同的人物，儗不於倫，比非其類，「浦東佛朗哥」的宣稱，正中侵略者狡計。以跳蚤爲巨龜，擬蚯蚓於長蛇，嚇倒的不過自己而已。敬告同文，請速取消「浦東佛朗哥」一詞。中國沒有產生佛朗哥的可能，中國事實上也沒有佛朗哥。中國的敵人祇有一個——東方法西斯日本帝國主義。外此，不過是幾隻「喪家的」乏走狗，不堪一棒！

略論王皖南的被槍決

讀到王皖南被最高當局指令槍決的新聞，我是滿身感到了輕快，這自然因爲我是「阿拉幫」，

這一點「幫口」情分是免不了的，我彷彿看到故鄉的同胞的滿臉的笑容，我彷彿聽到故鄉的大街小巷，里一串敲蛋殼似的笑聲！

然而我更大的快慰，卻不是這一點。俗語說：「水幫水，船幫船，官官相護莫訴怨：」在官僚主義政治下的民意，早已成爲一片嘆氣聲，眞是所謂過着「無可奈何之天」的；中國發動了抗戰，中國也就得從政治上肅淸了這現象！這是我們政治的進步，這也是在抗戰期間動員民衆的另一種動員法！

其實，貪官汚吏之罪不容誅，那本來是律有明文，無足驚奇的！王皞南的被槍決，也不過執行國家法紀，是極其平常的事。但在平時，法紀是法紀，而官吏是不曾包括在內的。正和「廉潔奉公與民終始，」本是官吏的義務，但能做到這義務，閭巷之間，也就交相稱善，以爲「包公」再世了。包龍圖終於爲小民的聖人，足見中國貪官汚吏之多。

王皞南自鎭守寧波以來，不僅從「封鎖線開放不時」之中獲得千把萬橫財，而且壓迫民衆運動，也是無微不至的。自然王皞南是祇有一個，執行干皞南同樣「路線」的，據我所知實在還不在少數。賢明的浙省主席黃紹雄所頒佈的十大施政綱領，「有一些人」無法公開反對，卻以密令

轉保安隊而執行反對的任務。於是自「我們」以至「阿拉」民衆，也祇好「聽戰鼓而興歎，逃上海而避役」了！一方面叫人「不要動，」一方面卻「拉」出去「打硬仗，」人非木石，誰肯爲此？所以，我們對於王皖南的被槍決，我們必須更深一層的看，那是給抗戰中「自命不凡」「擺老爺架子」處處想「奴視民衆」的官吏一種打擊，那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實現，那是給「包而不辦」不民主的一些傢伙的一種當頭棒喝。子彈是穿過了王皖南的身上，但也穿過了「那些人」的心！「抗戰是淘汰，」不站在民衆立場上，那將必然爲民衆消滅，於此已可見「眞理的閃光。」

但使我對於這發新聞稿的人，還有點不恰意的地方。「違令妻婦」固然是罪有應得。但將此「近因，」掩蓋他的「遠惡，」依然是有點「衞護。」且因此而嫁罪於弱女子，使民衆忘卻自己的勝利，而競指那新婦爲「白虎星，」這樣轉移目光的「宣傳法，」依然有礙於民意的發揚。在我以爲與其說那新婦是「白虎星」毋寧說她是中國的「救星！」由於她，中國是去除了一個「汚吏，」抗戰是去除了一塊絆脚石！

關于「邊鼓集」

一年以來，我所寫的雜文，自己知道不止這一點點，爲了忙，也爲了平日不珍惜自己的文字的習慣，一向不願給收集起來，這回得能湊個數兒，附一附驥尾，也還是性堯兄的力量。

我是並不準備以「雜文家」出世的，更不想以「雜文」而招人頭痛。寫雜文的開始，還在立報「言林」發刊一年以後。爲了高爾基逝世，我寫了一些短文投寄言林，這就和編者結上因緣。也時時爲言林寫些短文。但並不多，一個月不上六篇，稿費是在六七元左右一月。雖然夠我買烟抽，但於我生活無補。不知怎的，大概從前年十二月間起，編者要跟我「包工」，每月供給雜文二十五篇左右，致送酬金三十元。那時，我有的是時間，每天看報總化去二個鐘頭。看過後總有一點小感慨，「舉筆一揮，」也就成了。於是答應下來。最初是兩分郵票一寄完事，接着知道這可「節約」一分半，所以三十元酬金，除去筆墨郵票之費，實收約在二十八元以上，足夠我房租開銷，那眞是「何樂而不爲。」

可是寫得多了。自然也增多了火氣，究竟還是年輕，談鬼說狐的「沖淡」得要命的雜文是寫不出來的。因之得罪了不少的人。爲了「談統一，」主張以「抗戰求統一，」據說潘公展先生看了大不以爲然，叫人去警告許傑，許傑受了一寃，」卻又偷偷地寫信來警告我：「小心，提防！」還自然

是極友誼的。但我沒有因此而輟筆，還是寫下去。之後，爲了批評「國難與文化，」又得罪了柳湜先生。奇怪的，卻是轉移了一個目標，說我這文章是「遵命文學，」是有人指使而寫的，於是那「有人」便招了「不白之寃。」

這些故實在今天本來也沒有提出的必要。但從此可知雜文之不容易寫。既要「招怨，」又使人「頭痛，」雜文寫到這地步，眞是「如之何！如之何」了！

抗戰發動以後到國軍撤退南市，這之間，我沒寫過什麼，偶有所作，無非應景。之後，大美晨報早茶出版，我應亭長先生之「拉，」「拉」出過「一些。」大都是贊頌人頭之類。世紀風出世，我又被高大編輯拉了一下也「拉出」了「一些，」這就是我在「邊鼓集」裏一大半的雜文。雖然時間駸駸的過去，但重讀這些「勞什子，」仍有慨於今日，舉例來談吧，爲了日本的網羅中國文化份子，我是提出了「春秋之義，大夫無私交」的口號。但今天還有許多文化人，可眞和易得很，私交得特別隆重。爲了海關的事，我在譯報的爝火上寫了不少憤慨的話，也有一篇收在這集子裏，但在今天海關屋上的「五色旗，」不時在我們眼前出現了。這可見雜文不管怎麼寫的「蹩脚，」那構成「雜文」的社會的現實性，是不可忽視的。

我有機會還是要寫下去。但經過「試辦」以後，我是有感於我的筆鋒不能專向敵人投去，對於自己的毒瘡還得剔破。瀰縫不過使毒瘡蔓延，招致更大的潰爛，增強抵抗力量，去毒還是我們年青人的工作。六個月前，我曾經想寫一篇小說，定名爲「鄉曲，」而且寫下了一節「前奏，」那其中有一節說：

「我們的敵人，是站在我們的戰線以外，然而，也站在我們的戰線以內。我們的敵人，是活在我們的生命圈以外，然而也活在我們的生命圈以內。在我們的喘息裏有敵人。在我們的靈魂的深處，也還有敵人。我們的生命，不全是赤血的凝結體。鮮血中依然還有汚毒。我們能姑息這汚毒，使這生命的鮮血全歸於腐爛嗎？這是招致死亡，不是新生！

「槍砲所到之處，擊破的是敵人的侵略力。然而在敵屍之間，正也有我們的朋友與兄弟，那是無可奈何之事，我們最大的歉意！祇有付諸衷心的祈禱。而補這槍砲的缺陷的，不是焚燒與劫掠，是醃着生命的血的筆。

「筆的戰鬬是廣泛的：整飭自己的陣容，招致同情的隊伍。筆的戰鬬是嚴謹的：不傷亡一個眞正的友人，不放逸一個眞正的敵人。雖然力弱，然而總到了不能不鬬爭的時候了。」……

我想，我們這一隊「敲邊鼓」的人，怕都需要有這樣的認識吧！

周作人先生的悲哀

沒落與興起，如其僅僅看作爲個人的事，那自然我們沒有對汪精衛加以攻擊的必要。在汪精衛是早已把天下大事作爲自己的事來看，而我們卻以「個人的事，」輕輕給他的行動抹殺不談；那可悲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我們自己；不能「嫉惡如仇，」又何能「克敵制勝？」

然而儘也有些人，自視不高，既不欲爲「王侯將相，」又無意於「生殺予奪。」祇憑一己所好，多喝幾杯苦茶；「富貴於我如浮雲，」淡泊寧靜，聊謀果腹之飽，一枝之棲，全以爲無關大計的了。然而聲名既立，就有人想假借來作號召，抬着廟神求雨，世間事本來如此。可見破菴之卜，仍如決鬬之場。我雖有心遺世，而世卻不容我「遺掉，」這正是無可奈何的事。

以是我們不能不有慨於周作人先生的被襲！

周作人先生之應否被刺，見仁見知，我們不必論斷。但以一青年，甘冒生命之大險，欲置周作人

先生於死地，則事亦未必是偶然的。周作人先生如其深明大義，必然會深自檢點，痛切自責；而不願加罪於這青年。雖然多年老僕，替作死鬼，來訪友朋，無辜受傷，不免惋惜，而且遺憾；然而對自己的信仰越切，則轉而爲仇恨自也越深。要取我的生命以去者，無非使我得保全過去光榮的歷史。周作人先生於此該不無有動於中吧。

然而悲哀的，卻是這樣的事實：「日本當局現已措置激烈措施，壓制此類恐怖活動。」嚴然以周作人先生的統治者保護者自居了。周先生上年爲避免日人利用，苦心孤詣，弄得個清華專任教職，總以爲從此「天下太平，」不至「同流合污，」得以聊全「清節」了。然而畢竟還是要接受別人的保護。這是如何可悲的現實。從此而後，周作人先生不作「逆民，」也得作個「順民」了。噫嘻。

〔附〕關於周作人被刺

四日中午，有友人見告說曾見三日某晚報載有周作人被刺新聞。當時覓該晚報未得也就算了，到五日始在文匯報上見到海通社的北平四日電，云「昨有青年一人，赴著名作家前北大教授周作人寓所，意圖行刺，值周不在，擊斃周僕一名，刺傷訪客某君，兇手揚長遁去。」二十五年五月周作人曾作「竊案聲明，」蓋五月初北平幾家報上揭載一條用二號字標題的新聞「周作人宅大竊案，」而實則被竊者乃周作仁而非周作人。這番被刺，頗疑有誤，因爲

著名作家前北大教授似無被刺之理，如照「值周不在，擊斃周僕刺傷訪客」的電文想來，則該青年之赴周宅，其意圖或係別有所在，否則寃有頭，債有主，爾刺周而周不在，理應就此揚長而去，不當擊斃周僕，復傷訪客，行刺與作賊不同，無妨空手而去，大可不必妄殺別人以明志也。

這是閱文匯報所載電文後的「偶感」，今日下午在友人家得讀每日譯報，於「大家談」中見有「周作人先生的悲哀」一文，得知對刺刺周事件的高明之見，其言曰：

「周作人先生之應否被刺，見仁見知，我們不必論斷。但以一青年，甘冒生命之大險，欲置周作人先生於死地，則事亦未必是偶然的，周作人先生如其深明大義，必然會深自檢點，痛切自責；而不願加罪於這青年。雖然多年老僕，替作死鬼，來訪友朋，無辜受傷，不免惋惜，而且遺憾；然而對自己的信仰越切，則轉而爲仇恨自也越深。要取我的生命以去者，無非使我得保全過去光榮的歷史。周作人先生於此該不無有動於中吧。」這是說某青年之刺周，分明起於愛周，即所謂「要取我的生命以去者，無非使我得保全過去光榮的歷史。」這兩句論文章是好的，論意思卻有點那個，蓋下文明云「周先生上年爲避免日人利用，苦心孤詣，弄得個清華專任教職，總以爲從此『天下太平，』不至『同流合污，』得以聊全『清節』了。」聊全清節，誠不如「業績」日增的光榮，但照常情而論，總已不該苛責，況乎取其生命？

一個人是絕難過着天天光榮的日子的，若今日偶爾沉默就有人要取去他的生命，復有人從而讚歎稱賞，認爲取其生命即所以保全其光榮，則此刻不上戰場與敵死拚者，大可相率投河，自保光榮，而周僕地下有知，亦當呈請國府明令褒揚其爲某青年所保全的過去光榮的歷史。

斷章取義

劉汝惠先生的斷章取義我以爲是一册很好的雜感集，因爲他雖於取名「斷章取義，」然而論斷事象卻是取整個看法的。

我們於周作人先生的愛好，未必下於別人。我們說：「對自己的信仰越切，則轉而爲仇恨自也越深：要取我生命以去者，無非要使我得保全過去光榮的歷史，周作人先生於此該不無有動於中吧！」這意思，一方面在懸擬周作人先生的闊大的胸襟。（我相信周先生會有這樣闊大的胸襟）故不用第三人稱，而用第一人稱說話，一方面卻又在希望周作人先生能原諒這青年的行動，且最好能「翩然南下，」接受胡適先生的勸告，因爲在今天，周作人先生卽使不想接受別人的「保護」，而終究別人要來保護他了。所以又說是周作人先生的悲哀。若非周作人先生，而爲湯爾和，則求保護而不得，遑說悲哀。

我們對周作人先生沒有惡意，在此已很明顯。

陶亢德先生以爲我在讚賞「取其生命卽所以保全其光榮」，那是看錯了我的意思，而且不免有點「斷章取義。」誠如此，我在這以前，不必說「周作人先生之應否被刺，見仁見知，我們不必論斷的話了。」因爲當我執筆之初，根本上是不同意於「暗殺」之類的，但對青年，我以爲應該略跡原心，對周作人先生則應該求全責備，無非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而已。陶先生實在是可無用其憤慨的。

陶先生既曲解我這意思，自然會有如下的結論：「則此刻不上戰場與敵死拚者，大可相率投河，自保光榮。」然而陶先生又沒有看到我上面說過：「聲名既立，就有人想假借來作號召，抬着廟神求雨，世間事本來如此：可見破菴之下，仍是決鬬之場……」周作人先生不比常人，侵略國的文化人士之景仰周作人先生，也與任何一個中國文化人不同；而且不久以前，周作人先生正被敵人「利用」過一次，弄得全國噪然，足見論周作人先生，不能以常人視之，以常人視周作人先生者，我以爲並非愛他，也不是敬他，恰恰是小看他了。至於「不上戰場與敵死拚者」之中，卻還有「各守崗位，予敵人以襲擊」的。周作人先生誠能如此，則我爲失言了。而我也終於希望自己是失言，周作人先生能以「逆民」或不作「順民」而久居「北平，」直至抗戰得到最後勝利。

陶先生的「偶感」，以爲刺周的青年，別有用意：無非盜竊之流。果如陶先生所感，我亦「皆大歡喜」，因中國有周作人先生那樣的學者，是中國的光榮。但必須以「不被利用」，「不接受保護」爲最大限度。

〔附〕關於周作人先生被刺

關於周作人氏被刺消息，報上傳說不一，頃周建人先生得其太太人來書，道及周氏被刺經過甚詳，特徵得建人先生同意，將該信錄刊於此，以告關心周氏者。

* * * *

三男鑒：匯洋二十元收到後曾覆一信，想已鑒及。老二（按即周作人氏——編者）家於元旦晨十時忽來暴客二人，（時在會客）槍擊老二，中腹部外衣服已穿，託天之幸，彈未入腑，略受微傷。會客沈啓旡君誤被中兩彈，肺破，現在同仁醫院，傷甚重。畢大張三因捕刺客，受彈死。聽差一名，亦受彈傷，兇手逃去。予得此意外消息，甚驚慌。幸老二尚無恙，今日親來安慰我，但已受驚不少矣。原因如何，亦莫名其妙，惟恐傳聞錯誤，特此函告，望汝即日致函老二安慰才好。老二近來除赴燕大教書外，並未擔任其他事務，兢兢自守，竟出此不幸事件，殊可怪也。此告，母字一月四日。

略論叫化之類

【一】先說動機

據說作文須如「畫龍點睛，」總得最後題破一筆，方覺鞭辟入裏。故「太史公曰，」例在紀傳以後；而項羽「天亡我也」之歎，更顯出其「拔山」「蓋世」之英姿了。吾生也不肖，墨守舊法，頗覺無謂，於是於本文之先，且說動機。

天下用「好動機」來寫文章者，我想並不多覯。但世上既有「聖人」之名，總有「聖人」之實，我也不敢一概抹殺。至於我寫文章，動機大都不很純正。除非拉去客串，祇好裝腔學唱，這是不得不爾，本非「名山事業，」祇好管他媽的了。至於我寫這篇文章，動機卻正起在我榮任申報館自由談編輯之時，不但不大純正，而且「大逆不道。」因爲自由談復活三天，就由我發下一篇「略論刺激性」的雜感，這於彼時的「汪副總裁」現在的汪逆精衛是頗爲不敬的。引起了一些「識大體者」的「嘁嘁喳喳，」那是並不足奇的。求自由而不得，捲鋪蓋以逍遙；我確也早抱了復刊之日傳東華先生的感言中所說的「決心。」但隔了不多天，汪精衛的「和平之門未閉」的論調出現了，我不禁慨歎於竟不幸而言中：「無非白刃加頸，猶得少安毋躁也。」然而，我們的論客，卻以「昨今

之惶惑與悲憤，」曲爲汪逆辯解。偶與一二好友，略飲於老正興館，談及此事，不覺竟地「惶惑」而又「悲憤」起來了。匆匆返家，爬了二層樓梯，酒氣與閒氣交攻，大有不可終日之概；不料二層樓梯的轉角上，居然有一粗聲的縫紉婦，擋住我的去路，這實在是「奇恥大辱，」非將她一脚踢走不可。然而，終於也按住了氣，爬到三層樓去了。

妻看到我回家，不免有些「絮叨。」絮叨者親愛的表示也，這在我是很知道的。然而我則照例「默默，」最多也不過「唯唯」與「否否」而已。我是深苦於終日的僕僕，而妻則又深苦於終日的孤寂，相形之下，自然是一邊絮叨，一邊默默。但這回的絮叨，我卻聽出大道理來了。莊子曰：「道在矢溺。」何況絮叨乎？

妻告訴我那個縫紉婦，眞是個出奇人物，手臂上全是一條條剪去的深痕。那原是她要把這剪下的肉條，當作香來供奉神明，祈求多福的。據她說，這就叫做「肉香。」她有個師父，今年已經活到一百零八歲。自然是不多也不少，總是一百零八歲。不會是一百另九，或一百十，水滸裏不正是一百零八個好漢？那麼就是一百零八歲吧，這正是用肉香祈求來的長壽。而她今年還不到五十，剪卜肉來當香燒，還須一次次虔誠地幹下去。……這故事是很簡單的，然而確實驚動了我。我彷彿在這縫

紈婦的身上，猛然看出汪精衛的靈魂。碰到這樣的婦人，我要引爲「奇恥大辱，」那是無足怪的。

然而，說實話吧，這靈魂終久會被時代踢掉，並不可怕——我那時確是這樣相信。可怕的，卻還是捧着汪精衛的靈魂，招搖撞騙，「出賣狗肉」以至於既不「悲憤」又無「惶惑」者流。

「哀莫大於心死，」連靈魂也沒有的人，我是無法與之對抗的。這麼一來，我要寫文章了。「略論叫化之類，」就是那時想定題目。

【二】 於是「文歸正經」

「叫化」兩字，普通總寫作「叫化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就討厭這個「子」字，正如穆時英的文章裏有許多「啦」字，我一讀到別人文章也有「啦」字，不管他如何用得適切，也覺得有點討厭。反正叫化兩字也還習見，省略了個「子」字，也落得個干淨。

其實在我們鄉裏，「叫化」是叫作「討飯」的。這名詞我覺得非常乾脆。在我鄉裏的叫化，除討飯以外，確也別無營生。而且照例是老老實實走到前門或後門，伸手要飯，如此而已，既不虛張聲勢，也不卑恭屈節。做施主的也例少斥叱，一碗白飯，和和氣氣送上，有時還問一聲：「鹹菜要哦？」眞

像招待一個客人。

但也有事出例外。一年之間，偶然有一二個「討飯」要的卻並不是飯，而是「孔方兄。」所謂「孔方兄」者，我們的後輩，怕已無法索解了吧。外圓中方：名曰制錢，每當新年，用紅繩穿其中，與姊妹比壓歲錢多少，其樂誠不可及也。而這些討飯，目的竟不在飯，而在「孔方兄，」足見「孔方兄」之神通廣大。然而爲求達其目的，照例身上背着一隻蛇籮，裹面藏的就是蛇。赤鍊蛇，火燒蛇，據說還有練柱蛇，名目繁多，不勝列舉，他們來到時，孩子們無不既懼且喜，羣隨其後，他們大都氣慨昂藏，不多說話。站立門前，伸手入籠，出蛇玩弄。當此之時，孩子們照例卻走三武，然猶不忍遠離。蛇在他們手中，盤曲自如，或循臂而上，或沿頸而下，伸着如絲之舌，如同一絲火線竄躍，確有一些媚惑。世俗以蛇蝎喻淫婦，我想，那與蛇舌大有關係。但這可不必說了，考證學家已當了駐美大使，這個「我想」是無從找到佐證的。總之是，他們就是那麼玩弄一回，主人就悄悄送上錢來。他們卻非常坦然，接了錢，又走向別一家去。這樣的傢伙，鄉下人雖然恨透，一遇兒子不肖，就斥之曰：「你背蛇籮的！」但終久不得不待之如禮。所以我們孩子輩稱之爲「強討飯。」討飯而至於強，固然是人心不古，但畢竟還保留三分人氣。我確是十分尊敬他們的。

十五歲那年，我總算和這「老死不相往來」的故鄉告了別，到府城一家師範學堂裏去讀書。鄉下人上城，據說應該對城門行「三跪九叩首」大禮。我雖沒有這麼辦，但有鑑於從航船登陸，那裏濠河一帶小飯店拉客之熱勁，我確實立下「一入校門，足不出戶」之心願。世界在我的身邊是如何駸駸的馳過，我簡直閉了眼睛，什麼都沒有看見。大概在二年級那年，據說是我們的省長呂公望，爲要提倡體育，召開全省中等學校運動會了。我在我們體育教員于鳳鳴先生指導之下，學了一套「工力拳」——我至今還不知這三字是怎麼寫法的——也算是個選手，上省城杭州去了。夫杭州之有西湖，那是聞名久矣；打拳之暇，上靈隱玩玩，雖非騷客詩人，而爲一個拳師，大概也是免不了的。生長在鄉僻之區，看慣的是高山崇嶺，綠疇平野，靈隱之優勝何在，我確然有點渺茫。但世界畢竟不同，使我吃驚的，依然是一路上的叫化。大概開運動會之類，總在春光明媚之時；而這也彷彿成爲世界定則，進香的太太小姐，也決不肯放過這「春意闌姍。」於是「紅男」而兼「綠女，」靈隱道上，成爲人山人海。那些叫化，沿路求施，自是「千載一時」——其實是「一載一時」——怎能平白放過。叫化也就叫化吧，反正我總不給錢，他們餓煞也是他們活該。可是實在不行，每一個叫化，總有一付怪形狀，不是瘸了手的，就是血淋淋的爛了腿；尤其是爛了腿，差不多是一望皆是，膿血鮮

豔奪目，或蠕蠕在動，或滴滴下墮；而「太太奶奶」之聲，又復不絕於耳，既悲且慘，不忍卒聽，我終於也不得不掏出錢去了。

遊過了靈隱，返歸逆旅，與同爲「拳師」兼是「宗姪」又復「同學」的紹衣，談及此事，紹衣卻說我上了大當：「那些腿上的膿血，全是蠟燭油渣上去的。」於是我始恍然於以欺騙求憐憫者之可惡。「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鄉曲的「討飯」一變作城市的「叫化，」也就其不可問聞了。

我從此就憎恨叫化之類的卑汚的靈魂。

其實這樣的「以欺騙求憐憫」的做法，還沒有卑汚到萬分。

要發生五卅慘案的前一個月，我因爲失了業，流落在上海，即現在的孤島；住在閘北一幢小屋的亭子間裏，終日無事，不免往街跟閒踱。吃飯固然成問題，然而「拉矢」更成問題。爲了「簡便」起見，我是每天一早終跑到西藏路（而今則改爲虞洽卿路了）寧波同鄉會，「拉矢」而後「看報。」自華界而至租界，世界竟成兩個。閘北一帶叫化之多，那是無以復加的。而租界之上，則大都是吃開口飯的所謂爲「看相」「測字」之流。「叫化」之爲國產，於此已可斷定。而且他們要錢的

手法，似乎顯得有點特別，彷彿父母多長了他們一個腦袋，不住地用額角碰着地面，谷谷作聲說這是假吧，實在假也不得。仰首俯首之間，我是分明看到他們額上殷紅的栗瘤，而且有時還綻出血絲來了。我自然是不免「同病相憐，」甚至憤怒得要破滅這個世界。然而，易地而處，我是決不願自毀以求憐，延殘喘而爲榮的。那時的心境，即在今日，我還分明記得：何如收天下的叫化，全都沉之於海，使其與濁浪相角逐，或放諸孤島之上，使其相互吃食。豈不更爲勇猛而悲壯。誠如此，則我也極願「奉陪」了。

然而，我的更大的憤怒，卻是爲了苟延殘喘，竟自「欺詐」而至於「自毀」了。於是所謂「人氣」也者，那是「掃地盡矣」了。

還在二年以前，我偶然在交通路上，看到一個更出奇的行脚僧似的叫化。一邊「哇呀哇呀」的唱着，一邊卻拖着足足有二三十斤重的粗長的鐵索，而把鐵索的一端，用鐵針鎖在鼻梁之上，雖然在他拖拉之間，不免時時用手幫忙一下，但看那墳起的鼻梁，已可想象到他中心的痛楚。然而他卻必須充作好漢，發爲「哇呀哇呀」之聲，與鐵索的「鏘鏘郎郎」之聲相和，藉以冲淡這中心的痛楚。他一次次的拖過來，他又一次次的拖過去。他彷彿沉醉於聲音與痛楚之中，而一無所覺。他甚

至不向兩邊旁觀者睃一睃眼，表示哀求。他彷彿本無所求，而以其高明的技術動人，使人不得不有所施。這英雄的事業，確使人歎觀止焉。然而在我則不免寒心，這是極自毀以求憐的至境了。我猛然想到彼時的高明的政治家今日的國賊叛徒所謂汪精衞者的言論：我們一切不如人，還是暫時一齊躺在街心吧！——躺在街心，任人踐踏！然而猶恐他人不來踐踏，又復自己作踐一番。而現在則是尙嫌別人作踐不夠，再把自己作踐一番的通電也發出來了。這是我在當初要寫這篇文章時所萬萬想不到的。

【三】還是「太史公曰」

文章已經可以了結，但覺猶有餘意，結論之類，大概終少不了。而司馬遷牛馬走所習用的是「太史公曰，」就讓我也來照抄一下了吧。

太史公曰：吾嘗游東瀛，卽今之侵略國日本是也，絕未見街頭有如此之多的「國產，」故亦未見有捧「國產」其人者。偶在早稻田，見一道貌巍然之人，身佩短刀，以麥桿織成之大帽——無以名之，名之曰大帽——籠其頭，手執尺八，吹之，嗚嗚作聲，對門而立，稍頃卽去，聞其聲，頗使人有「何

時歸看浙江潮」之慨，彼邦人士，謚之謂「武士道，」其亦乞食之流亞歟。又聞有深夜破戶入室，不私取財物，惟求與主人作長談，上至政教文化，下至細民苦痛，無不談得娓娓動聽，必至主人賜予報酬，然後揚長而去。彼邦人士，名之曰「說教強盜！」我絕未聞見任人作踐以外又來自己作踐以求其所謂「榮譽的和平」如汪精衛無恥之尤者。則我於割肉作香，祈求多福的愚婦，以蠟塗腿，欺詐哀憐，磕頭如算，自毀形容的叫化，鐵索啷噹扯斷鼻梁，似無所求而有所求的行脚僧，又復何怪！又復何怪！頭頂碰在牆上，猶自以爲是「老子，」阿Q的精神，我不知其將在何日消滅！嗚呼，噫嘻，悲哉！

論「沒有法子」

說起來又是算舊賬，好在算我自己的，大概也沒有什麼。

東京「十三事件」還沒有發生，我是住在早稻田一位寡婦的貸間裏，也不知是那寡婦擋了駕，或者我竟失落在日本警察的視線之外，住在那裏三個月，可沒有像住在別處一樣「三日兩頭」的來拜訪你。在這樣的環境下，讀書是最安心不過的。因之，我很沉醉於細細地讀報的生活。

離了故國，也就更放懷不了故國，這心境大概誰都有的。所以一切的病裏面，懷鄉病該是頂頂美妙的。我不大理解病臥醫院中之跟漂亮的看婦談戀愛的那種風情與趣味，但醺醺的如同微微陶醉似的對於祖國的溫熱的眷念，卻是頂頂叫人奈何不得的。

每天展開報紙，首先注意的便是那有關於支那的新聞和論文。時過境遷，記憶全成白紙，我也無法來收拾彼時的一一的心境。可是有一件事卻使我不能忘掉，那就是彼邦人士對於中國的一句口頭語的譏諷。

大概是新居格吧，遊了北平——那時是稱做北京的——一趟回去，就在讀賣新聞文藝版上發表他旅行的感想。他彷彿用科侖佈發現新大陸似的口氣，說明中國人「沒法子」這句話的廣泛的流行，實在是很可吃驚的。照彼邦文字，應該寫做「仕方ナイ（Sikatanai）」的，可是他卻照中國原字寫上，以示鄭重。他指出這是中國民族性的特徵。我對於這種說法，當時頗感到憤怒。所謂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也還是軍部的策士。

但我也不是毫無理由。未進早稻田以前，我住在市外西荻窪。這離井之頭不遠的小村鎮，大概很少異國人的足跡，於是人們都把我們當作動物園裏的珍獸，頗有另眼相看的情形。連一家買冰

店的「子供」也常常跟我們來玩了。不知是受的什麼教育，一談總談到東三省的富庶與豐饒。「將來，我們也到那邊去過活。」展開地圖來看時，居然也和日本國土爲同一顏色。這對於我的侮辱，實在駕任何侮辱而上之；然而爲了這孩子的家境的困窮，我卻又爲他的受愚而憐憫。在這一種悲憤的記憶下，讀了新居格這論「沒法子」的文章，我是不能「廢書三歎」就可完了的。在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十月三日的早晨，一個鐘裏，東京市內市外的中國留學生，被檢舉者達六七十人之多，於是我更憎恨這不很有理性的國家，覺得專爲自己的修業而留滯在這國家裏，是我的恥辱，我要看看我的祖國到底有沒有法子，我回國了。

祖國有它的光明與黑暗，我確實見到祖國的有法子的一面，而且，我雖困難，也時時在尋求法子。然而，沒法子之爲「國嘆」，正和「他媽的」之爲「國罵」一樣。我們也無所用其掩飾。雖然用語略有不同，或曰：「沒有辦法，」或曰「有啥法想。」但總之是表現「日暮途窮」之態，蓋亦有其所由來。古之人，「日暮途窮」據說作興哭的。阮籍泣途窮，已成爲名典故，不必再介紹了。便是猛鷙如項羽，兵困垓下，也還歎息於「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自以爲對自己的運命盡足了力。然而「豁達大度」的漢高祖及其臣下，卻處處從沒辦法中想辦法，便是太公捉去被烹，尚欲「分我杯羹，」

能動心忍性於前，就能打出一條血路於後。從「沒法子」而到「有法子，」也還得歸功於殘酷的鬬爭吧，打狗索性打它個死，這裏我又要涉筆到汪精衛了，眞正是一條「沒法子」的軟蟲！

中國社會實在也是壓迫重重。外有帝國主義，內有皇帝老子，封建軍閥，官僚士大夫，買辦地主，……這一切壓迫，全都落在挑糞桶的農民身上。（之後，自然有工人來分擔）這眞是一擔過重的糞。今天加了這一種稅，明天又有那一種捐，送租之外還須送雞，種田之外又有征役，便是老婆被地主佔去當小女兒被公子強迫成姦，也還是眼開口白，搖搖頭說：「沒法子。」士大夫聽命於官僚，官僚又聽命於槍桿，凡有所見，也不該自作主張，「等因」而後「奉此，」「等因」未下，「此」亦難「奉，」若有進言，聊加改革，也還祇能說「沒有法子。」被壓迫者如此，被壓迫的壓迫者又如彼，所以專制世代，皇帝就成聖口。萬民的運命，全繫於聖口的一言兩語。而歷代皇帝，大都昏庸，也未必眞有辦法。在下既須「馬首是瞻，」在上又無「迴天之力，」積習相沿，「沒法子」也就不翼而走了。

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雖愚，卻還能於「由之」不得其道之時，略示反抗。國罵「他媽的」的流行，決不是無因的。自「沒法子」而到「他媽的，」這已並非偶然了。

「沒法子」的奇蹟，雖於九一八以前，已爲彼邦人士所發現。且於是而斷定中國終於將被征

服。因爲這邊既是坐困於「沒法子。」那邊自然祇要「略施一計」好了。「計」者亦「法子」也。以「沒法子」當「有法子」其敗也必矣。「九一八」一試，果然「言不虛傳，」唾手而得四省土地。但四省義軍終於也他媽的幹了起來，一直幹到現在，越來越有法子。這是日本文士以及軍閥所萬萬想不到的。

六七年來，中國是在沒法子中尋法子。英明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居然有了最最正確的法子了。七七事變，全國人民抓住這法寶，一直跟日本軍閥打了一年六個月，從「大法子」中想出「小法子，」用「小法子」來幫助「大法子」的成功，而一貫以「他媽的」的精神。每個人民將知道運命本握在自己的手裏，祇有堅實自己，才能決定自己！徬徨慌張以接受別人的「法子」爲「法子」的賣國叛徒，也給一脚踢出於國門之外。「殺了他！殺了他！」的呼聲，已經普遍於全國角角落落，我以是知道中國終於有法子了。如其再能讓我到東鄰去住，我將聽到他們滿街滿弄的「仕方ナイ」吧。

後記

「魯迅風」出世，總得撐「場面，」接連寫了三篇雜文；（收在這裏的是略論叫化之類及論「沒有法子」二篇）忽然自己感到：有點「老氣」了。雖然還沒有到「橫秋」的地步，但專寫自己「過去，」總是叫人「頭痛」的。

可是這合集的編者，要我在自己雜文後面，寫一篇所謂「後記，」在這樣的「心境」下，眞不知如何寫起。

平時我不大願意跟朋友「訴苦道悲，」但一提起筆要寫些於自己有關的事，我的心是酸的。然而我非常明白：在今天我沒有讓我的筆傳出「心酸」的權利！我還是讓我要說的話吞下肚裏去吧！

平時我並不珍惜自己的文字，我是連佔有自己的文字的勇氣都沒有的。這回收集，我是最後一個交卷。本來是無法遵命的；也因爲有人拴着我的鼻子上過台，接着就用鞭子趕我下台了，美其

名，則曰「試辦。」人壽幾何，我不知有多少回可讓人家一試再試，因之對那時的文章特別珍視搜集起來，這就便利今天的編集了。自「自由談復刊獻詞」至「中國沒有佛朗哥」止，就是那時候寫的「東西。」

自然，也有例外，「曲的效顰」卻是自己所編的刊物上被抽掉，而寄給「世紀風」發表的。還有兩篇，因爲是「打架」文章，也就不登此「大雅之堂」了。

自去年十一月開始，我又在世紀風上跟別人吵起架來，寫了幾篇「不應寫」的文章。現在爲「懲罰自己」起見，一概不收在這裏。這和王秀才把自己女兒關在冷屋裏讓她活活餓死好等將來請塊節烈坊的心境是不同的。這裏祇收了一篇「關於邊鼓集」，略見我寫雜文的經過；別無「自拉自唱」用意。

爲了周作人先生被刺，我寫了篇「周作人先生的悲哀，」陶元德先生頗不以我那文章爲然，我又寫了篇答辯。把陶文也收在這集裏，無非讓讀者讀來明白一點。但這確然也有點「魯迅風」了。好在魯迅之前，古人有唱和之作，也有一樣收在自己集子裏的。

後記何用多記，就此結束，拉倒。

原

书

空

白

页

文

載

道

作

原

书

空

白

页

略論「瓜子文學」

文人的筆，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就成爲女性的對頭。輕薄的渲染，肉麻的稱呼，對於女性，往往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倘用他們的習慣的說法，便是所謂「捧」。而「捧」在以姿色爲職業的女性，則反而覺得是光榮，是寵愛，比默默無聞地掙扎着的人們還要幸運。

「上海灘」上有一種以「捧」爲命脈，而有時亦能靠「罵」來飽袋的文字。我暫時的叫他們爲「瓜子文學」。它有些引誘性，容易滿足小市民們的胃口。對於他們的空虛猥瑣的生活，的確也是一種調劑。但多吃，是無聊的，而他們卻喜歡無聊，在無聊中漂泛着。總之：是消閒者最出色的供具。這有「銷路暢達」四字做着明證。

捧的對象呢？前面已經說過，大抵是以姿色爲職業的女性：略露鋒芒的女伶，「聲譽鵲噪」的舞女，被四面追求的「紅星，」但只限於追求，倘一出嫁，這權利也跟着失卻了，而且有時還要受到一些惡意的妒忌或譏諷。還有是容易生病的娼妓，自以爲是「花瓶」的女店員，八面玲瓏的交際

花，以至出席什麼什麼大會的女運動員。然而，對於舞女或妓女，他們是不以舞客或嫖客自居的。因爲這不免顯得有些「俗」相。但事實上，還是爲了文筆雖健而囊橐則空，「愛才若渴」的「佳人」在什麼都以法幣爲前題的眼前，畢竟是找不出的。所以闊少和才子也就不能並兼了。

願意知道別人的私生活的人們，自然是多得很。因此，這一類的文字也有着落了。化幾分法幣，可以窺到許多繞在周圍成名的女人們的隱秘，難道還不上算嗎？雖然自己的隱秘總是不願有人曉得的。

於是而各種「藝人膩事」也紛紛的閃現於我們的眼前了。某坤伶的梳粧檯怎麼樣呀，某「紅星」的游泳衣又那樣呀，某舞女在什麼地方哭泣，某交際花在那個旅舍過夜。而且，詩興也會突然的發作了，有的感慨身世，有的借此打了一通油，有的，則儼然以才子自命，看見被冷落的娼妓，竟會汗毛凜凜的引爲同調。無病，固然也要呻吟，但如偶逢小恙，則就更好了，所謂「多愁善病，」原是雅人的副業。

但他們還有一種卑劣的傾向：凡是他們所捧的脚色，只能彼此「色授魂與」的永在泥潭中浮沈。如果有誰想划出水面，力求上進和約束的，那麼，就會一脚將她踏死。而她們的衝撞的勇氣和

熱情原是有限，不給予同情，反投以唾沫，則在身受者即使不吃安眠藥片，而這創傷也足使她疲乏下來了。

捧是有心的，而加以挑剔，挖刻與侮辱的有時倒是習慣。據報載，坤伶王熙春延律師訴某戲報以誹謗罪，說是中有「褲帶大鬆特鬆，」「鬧醋勁開條斧，」「妖姬」一類的文字云云。

這自然是侮辱。但訴之於法律，還是治標的做法，因爲這是這樣的社會決定了以賣藝爲生的女性的命運。倘使我們留心一下游藝廣告，有時也會使人覺得非常的難堪。什麼某某在這幕中「風騷無比」呀，某某在這戲中「脫褲子」呀，某某跟某某「大吊膀子」呀。

這倒底還是在做廣告呢？還是在損害女性的尊嚴？在這種地方，做廣告者縱令不負法律上的責任，但在道德和人格上，也是應該負責的。

要盼望文人的筆，不成爲女人的對頭，這是整個的社會的問題。也就是說，怎樣才能使「瓜子文學」的殘焰壓抑下去！

掃除逸民氣

一個國家，快要到了滅亡的時候，免不了有許多死心塌地的奴才，趁這機會來哄一下，廉恥與氣節可以撇開不管，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只要有官可做，有錢可摸，利慾之外，就再沒有什麼足以值得重視或保持的了。自然，在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許多流鮮血，拋頭顱，不屈不撓的衞國英雄。雖然結局還是顯得十分的悽慘，但人間的正義，國民的良心，卻總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了最光榮的一面。而且使我們知道取捨，知道學習。倘說，歷史是會進化的，那末，這應該是最光明的一條大道！

然而，站在奴才與英雄之外，還有另外的一種人。漢奸國賊，他們是看不上眼的，做官發財，也有些不高興。這一半因爲他們不但愛惜廉恥，而且更由於自己的身有餘蔭，家多累積，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活。在「酒酣耳熱」之餘，他們也會寫一些義憤塡膺的詩句。寫到英雄，必須是跟美人並列，罵起降臣，總要托出自己的淸白，對敵人是抱着畏而遠之的態度，但缺少了反抗的勇氣，美其名曰「無謂的犧牲。」雖然也不承認漢奸的事敵，是在「斡旋和平。」卽使有所崇拜，大抵也祇限於個人的行動。至於集團的力量，羣衆的精神，他們永遠是不加正視，有時還反而投以誣蔑。當然更談不到要想他們來參加了。然而，捧女人，玩山水，寫字，畫花，建造別墅，談論吃着，品弄絲竹，結合朋比，甚至於打掃墳墓，僱用書僮，無不件件講究，力求雅緻。而且往往滲以微痛，寄以幽憤，似乎是在表示「不

忘國難。」不錯，人能夠無時無地而關懷祖國，這原是值得欽揚的。但將嚴肅附於風雅，將殘酷化爲頹廢，徒有感傷而毫無積極與堅韌的毅力，卻決無裨於實際。何況又是邦國之存亡。

這樣的人物，在明末至明亡以後尤其多得很。如「江南四公子」侯方域，冒辟疆，吳應箕，陳貞慧之類，也就是最出色的逸民。他們較之於阮大鋮，錢牧齋諸公，原已略勝一籌。但雖無幫兇之志，也終覺缺少一顆易暴之心。我們所敬愛者，應該是史可法，黃黎洲，張煌言，顧亭林等，能夠在危急之際，負起一肩重責，不僅有堅決的生之要求，而且還有慷慨的死之準備。我們雖不必用「雖敗猶榮」一類的策論家口吻去稱讚他們，但不能以勝敗來論英雄在有時也正是實情吧。

這都是過去的事，加以毀譽，是各人的自由。至於眼前的中國，卻大大不同。因爲所爭取的是勝利與生存，殺身成仁，偕城而殉的烈士，到處都有。但這是勝利的代價，是生存的發軔，與「媿無半策匡時艱，只餘一死報君恩」的，取消信心的氣節觀，完全相反。因此也更希望大家沒有半點逸民的血液。不事敵，不附逆，自然是要緊得很，不過這還祇限於消極的個人的榮辱。此外，我們更應該多發揮一些積極的力量，從合羣的生活中去實踐建國的責任。

即以侯方域與冒辟疆而論，前者已經在清初中過了副榜，敵我之明這裏可以不必提了。冒辟

疆呢，近來被許多的文豪捧得很高，連戲也排演過了。但他的姨太太董小宛卻着實的被糟蹋得厲害，說是曾經給做和尚的順治皇帝作過妃子。因此就使冒公子大爲氣憤，嫉視順治。不過這事情的眞僞到現在還不能確定。但卽使有這樣的事，然爲了一個姨太太而弄到天翻地覆，也不過是闊少搶風，流氓鬬氣，跟吳三桂相差一籌，我們實在是用不着去同情他的。奈何鬧哄哄的文豪吹捧於上，戲子賣力於中，使看客墮淚於臺下呢。雖然雅人的用心不易給「未能免俗」如我輩者所懂，但逸民的行徑在淪陷地上終也不是可以喝采的。

寫到這裏，我記起了魯迅先生在「半夏小集」裏的兩句話來——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目前到底不是任何人「逸」的時代。明末的「文藝家」也眞可謂「逸」得痛快透頂了，但「清初」終於掉了「明末」。我看逸民與順民之間，雖多少有些距離，然而不深！

秋窗隨筆

又是葉落風凄的深秋了。哦，「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住在血腥中「孤島」的我，讀了這兩句詩，不知怎的，總覺得有些異樣的感覺，往往還想到更遼遠，更縹緲的事情上去。但每當新出的雜誌的編輯先生向我索稿時，卻又似一團灼熱的火，叫我握一握。是的，我們還不至於麻木到連這是什麼的世界，什麼的境遇都會一清二白的忘掉。

在這番戰役中，文化方面所受到的浩劫——現在恐怕還不是細算的時候。在同時，我們又看到了多少的文壇小丑，一個一個的向屠夫的鋒下舐着一些血腥，作沒落前的喘息：開酒店，編刊物，做檢查，辦電影，這看起來也彷彿像一道光，但返照之後，卻依然還是消斂。使我們所感到的，只是可恥，而並不是可悲。像這樣的傢伙，除了向死屍身上啃一點爛肉以外，他將永遠的嗅不到活人的氣息！

這使我想起了明末的士大夫來了。燕子箋到現在還不失爲一部優美的傳奇，比之於誨淫幫兇的作品，終要強了一些罷。然而阮大鋮的人格與道德，卻久矣乎已有定評了。國家到了危急的時候，也正是這一班仁兄得意之秋。他們只消將姨太太粧台前的白粉，輕輕的搽上鼻子，立刻又成爲煊赫一時的新貴人了。雖然氣節與廉恥，是中國民族所最講究與崇尙，尤其是如馬阮之流，在半時

是說得比任何人要清脆，要起勁，但一旦到了立等「兌現」時，終於還是一張「空頭支票。」中國人所積的血債不可謂不多，倘論債主，則這樣的脚色也正是其中之一。

前幾天看到一本外埠寄來的雜誌，其中有引到朱孟實先生說起關於周作人先生的事件。朱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明末東林名士逼阮大鋮走上附逆的路。」這句話是茅盾先生所引，朱先生的全文惜不能看到，但意思則很明顯，想作爲攻擊周作人者的警戒而已。用心也可謂良苦了。然而，單是從這句話看來，我覺得還不免有些缺然。阮大鋮的附逆正如湯爾和的事敵，是千眞萬確的事，且前者也早已蓋棺論定的了。至於周作人呢，卻還是一個謎。猜自然是各人的自由，證實則似乎還不妨稍遲一下。後來的論東林與復社的人，總以爲他們的缺點是在乎責人太苛，將君子與小人分別得太嚴，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一個人被「逼」得太緊而自己又感到「人言可畏」時，他除了服安眠藥片之外，也許會因此而自甘墮落，更加不堪。明末的情形，也許是這樣的吧。但卻以此而衡之於周作人先生，則實在是有些不切貼。像阮大鋮那樣的人，卽使東林名士不「逼，」他也是會「走上附逆的路。」一逼，或者是走得更加迅速而且猖狂一點。人到了劃分敵我，決定進退之際，如果竟因別人的「逼」而索性跑到敵人的陣地中，這樣的人，他還有什麼自己的理性與節

操呢？而周作人先生，他自從五四到現在，雖然如他自己所說已沒有「浮躁揚厲」之氣，羨慕起長沮桀溺的生活來。但，不盲從，不投機，對人對事都有精闢的見解，就是對這個苦難的民族，以及日本軍閥的殘暴的侵略，也時時刻刻的加以關切與抨擊，我想，這樣的周作人，恐怕不是別人的一「逼」而遂會步阮公的後塵吧？

信如朱先生所言，則湯爾和董康潘毓桂之流，又是誰逼上的呢！何況，經朱先生這樣的一說，彿覺得阮大鋮附逆之罪反而由於東林名士的「逼」迫所造成，然則阮公又何幸而有此一個新知己！這是題外的話，可以不必再說下去。現在有了「周作人事件」也實在感到夠了，免得再來一個「阮大鋮事件。」

清許善長碧聲吟館談麈卷四有一節話云：觀霜猿集一詩云，「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夫婦列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家八股生。蓋甲申三月之變，吳中子弟口號，譏訕先達曰，將紅簡一，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獻納之敬，通家生文八股頓首拜。雖近澆薄而國破君亡之故，未始不由於此，習八股者，亦可憬然返已。」

說得非常的沉痛與悽慘。但這時「崇禎夫婦」早已上弔大吉，馬阮二公的亡國本領大概也

發揮得淋漓盡致了。我們雖然也聽到過「抗戰八股」一詞，然已經行者先生用專文「建議廢除，」則我們應該多寫些更精悍，積極的文章。以上所抄的一段書，固與「周案」不相干，「馬議」也無關，但對於明末的情形，似乎也有所談補。何況這叢刊的名稱又叫作文獻。

檢討

俄國有一個寓言：一匹牛拚命地耕着田，蒼蠅休息在牛角上，自然是一事不做。然而待到這匹牛弄得精力竭盡回家的時候，蒼蠅卻誇大地說：「我們耕了田了。」

「耕了田了，」不錯，他是以矢沫爲精力，以鳴聲爲議論，而把偷懶當作休息了。

這眞諷刺盡了一切的趁現成，裝面子，喜歡誇大的懶蟲們。

但可惜不能將別人的眼睛，一齊蒙住。在旁觀者的正直的心目中，牛與蒼蠅的區別是再也明亮不過的。這一口誇大，反而顯出了他的無聊與卑鄙。

二十七年前的締造共和，推翻君主的烈士們所流的血，是未必比漢江的波濤來得少。但也因

此而浮起了許多革命販子的外套來。彷彿燦爛奪目，全身簇新。人們也當作他是一個元勳，或者感銘，或者頌揚，而自己當然也以「耕了田了」自居。然而，不久就現出了原形。例如袁世凱。他從北洋大臣到中華民國總統的一條路，是爬得多麼的快。迨到「大典」告成，開步「登基」之際，終於證明了他其實還是一隻蒼蠅！即使是不稱「帝制」吧，他也會用別種的魔術來出賣革命的。對於民國，終歸是一個從頭到尾的叛賊。試看二十七年來，除了袁世凱外，儘管花樣各有不同，但對於革命種子的斫伐則是一色一樣的。

而世界是決不讓幾隻蒼蠅來跳踉的。黃鶴樓頭的旌旗，分明了黑暗與光明的森嚴壁壘，但雲南一夜的火炬，是更加照澈了什麼是眞，什麼是僞，什麼是神聖與無恥的陣容。

雖然民國的豐碑因此被抹上了血污，腥穢，但也指示了一條更深邃的大路。它矗立在十字路口，行人到此，是必須加以謹愼的分辨了。

袁世凱的摧殘革命，顚覆共和，其實是不足深怪的。因爲他對於民國，本來就沒有付過什麼的代價與犧牲，既少對事業信仰的熱情，也更無一顆渴求正義的心，毀守之間，原是以一己的利慾爲前提。有如紈袴子的揮霍祖先的私蓄，從來不想一想所謂「來處不易」的。總而言之，他不過把清

廷與民國的興滅，看作一筆貿易，拿來販賣，從中去收賺些贏利而已。而且也是一位趁現成，能投機的好手。

這只要看一看中山先生就覺截然不同了。他默默地耕田，擠奶，播種。民國告成，他還是奔走，吶喊，到了逝世，依然是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這遺詞現在雖然被大家看作古廟的楹聯一般，但我們卻從這十二字中間，可以悟到一個戰士的永不苟安，惟知奮鬪的心境。他是帶了這樣的心境而去了，但休息在牛角上的蒼蠅卻又高嚷著「我們耕了田了。」說得明白一些，便是滿口「總理，」而自居「信徒」的販子們！

然而，我們也不妨從這個寓言中來作一番警惕：在這次的抗戰中，我們固然不想列於蒼蠅的隊伍；沒有自吹自誇的心理。但也有沒有出過力氣，負過責任呢？倘沒有，則即使在主觀上不想爲蒼蠅，但在客觀上卻明明白白的休息在牛角上了。中國的抗戰如不幸失敗了，那不必說。但如果勝利，我們能對得起艱苦地耕作大地的戰士們嗎？

這確是每個人民的不可遲緩的檢討。

初寒隨筆

先來引用一首熟誦了的譯詩：

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以流光的無情，雖然容易沖淡了文字的渲染的力量，但倘是一篇爲人類的生存而謳歌的作品，則就決不能使我們輕易忘卻。而倘是一種爲人類的生存而努力的戰鬥呢？是更加難以使人們模糊過去。否則，他就是澈頭澈尾的奴才胚子，麻木，昏迷與健忘原是逕通着投降的路。

這一年來，我們是從絕頂的疲怠與衰弱中醒悟過來了。每一個人的血液裏，注進了一技鋒利而新生的針。生命在一個大的洪爐中鍛鍊着，前驅的一排倒下來了，緊緊地追上來的是未死的一羣。愛人，妻子，朋友，親屬的懷念與留戀，是有的，但被一個至大的目標，一個至剛的希望所克服了。悲哀，痛悼，憤怒，辛酸，是有的，但我們是融化在整個的國家及民族的猩紅的血泊中了，而且擴大至於

眞正的人類的世界裏。舉一個例子，則台兒莊的勝利，就使各國的正直的人民，流出喜悅的熱淚，一片慶祝與歡賀的心聲從遙遠的海外送來。

中國，並不是一個可以羞恥，可以悲觀的名字。我們呼吸於這一國度的氣息已經幾千年了：大地的風，莽原的草，故鄉的花，海灘的砂，以及塞外的塵沙，江河的激流，無論你跑到那裏，改扮得怎樣，你終得承認你是一個中國人，一顆「中國的」靈魂！

而且無法跟這個國家隔絕起來。

然而，這裏卻有一個顯明的區別：我們愛護中國，支持中國的抗戰，是因爲中國的鎗口面對着黑暗與殘暴。忍受了慘烈的犧牲之後，得到的是生存，是自由，所以才覺得「二者皆可拋。」但倘是此時此際的日本人民，就決不能托着「愛國」的幌子，來鼓勵他們的統治者作瘋狂的侵略。同樣是「支持戰爭，」這二者的本質卻恰恰相反。在日本，「愛國」這一個名詞，是被林房雄與室伏高信之類糟蹋得太厲害，太可怕了。然而眞正的能夠愛日本民族的國民，爲日本的未來的命運而搏鬬的戰士，即使在統治者的嚴厲的壓迫與殘酷的箝制之下，也仍然廣泛地蔓延起於各個角落。即使是在漫漫的暗夜，也仍然有星斗的閃爍。鹿地亘先生的登高一呼，雖然招來了「非國民」的惡謚，

但卻奠定了未來的「日本共和國」的基礎。正如福剛森將軍之不願離華，雖然被北平「庸報」誣爲賣國賊，但在「舉國若狂」的「納粹氣」中，也畢竟顯示了日耳曼民族的優越的一面。要使眞理和正義獲到勝利，首先它就得有被誣蔑與被侮辱的準備。鑒諸過去，則列寧也曾經被人誣爲德帝國主義的「奸細」。而眼前的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卻又援用了這個現成的例子，來作爲他們的「不斷領袖」的受人唾棄的辯護了。這對於列寧，不又是一個絕大的誣蔑與侮辱嗎？

筆寫到這裏，不禁使我想起了去年的今天——上海淪陷的一天。

對於上海，我們有沉痛的回憶，有憤怒的控訴，但也有熱烈的愛護。自然，我們的「愛，」決不同於扯淡的文僧，幫忙的流氓，消閒的「寓公，」以及「發洋財」的買辦，高等娼妓式的名媛；失去了上海，等於失去了他們的生命，非但不能過「優哉游哉」的生活，而且還失卻了黑暗勢力的掩護。他們的靈魂，是早就賣給這糜爛與墮落的地方了。

但我們之所以熱愛上海，必須收復上海的理由卻只有一個：因爲上海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現在，它已經過了炮火的震盪，與血淚的洗滌了。雖然雨綫的軍隊撤退了，但後方的民心卻仍趨向着光明，且依然起伏着堅決的鬬爭。反奸的鎗聲，街頭的國旗，也就說明了上海還是在揚着光，發着熱。

人們也許要驚畏於北極的嚴寒吧。但征服了它的，卻還是血肉之軀的「人」！倘用北極來比喻上海，我想，我們就該從這樣的「嚴寒」中來吸取溫暖的朝氣了。

而上海，就是這麼不同地矗立在兩種人們的心中，兩種勢力的前面！

幽冥不隔喜悅的傳遞

兩年了，整整的兩年了。腥風，血雨，吹遍了這古國的每一個角落，射進了每一個人的靈魂。中華民族——這多興奮的名字，正在一座灼烈的大鎔爐中沸揚著，跳動着。前，熬，顫抖，每一條生靈都受到了殘酷的浩劫，然而也正是最末的一次。度過了這浩劫之後的將是鮮花一樣的芬芳，是大海一樣的澄清。

這兩年來，我們所經過的變化，起伏，是太悲壯太偉大了。但可惜我們缺少了一枝淋漓的「金不換，」來抒寫着各種的驚心動魄的壯舉，拔山扛鼎的苦鬬。然而，「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魯迅先生所介紹給我們的愛命堡的名句，因此也時常成爲劃分壁壘的豐

碼。

但可惜我們又缺少了一枝刻劃愛憎，「怒向刀叢」的金不換！

兩年前，數千的青年，提着沉重的步伐，沉重的歌聲，以及沉重的心，伴合着先生的精神，先生的戰蹟，以及先生的創傷，走過了街道，荒野，像一羣夜行者載着朦朧的月色，奔走着漫漫的征途。沒有人喊一聲疲乏，叫一聲苦，也沒有誰的「指使，」只有一個目標，一種偉大的力量所驅遣着。在這樣的目標和這樣的力量之前，金錢，權力，聲勢，手段，一齊的退避了，沒落了。所以我們儘管奔走，流汗，吶喊，使力，沒有人喊一聲疲乏，叫一聲苦。總之：這樣的人物應該用這樣的儀式和精神來紀念他，哀悼他。

這不是上海的「大出喪！」

這更不是無聊的偶像崇拜！

但不料戰士的尸體，落進了棺槨還不久之際，而一些蒼蠅卻又張開了翅膀，停在虎皮椅上狂叫起來了。

原來竟還有人在等着他的死！

以磊落的心胸，坦白的態度，用理論來制勝對立的人，我敬愛。既成戰友，各執一端，所爭的依然是是和非，所使的不過是筆和墨，在羣衆面前判定勝負，毫不強飾，這卽使是敗北了的，也仍然不損於他的其他的業績。至於立場各異，旨趣不同，偶有衝突，終以光明的行徑返還自己陣地的人，我也並不妄加菲薄。然而，一等到對方一瞑之後，就此拳足交加，扳起面孔，一面得意，一面咒罵，既以投權力者所好，又以快自己的私仇，向死人的墳上，噴上滿口的汚血，這樣的人，不僅是文壇的卑劣勢利的小丑，而且還是人間的最殘忍刻薄的毒蟲。借用魯迅先生自己的一句話，卽所謂「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雖然「道德」和「人格」在中國同樣的被糟蹋得非常的痛心，但在正直人們的心中，道德必須談，而人格也應該追求的。

不錯，這是過去的事。但不幸這樣的氣燄卻決非一下子就可「過去。」而且也無法傾寫我們的憤懣。最好的說明，依然還是用先生自己的話——

「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女弔，且介亭雜文末編）

我們知道世上有刻薄，偏狹，小氣與妬忌之類的缺陷，但決不能跟堅決，謹嚴，倔強與韌性等混

爲一談。而我們的幫閒或幫忙者，卻總是愛用前者的毒謚來加諸於先生的身上。

於是乎中國也幾成爲一匹最中庸而又最溫情的「犯而不校」的懦羊了。

然則在今天而紀念先生，他的天資，學力，才能也可難以學到。但看穿「這些人面東西的祕密」，卻是每一個人應有的警惕與覺悟。而且也不但純然的局限於文壇。

砲火在東方猛震着，天際露出了一絲曙光。屠刀之下，我們還出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先生生前所敬愛的異國友人鹿地亘先生，也已經扯起了反戰的大纛，號召一切被壓迫的弟兄。

別後的兩年中，我們總算對得起這飛躍的流光，對得起這一顆高大的靈魂。幽冥雖殊，而喜悅的情緒該是同樣的激越吧！

病後漫筆

在熱度發得最高的時候，我看到了這樣的一段消息——

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今晚在倫敦市長宴會席上，與日本新任駐英大使重光葵會見，兩人先默視數秒鐘，隨後郭泰祺卽微笑伸手，重光亦略略鞠躬，兩人卽告握手，郭氏並向之道晚安，繼卽轉與英外相哈立法克斯談笑甚歡。

這也眞的可謂「情景如畫：」一個是「笑」而帶「微，」一個是鞠躬而猶「略略。」於是而「握手，」而「道晚安，」而「談笑甚歡」

我在病中看了之後，就覺得有些感想。而且想說。

中國對眼前的日本固然抱着敵視的態度，但於英國卻還是友邦。所以倫敦市長的邀宴，在中國是無法推辭的。郭大使的毅然而往，莞然而笑，我們自然也不願有所責難。

宴會之類的事，有時雖然只是一種無所謂的應酬，有時卻也攸關着國體的榮辱。但這所謂「辱，」倒並不是指外交官個人的言行。例如白種人就往往以過去的中國使臣的不懂國際禮貌，鬧出笑料而來譏嘲我們。然而這決不能因此而蔑盡一切的中國人。這「辱，」是只能代表某一部份，某一時代的。而我這裏的所謂「辱，」指的卻是此時此際的眼前事實。

假定有這麼的一天：希特勒在柏林大開筵宴，被邀請的有中國的駐德大使，自然也少不了日

本與義大利的駐德大使，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吏。濟濟一堂，興高采烈。然而，這時如果突然的出現了一個僞滿的「大使」呢？

我想，倘是中國人，是無不憤怒，無不痛心，而且應該認爲嚴重的恥辱。杯籌交錯之間，別的滋味是沒有的；有之，也惟有眞正的「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悲憤的感觸而已！

也許有人以爲這是不會有的事，是我的空想與虛懸。那麼，德國的承認僞滿呢？何況以法西斯的一貫的拳經而論，他們對於弱小者還有甚麼的顧慮與忌憚？一年幾個月來的幫兇的罪惡，侵略的氣燄，燃在被侵略者的心裏正是洞若觀火。而計算起來，又豈止如某論客所說的「刺激中國民心的小動作？」

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國家。我決不忍代表我國家使命的外交官吏在侵略者面前受辱！被侮對眼前的德義法西斯，我們始終沒有甚麼的幻想。中國如其在「必要時」準備議和的話，那或者不妨對他們「改善」一下。但國策既定，戰火高燒，抗戰到底，不容少懈，執此而言親德聯義，又何異於「飲鴆止渴！」

「親德義卽等於親日！」這邏輯正是鐵一般的正確。「倫敦一席宴，」我沒有什麼毀譽可說。

但「柏林一席宴，」目下雖還沒有「出演」過，然而我是不能不替陳介大使豫先感到惶恐了。要截去這惶恐的，則必須對法西斯的幻想一刀斬斷！

「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書生有時固然不像黃仲則所說的「百無一用。」但光是「優，」其實還不夠的，倘要「仕，」則除了「優」之外，還需要拚命的爬，與拚命的擠。爬是對上，而擠是臨下。爬要爬得快，而擠要擠得兇。

曹聚仁先生曾經慨嘆於「知識份子最靠不住，固然善於義憤填膺，同時也最會賣身投靠。」曹先生自己也是一個澈頭澈尾的知識份子，他於同一營壘中所得的見聞是太多了，所以才有這樣的沉痛而又憤激的議論。

前幾天的報上，曾經說起胡適博士在美國的律師俱樂部的宴會上，述及中日問題時，曾表示「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中國萬難

接受，故決計繼續抗戰」云。

經這樣的一說，原來中國自廣州與武漢陷落後所以「決計繼續抗戰」者，還是爲了「因日方所提條件，中國萬難接受」之故！然則如果「日方所提條件，」能使中國所「接受」的呢？

然而，我們的胡大使，不但拾到了汪精衞先生的一些牙慧，而且還學來了一身的「要人病。」據昨日的報載，胡大使忽然進入當地（紐約）某醫院療養，連開會歡宴他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會，也「未能參加」了。

一個身負外交重責的駐美大使，突然會有這麼多的功夫跑到療養院裏去躺起來。這玄妙的情節，我們也只得有待於他的得意弟子顧頡剛先生之流的「考證」或「辨僞」了。

曹家樓前的怒火，鍛鍊出了幾位勇猛的前驅，但以時代巨流的殘酷，也容易於沖淡當年的血性，勇氣與熱情。五四運動的豐碑到現在也誠然還有它光榮的一面，但曾經在這一陣營中戰過的勇士呢？即以胡適博士而論，他從新青年到獨立評論之間，我們所看到的不但沒有在主張文學革命時的大聲疾呼的激昂；進攻林琴南時的桀驁鋒利，而且還帶來了「準備論」者的唾沫：「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

岸線，甚至於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還是不要抵抗！

他又曾經叫我們去恭維李頓報告團，他在廣西異動及陝西事變中主張用討伐的手段。……這種種，終於使日本軍閥的論客如室伏高信等向其大掉筆墨，而使胡博士始終跳不出保守，改良與妥協的泥沼。

不錯，這是「舊賬，」似乎可以不必計算。但我想，「舊賬」之可算與否，還是決定於一個人的眼前的進退。細溯既往，才能默察現在，遠握將來。我們決不敢用「宿命」的觀念，來觀察任何人物，然而也不得不從更深一層，更進一步的觀點上來清算一個人的思想與行動。

據說胡博士過去的主張對日讓步，是他的「良心」使他這樣說的：「我不能昧著良心出來主張作戰。」然則那時肯「出來主張作戰」的彷彿都是「昧著良心」的了。

教授博士之類，動不動就是「良心」長，「良心」短的。最近，則有梁實秋教授遠迢迢地從重慶帶來了一顆「良心，」一看，才使我們恍然的明白過來：這那裏是梁大教授的「良心，」分明是汪副總裁的靈魂！

「學而優則仕，」「仕」了，就有這麼大的用處？

糾正與批判

中國女人的命運，向來是壓在道學先生的圍剿與誣蔑之中：「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這是我們的「先聖」孔子的遺訓。但他在說這樣話的時候大概已經忘記了他是什麼人所「養」。我想。世間如果有「忤逆」或「不孝」的話，那麼，我們的「先聖」實在也可算是第一號的代表了。

然而，一面儘管是圍剿與誣蔑，一面也終於有從森嚴的防範中掙出來的人物，自然，這裏先得具備一個條件：姿色。但罪名卻又跟着而來了，據說這小足以傾城，大足以傾覆一個國家的。而且來得非常的迅速與容易。於是乎女人的被目爲「禍水」也就「久矣乎」了。

西施亡吳，貂蟬滅卓，在現在看來，似乎還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前幾年本埠的某話劇團所演出的「西施」，彷彿將牠寫成爲一位越王勾踐的女間諜似的。我看了稍有反感：想不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復仇大業，結局還須仗一個「弱女子」來完成。然則倘無西施，那兩個「十年」的

心血與時間難道就白化了嗎？這裏，卻又要引用一回一般人所憎厭的「古話」了。唐代的詩人羅隱說得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明代的侯朝宗也說：「吳之亡也有西施，無西施亦亡」我以爲這倒確是說着一部份的「眞理」的。

建國興邦，這不僅有賴乎艱辛慘淡的締造，而且也決非用女人的嘴脣或什麼所能成事。西施不幸而生在當時，居然做了一回亡國的「禍水」，但也因爲幸而生在勾踐的「臥薪嘗膽」之際，所以也就被許多人目爲越國的元勳一樣了。這與眼前的一般寧波人，叫被最高當局所槍決的王皞南夫人爲「白虎星」，恐怕是一齣類似的悲劇吧。

自歐陽予倩先生的「潘金蓮」劇本一出，於是一般比較進步的觀衆對一向證作「淫婦」的潘金蓮之流的色情觀念，乃得稍稍澄清。對於因性的苦悶而引起各種悲劇的女人，也多少得以同情。這樣的做法自然是值得欽揚的。但如其有人一定要把她套上「女戰士」的頭銜，說是因爲她敢於違叛封建禮教的緣故。那恐怕也是一種絕大的笑料。正如將賽金花尊爲「九天護國娘娘」，同樣是有些矯枉至於過正的。

但尤使人感到下流與惡劣的，是演起潘金蓮來，重心必然側重在「挑簾裁衣，」寫着楊貴妃，

動機只在於「華清出浴。」油滑，色情，肉麻，胡鬧，終於使觀衆買了一個「毒素」而去。

這樣的做法，倘已成了一種現象，我以爲是必須加以糾正與批判的。

國破山河在

語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覺得這兩句話頗有意義。倒的確可以給眼光如豆，而終日周旋於幾根椽子底下的書生們，作一種擴大胸襟的材料。但可惜中國又是一個極講保守的國度：「父母在，不遠遊！」這怎麼辦呢？還是因此放棄「游」的念頭？還是先得咀咒父母的速死？幸而下面接着有了「游必有方」的這一句。但孔孟的「周遊歷國」呢？恐怕也未必因爲孔子與孟子的老太爺老太太這時已經不「在」的緣故吧。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勿禁。」然而聖人有時其實也有些不近人情的。游興偶發，想到外面去走了一趟，這與孝道又有什麼的衝突？何必一定要看得這樣的嚴重呢！我想，這也許因爲在那時候「家天下主義」的思想已經有些成熟了，所以縱使是一種很隨便的舉動也會牽扯到跟倫理

有關的大題目上去。而使後來的君子們，覺得步門不出也眞是一件感人的美德了。

據說明代的徐宏祖先生，（卽徐霞客）確是實踐了聖人的教條的。當他母親「在」的時候；「每歲間出，先事各省名山，志有方故也。」而「始爲萬里遐征計，由浙至滇，游屐多在西南」者，已經是在「百身莫贖」之後了。（據徐筠嵀例言）但倘在現代人，恐怕不見得能夠做得這樣周到的。而這也難免使今之聖人們要痛心於「人心不古」了。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誠然，有許多地方，依然非借重於文字的傳達不可。卽以游歷而論，首先就得具備兩個條件：有閒與有錢。如果二缺其一，那就根本無從談起。至於像前面所說的徐宏祖那樣「足跡偏天下」的浩遊，更使一般靠版稅或稿費活命的書生，只有望火車而興嘆，見輪船而索然了。

自然，「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心」的辦法，也是有的。於是乎我們就想到了游記。一卷在手，讀到動人處，眞也有身臨其境之感。不過中國文人所作的遊記，大抵有一種流弊，喜歡談娼妓，講風流。雖非誨淫，究近幫閒。但大家卻覺得是「雅，」是「風趣」——或者就稱之爲「性靈，」而且往往會將和尙偷雞道士嫖妓混在一起。「天下名山僧占多，」所以游山玩水，有時的確跟「我

佛如來」發生著因緣。但對於讀者，大的害處固然沒有，卻也毫無裨益。而所得到的，終於是一種空洞而已。

記得魯迅先生曾經叫他的一位朋友看些「世界旅行記」，藉此就知道各處的人情風俗和物產。」又如電影，也不妨「看關於南非和南北極之類的片子。」因爲我們一時未必能夠到「非州或南北極去，」能在電幕上「得到一點見識，」也不失爲一種切實的方法。我以爲我們的閱讀遊記，其用意也正是一樣。例如馬可波羅的游記，就給許多學者當作研究元朝的社會經濟的史料。但自然，有許多的白種人，一到中國，看見蓄辮，纏足，祀神，賣婢，納妾，吸毒、之類的缺陷與惡習時，就會惡意的寫成報告，或攝爲影片，向列強報告說，「喏！這就是中國！」再加以作者任意的誣衊與歪曲，使大家覺得中國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國度，因此也只配永遠的受外敵的支配與奴役了。這樣的游記，對於弱小者，固然是一種絕大的侮辱，然而我們也應該痛切地來一下警惕與自省。所謂反抗，是必須通過了猛然的覺悟以後。

聽說現在的有些未到過中國的英美民衆，以爲中國的抗戰，還是像清末的對外作戰時那樣的鬆懈，那樣的「滑稽。」而這，顯然也是受著過去在書本上，畫片上或口舌上宣傳的影響的。

說到這裏，眞也要「言歸正傳」了。本刊的編者先生所出的題目原作「憶舊游」。我雖然「游」了幾回「天堂」，但那「憶舊」的情思，已經給殘酷的流光漸漸的磨鈍了。我只覺得像杭州那樣的所謂淡抹濃裝之區，將一代英雄岳武穆的坟墓埋在那邊，無論如何是有些不大調和，引不起半點慷慨激昂的情緒。「人傑地靈，」地理環境與民族性的確是有著連繫的。但尤使我感到憎厭的，是岳墳前的秦太太的鐵像，赤著身，露著乳，一陣風來，臭氣撲鼻。大家也覺得以一摸而爲榮。然而，這到底還是對死去的岳飛表示尊敬呢？還是侮辱？我們既然要對抗敵殉國的將士，表示幾分的褒悼，那麼，不論是在形式上或精神上，使人所得到的印象應該是崇高，是莊嚴，是澄潔與神聖。而決不是這樣的惡趣與猥褻！即使是由於嫉惡如仇，看到漢奸國賊的罪惡，所激起的義憤所驅使，——那心地，我們是可以原諒的，但那做法，我覺得太有些「原始性」了！

嗚乎！「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潛在我們的筆下的，有多少悲壯，熱烈，慘厲，卑鄙，殘暴的故事，還沒有寫出呢！

說到「流寇」

我在上一期的本刊上，曾經說起關於明末的「流寇」。自己覺得意有未盡，還想再說幾句。

要瞭解歷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如果不從當時的經濟背景着眼，那恐怕是很少能夠得到「要領」的。遺老們一天到晚的罵「拳匪」，罵「粵匪」，罵「捻匪」，以及什麼「匪」，但結果是怎樣呢？「匪」還是「匪」，來「匪」去的起伏著，並沒有因他們的筆或舌而有所減少。而現在被我們稱爲「民族革命」的太平軍，在那時的一般負有「孤忠節烈之氣」（借用林語堂大師的「語錄」）的「中興名將」的心中，正是十惡不赦的匪徒。然而，在後來的研究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我們，倘使能夠消弭各種的成見，來作一番客觀的檢討，則就不能不承認太平天國的革命：是含有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先驅的意義的：「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復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之志也！」在當時的苛征暴稅，官僚專恣的黑暗政權中，這是顯得那末的激越而又沈痛的憤嘱啊！

在那時候，如其沒有高利貸資本和地主階級的阻撓，歐美資本的鎮壓，以及他們內部的破裂，傾軋，那恐怕即使有千萬個「孤忠節烈」的「曾文正公」，對於滿清主子的命運，依然是無法挽救的。「時勢造英雄，」曾國藩又何幸而生在當時。但憑了自己人的血，來浮上奴才的寶座，這樣的

人物，對於我們，無論如何是不配崇拜或稱讚的。而「寧贈外寇，不給家奴」「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類的可恥的奴性，不幸到現在還存在於一部份煊赫一時的「大員」的心中——雖然一方面儘管在推崇洪楊，恭維太平軍。

至於「流寇」他們的政治意識固然沒有像太平軍那樣的明顯，高強，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了這個廣大的農民暴動的意義。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於貧農，他在元末的農民叛亂中，乘機而起，終於攫得了政權。然而因爲「明朝對於任何一個土地問題，從沒有從農民的立場給與解決，所以它絕對不是甚麼代表農民利益的政權。因之結局明朝仍然不外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的政權。」（見日本佐野袈裟美著中國歷史教程）不過，在一個新興的統治者，爲了要征服「民心」的當初，對於勞動者，的確也可能的略施一些「小惠。」這只要看一看眼前日本軍閥對中國人民所採取的「懷柔」政策，不是一個血腥的例子嗎？他們想消懈一下農民暴動的進展，就不得不緩和一下榨取與剝削了。

待到崇禎的末葉，終於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而使崇禎帝也只得跑到煤山去上吊大吉了。所以，只是一味的叫罵「流寇」長，「流寇」短，而不去探究產生這暴動的緣因，甚至妄加引

扯，刻意挑剔，對於事實的眞相，是永遠沒有什麼裨益的。

明朝的吳三桂爲了一個美人陳圓圓，不惜「衝冠一怒，」挾外敵以自重。借了滿洲人的兵，來「剿剿」當時的農民叛亂。但他的結局，還是被滿洲主子貶爲「逆臣。」這倒的確可以給現在的許多吳三桂們作當頭棒喝。「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何況陳覺生與殷汝耕更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呢！

槍與筆

應該用怎樣的筆觸，與怎樣的心境，爲抗戰期中的中國文化界艱苦奮鬪的毅力而祝頌呢？然而，又應該用怎樣的敵愾與悲痛，爲瀝血於敵人鋒鏑下的許多文化鬪士的殉國而控訴呢？

每當我看到了新出的圖書或刊物——不論它們，有否跟當前的抗戰有關，而只要跟我們的自由，正義以及人道有連繫的著述的時候，我，一樣以無限喜悅，無限興奮的手去迎接過來。是的，我們依然需要維護常態的精神活動！

然而我也看到了我們的詩人蒲風，作曲家張曙已經先後的在敵人的屠刀下獻出他們的生命了。哦！這一代的受難的文化鬪士，這以磅礴的熱情來刻劃，來歌咏民族存亡的藝術巨匠，是這樣莊嚴的屹立於祖國的一角。有什麼絢爛的辭藻，有什麼悲壯的情緒，能夠配得上這偉大的犧牲。「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眞眞死掉了。」不錯，紀念與哀悼之類，與其說是對於死者，毋寧說，還是對於活著的人較有意義吧。「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這話也許有些感傷，有些蒼涼。但誰又敢說在這樣大的創痛中間，而不許個人的一些因此引起的低徊悵惘之感啊！

日本軍閥以殘酷無比的砲火，在「不降則殺」的原則之下，向全中國的每一部門進攻。其中被摧殘得最慘毒的，是生命之外，則文化的遭受浩劫，也佔著民族血賬中厚厚的一頁。最近世界書局在虹口存放着的幾百萬册書籍的被劫奪，更是一個顯明的例子。這是他們在先之以密誘，繼之以恫嚇而後的最末的一手。我感動於這書局當局的堅決的苦鬪，使傳達人類的正義生存的「文化，」發揮了眞正的任務。但我尤其欽服於遭逢了同樣的命運之後，而仍能作積極「建設」的一切「出版家。」

抗戰！漸漸地澄清了我們的思想。抗戰，更飛躍地擴大了我們的瞳仁，拓展了我們的胸襟！資本

論，列寧選集，亂彈及其他，以及魯迅全集等的出現在夜色蒼茫的「孤島」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倘用一句叫作「雨後春筍」的成語來形容，那倒是很切貼的。這不僅指數量的「蓬勃」，而且還說明了它的新鮮，豐美。這是大野上萌芽的苗放，這是焦土中憤火的閃爍。總之：是一切被難的文化鬬士的崇高的祭禮！

無國防卽無文化。制強敵的死命的，則槍與筆之間也還是不可分割的。

踢走它

我在本刊第三十五期關於歷史的引用的最末一段裏，曾經有這樣的幾句話：「汪精衛先生既然這樣的喜歡『比』喻，我倒也有一『比』，倘把阮大鋮的燕子箋比之於雙照樓的詩詞，那又怎麼樣呢？」自以爲尙非對汪氏的誣蔑，而且也決不是一時的「意氣」之作。但編輯先生卻把這一段的話删去了。因爲那時候的汪精衛，雖然已經有了不忠於冀，不利於國的「言，」似乎還沒有很顯明的拍賣抗戰的「行。」苟非辱國有據，誰又不希望別人的「懸崖勒馬」呢？所以編輯先生

的苦衷，我是應當瞭解的。至於阮大鋮，他原是明末最卑鄙無恥的一種脚色。他挑撥是非，排斥異己，不但賣嘴，而且賣心。當東林黨得勢之際，他是一個煊赫當世的「黨徒」，但當魏忠賢的氣燄萬丈的時候，他又是「滿朝皆義子」之一。然而待到明室既亡，清兵入關，他於是就做了清兵南征隊中的天字號的先鋒了。綜其一生，「游來游去」無非爲「子女玉帛」私人的貪婪的慾望打算而已。而汪精衛，（嗚乎！我也實在有些「先生」不下去了）他在清末的排滿營壘中，不能不說是革命的先驅。待到北伐告成，他又是以「左」的嘴臉出現。至於眼前，則禍國的言行昭然，國府的政令已下，稱爲叛徒，稱爲國賊，恐怕也正是人同此心罷！所以將他比之於千變萬化的阮大鋮，雖在他的電片尚未發表的當時，我覺得也確是有些類似的。但在涉筆之間，卻多少還有那樣的心境：寧願我的比喻在不遠的將來能成爲落空，而不願阮大鋮秦檜之類的靈魂躲在汪精衛的身上。但自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們對他的希望，僅止於「不通敵」。過多或過大的期待，是不能寄諸於蘆溝橋抗戰以來的汪精衛的。這就因爲他的妥協的殘滓，苟安的脈絡，遠在西安事變以後，早就分明於稍有頭腦的人們的心中。當蔣委員長隨著一片灼熱的爆竹聲安然「出險」的時候，而汪精衛卻也於此時翩然返國了，「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回答這詢問的：是汪精衛的大失望的嘴

臉！是他的懊喪，悵惘的心！而且我們記得在當時事變解決後，起著同樣的懊喪的，還不止汪精衛一人。而在今日，他居然也被日本軍閥認爲足以付託軍權的對象了。

然而，曾幾何時，先前的煇煌的舊業，固然毀於一旦，而自南京至重慶之間的汪精衛的曖昧，游移與動搖的態度，至此也就廓然一清。這無論從此後的抗戰著想，從國民黨的法紀著想，都是一件大不容易而又大可慶祝的事情。時間對於漸近滅亡，無藥可救的東西，是殘酷的淘汰。但對於另一種的人們，則恰恰相反，她在孕育，在鍛鍊。試看日脚剛剛跨出了一九三八年的第二大，就遠迢迢地從激湍的大江，嶮巇的蜀道，在曉色蒼茫中給苦留上海的我們，帶來了這麼一個值得驕傲的喜訊！

據何香凝先生的「斥汪論文」，謂汪在六年前已有「細細想來，秦檜算不得漢奸」之語。汪精衛的引秦檜爲同調，當然無足深怪。而這也不過是溫宗堯之流的餘唾而已！所謂「與日人周旋，始得收復四省土地」之說，不是正跟他的「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卽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云云，有「異曲同工」之妙嗎？而這「曲」一經唱出，汪精衛鼻子上的白粉，也就從此永難洗刷了。這便是說，我們對於他實在也不必存著什麼的幻想與期望。

記得梁實秋教授曾說過「我們不能因別人一提及和平，就目爲漢奸」一類的話。這是在重慶開參政會而適當汪精衛做主席時說的。這眞是一個極撩人的秋波——對於「汪副總裁。」然而現在：辱國的言行俱在，懲汪的政令煌煌，「周旋」於他的左右者，正是土肥原，陳中孚諸公也。

因汪精衛的爲秦檜張目，倒使我想起秦檜來了。凡是一個大漢奸的事敵，總是有許多貌似「理直氣壯」的理由。不是誣別人爲「奸大喜功，」就是說自己是「忍辱負重。」例如秦檜，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這又說得何等的堂皇，何等的磊落。而且贊成他的主張的不僅是民國的汪精衛。正如桓溫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二語，爲多少民賊國奴作掩飾，作「解嘲，」與作辯護！

中國抗戰的勝利，是使我們千秋萬世的獲到生存與自由。而秦檜卽使有他的「功勳，」充其量不過使南宋苟安一時。至於結局，大家還是貼貼服服的做蒙古人的奴隸。然而有人以爲當時如無秦丞相的「斡旋和平，」也許南宋早已亡了。但不知這正是澈頭澈尾的奴性的表現！苟安十年與苟安百年又有什麼的分別？我們如果還對自己的子孫，自己的國族，有一些珍惜，有一分寶愛，那末：這百年的苟安就應該無情的踢走它！

明知到了百年之後，仍不免於滅亡，而依然做著苟安的夢者，那末：這樣的脚色就應該無情的踢走它！

今與昔

鄂王墓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途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元趙孟頫岳鄂王墓

近來又有人在提起宋代的秦檜，明代的吳三桂了。

這兩位都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辱國的「能臣。」中國仗了他們的斡旋與努力，大家總算過了幾百年奴隸的癮。現在五族既然「共和，」萬衆也已一心，舊事似乎也可以不必重提了。然而大官怯敵，則又何代蔑有？汪精衛的出現，也眞的可謂「後起之秀」吧。

不過我們彷彿還缺少一個宋高宗，苟安的局面也決不由幾個人可以決定。而「同化」之說更給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們所粉碎：過去遊牧民族的入寇中原，無論如何不能跟「堅甲利兵」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相比。朝鮮和台灣之亡，正是一個血腥的例子。

翻開歷史一看，我們固然有不少不屈不撓的民族的脊梁，然而也有死心塌地的巴望別人來壓迫，來宰割的「衮衮諸公。」爲「奴」的毒血流在我們的身心中的，至少，也有千餘年了吧。而這次大家所以能這樣精誠團結，犧牲一切來支持抗戰者，此無他，也無非爲了掙脫這可恥而又可怕的命運而已。

這都是極平凡的話，多說也難免成爲濫調。而汪精衛以爲「唯恐中國不亡，國民政府不倒，國民黨不滅」的人們才始會堅決的主張，這雖「強詞，」但也不見得能夠「奪理。」然而這正是所以成爲今日的汪精衛的地方，要不然，「南京市民」也決不開「大會」來響應他的通電了。「狗嘴裏伸不出象牙，」誠然，我也知道這比喻不免有些粗俗不敬。但我們如果把汪公的誣游擊隊爲明末的「流寇，」只配「用之於國內戰爭」的比喻來對照一下，那末，我覺得還是近乎忠厚的。

至於南宋的滅亡，有人以爲秦檜是不能負責的。這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恐怕也不是心平氣

和之說。如果秦檜的主和，的確爲了委曲求全，保半壁以圖他日的復興，那末，他在後來爲什麼要大興文字獄，扼抑朝野的言路，自毀軍心，屈殺武將，「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呢？（宋朱子戊午讜議序語）於是有人以爲他的主和雖未可厚非，但他後來的種種措施卻不能博我們的原諒。這其實也是「見樹不見林」的論調。正因爲秦檜要想排斥異己，增植私權，纔不能不對金人屈服，甚至於亡國也在所不惜。我們難道還以爲汪精衛的主和，眞的是由於他的什麼目光淺陋，理論錯誤嗎？眞的以爲他是一時的意氣用事嗎？眞的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嗎？這就是說，惟其先有專權攘位的居心，然後才有通敵求降的主張。秦檜如此，而一切的主和者也無不如此。這決不是我的武斷。因爲在當時的宋高宗，原有固位自謀的私心，只要金人能扣留欽宗，什麼的條件都可答應。而秦檜則「逢君之惡，」目從而長之，於是君臣遂「沆瀣一氣，」置整個的民族於一己的利祿之外了，據續資治通鑑卷一二六載：「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洪皓請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淵聖是當高宗卽位後遙尊欽宗的號。）然則秦檜的居心豈非已昭然於紙上了嗎？但最不幸的可以說是欽宗，他活活的被南宋君臣當作拍賣民族的「押品。」而結果還是不得一人中原。我們讀了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中的一段描寫，覺其渴望故國之情，輒不禁爲之惻然。紀

云——

「韋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卽高宗）與丞相（指秦檜）我得太乙宮使足矣，（太乙宮使是宋時優待大臣老而罷職者的一種官職）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治。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遽淵聖車前之語。」

這裏所記的「朝議，」卽指宋室君臣不許欽宗南歸之意。可見當時高宗等不願欽宗南歸的陰謀，已經成爲一種「朝議」了。「無毒不丈夫，」這恐怕也正是一切梟主與權臣的必守的信條罷。

歷史既然告訴我們從前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人物了。那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難道就永遠的「悲夫」下去嗎？

閉眼與擡頭

明末的王思任致馬士英書中有云，「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汚之地」二語。魯迅先

生因而認爲這話對於紹興人很有光榮。我以爲如果推而廣之，則對於浙東人，也未始不是一種吐氣揚眉之辭罷。

歷來的正統派文士，一看到明末的文字便會搖頭嘆氣起來，認爲這是「亡國之音。」但這已經由周作人先生力辨其誣，他以爲「使後世無復亡國，則自無亡國之音，正如有飯吃飽便不面黃飢瘦，而不生楊梅瘡也就不會鼻子爛落也。」這意見也值得尊重。總之，是要大家積極的從復國方面著想與著手，不必將亡國的責任隨便的推讓。如果等到國家亡了，大家再來互相的爭執或計算，那就決沒有好的結果。例如此番的抗戰，我們只須從「最後勝利」的一點上來發揮一切的力量，然後才有「雖九死其猶未悔」似的決心，而不必先爲亡國后的種種付下預約。所以我聽到「雖敗猶榮」之類的話，雖然明知道這是激乎義憤，卻總覺得有些不大妥貼。從前，汪精衛要我們死得精光，燒得干淨，使敵人侵入之後，便一無所得，其名題則也曰焦土抗戰。你以爲這樣的說法是出乎激昂或發乎「奇譎」嗎？都不是。這正是汪精衛對抗戰所一貫採取的陰謀。我們且慢說「死得精光，燒得干淨」是不是有人眞的會去實行，但單是就這種論調出於當時的政府大員之口，其所給予人民的影響而論，就「不堪設想」的了。他一面歪曲了焦土抗戰的眞諦，一面則使人民對「焦

士」引起「惶惑，」畏懼與惡感。於是人民對抗戰也由「悲憤，」淡漠而至絕望了，於是而汪精衛靈魂中的「和平」乃得燦然大備。有人以爲過去的一部份輿論界對汪精衛「逼」得太厲害，因此使他在四面碰壁之下，不得不跑上「梁山」去了。但我卻覺得過去中國朝野對付他的態度，還是有些近乎「紆迴曲折，」「還欠刻毒。」寬容與仁慈也許是要緊的，然而因此而對反奸反和的任務也鬆懈下來，則又何異於向敵人繳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是不錯的。但「夫子」對於那些「亂臣賊子」呢？何況他還「誅」過少正卯。這緣故，就因爲他們本身先是最不「忠」而又不「恕」的東西。故「忠恕之道」便無從說起。這不是我的咬文嚼字或搬弄古書，蓋祖國的「江山好改，」通敵的「本性難易」如汪精衛之類，而我們又無梁實秋與林柏生輩的筆舌，實在無法向他們播送秋波，只有如某種人所謂緊「逼」下去而已。

雖然「明末的流寇」被汪精衛無端的攪了一通，但其實，他前一次的歪曲焦土抗戰的論調，也不過是張獻忠的餘唾吧了。當李自成與張獻忠互相爭啃這塊明室的爛猪肉的時候，張獻忠主張須把所有的人民都殺光。他的理由是這樣的：人民一律的滅絕了，那時縱使李自成來做皇帝，他還有什麼的興趣呢？

這也眞的想得周密而且「新奇，」可謂「盜亦有道。」但我們試把前面所述汪精衛的唾沫來比較一下，不正是有點「似是而非」嗎？

中國人動輒以「五千年」或「固有」的什麼來嚇人，卻很少有肯切實地來反省或認錯——向眞理低頭的人。暴露自己人的缺陷，據說是反而使「仇者所快，」照通俗一些的說法，那末，所謂「滅自己威風」就是。不錯，我們的民族，還不至淪到任何的事或物都無足致用，一無價值的地步。然而大家卻總是朝最黑暗與腐敗一方面走去，譬如實則頹廢，名之則曰「風雅，」實則衰弱，名之則曰「斯文，」明明是自己的軍器顯得落後，做起文章來，也總要加上幾句「偃武修文」一類的話。明明是違反時代的復古，卻非扯著發揚固有文化的招牌不可。而現在，一般「忠厚長者」又要我們來講忠恕，標寬容，向劣迹昭彰的汪精衛要玩起「頑石點頭」的魔術來了。

然而又應該怎樣的來感謝這一次的抗戰呢！它使我們這些積重難返的民族錮疾，逐漸的拔去，一切卑鄙，荒唐與蠢蠢的醜惡，也將消失在我們戰士的槍尖。韓復渠的槍決，對於呻吟在地方軍閥壓迫之下的山東的民衆，應該有特別的痛快與謳頌。而王醇南的正法，則我也實在引爲無限的光榮。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博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從此我們又要好幾天不能抬起頭來了。（大

意）話是沉痛得很，但不料胡博士一榮任了大使，話就變得非常的卑屈和沮喪了。這且不必多提它吧。我要說的，是自汪精衛被開除黨籍後，我們民族「抬頭」的日脚又是縮近了一步。我默默地送著這被拋棄了的舊中國閉下眼去，我默默地送著這被期待著的新中國抬上頭來！

從兩句舊詩說起

從前，我在一本叫作什麼的筆記裏，看見了這樣的兩句舊詩：「戰士由來惟熱血，秋深不必寄寒衣！」我讀了之後，覺得激昂固然是激昂，悲壯也誠然有些悲壯的。但如細論實際，就大成問題的了。正如站在雲端裏大喊抗敵殺賊者一樣，聽來也彷彿有些響澈寓空，然而一等到脚踏實地，要他切切實實的苦幹的時候，就立刻會被無情的現實所嚇退了。

我們承認戰士的意志的確比一般人來得堅決，行動比一般人來得英勇，上陣殺敵，下馬擒賊，所依賴者也不過一腔熱血，一種所謂「馬革裹屍」的責任感。至於他們的生理機構，那恐怕也未必會比任何人來得「奇譎」或特殊。「秋深」了，他們一樣的感覺到寒冷，夏來了，他們一樣的知

道炎熱，受傷負創，他們也一樣的會呻吟，苦痛。也許，戰士的官能或行動，只有較常人來得靈敏或迅捷，決不會連冷暖的感受都模糊起來。要是果眞如此，那末，我也終於要不客氣的說了：這簡直是麻木到可怕的程度了！還能放槍？還能開砲？

但自然，無論是那一種的戰士，他們的吃苦耐勞的本領，的確不是靜靜的坐在十六枝光的電燈下的我們所能想像，一彈飛來，還想作「困獸猶鬪」時的勇敢的戰力，也決非筆舌所能形容。八路軍在雪地中浴血苦鬪，而身上所著的僅僅是一件涼衣。這種種，不但形諸文字，而且也屢見於事實。而中國之所以得救，勝利之所以必然到來的把握，也就建立在這樣的精神與意志之上。然而因此就說寒衣對於戰士是沒有效用，且從而認爲「不必寄，」叫大家活活的看著他們忍凍冒寒，靜候「勝利。」這不但是「玄之又玄」的「唯心」之說，對於我們的戰士，而且還是一種罪惡！

戰士的「熱血，」是值得我們寶貴的。但倘非必要的犧牲，我們也得盡量的保存他，珍重他。沒有寒衣，在戰士固然也要戰鬪下去。有了，卻更使他們的精神奮發，襲擊靈活。總之，他和未著寒衣時有此一兩樣。

文人們有一種不易剷除的積習，無論吟詩作文，總是喜歡搬弄「警句，」刻意好奇。歐陽修所

謂「立異以爲高，逆情以干譽」者就是。然而因此也就產生了一種流弊：不近情理。我以爲不論社會進步得怎樣，情理兩字，還是應該重視的。但所謂近情理，決非向舊傳統妥協或讓步，通世故，也不是要大家鍊得圓滑狡獪，毫無進取的熱情。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非常深於世故的，甚至有人曾經給他取了一個「世故老人」的「外號。」但魯迅先生卻始終不失爲最正直勇敢的思想界的前驅。當他看到有人在飲瓜解渴，忽然會聯想到「河山破碎，」而故作慷慨之語的時候，他就禁不住的要引起反感來了。這種地方，也正是構成魯迅的偉大的條件之一。

舊文人們還有一種最深固的傾向，用成語來說，就叫作「文字遊戲。」像上面所引的兩句詩，其實也可以併入這一類的。他們從老子，師傅以至親友都是這樣的繼傳下來，從小就有基本的訓練。他們的表現的方式，大抵是墓誌，壽銘，挽聯，詩鐘，燈謎，詩謎，詞曲，以及通電宣言之類。至於技巧，也不外是搬弄濫套，雕琢辭藻而已。談來談去，也無非以文字爲遊戲的觀念。而逕通著這條狹路的，則是復古的迷毒！我們時常狂嚷著「四萬萬人口，」「廿二省國土，」再加上「五千年歷史」和多少多少的「固有文化。」但我們試來調查一下全國識字的人數，可估到「幾分之幾？」然而不識字的人們既是這樣的少，能有識字幸運的人們，卻儘是將文字來當作遊戲的工具，浪費的對象。這

現象倘不消除，則文盲的惡謚恐怕也無法消除吧。

看報上的廣告，知道某皮貨號又在廉價，某馬路又添了一家皮貨店。而我們的戰士，難道也要配被無聊文人們作文字游戲的材料而已嗎？……

後記

這回要臨到我寫後記了。

當邊鼓集出版的時候，廣州與武漢已經相繼陷落，人心曾經一度的由惶惑而轉入紛亂，那來自辱國者之口的「和平」空氣，也散蕩於孤島的四周。在這時候，我們固然不能說抗戰前途從此就將黯淡下去，但卻也不能否認，有一重朦朧的側影，籠罩在這時的各人的心頭。然而到了眼前這個風雨飄搖的祖國，已經掙出了漫漫的暗夜，用戰士的血手挽起一個燦然的黎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民族，這時代，正是光大於這樣的堅苦精神之上。

而我的在這中間所收集的一點雜文，除了一二篇以外，大部份也還是從武漢失陷以後之作，至於現在。雖然說不上對國家民族有什麼「偉大」的貢獻，但「言爲心聲，」一個活在此時此地的中國人的心境，也許藉此能略窺於什一罷。

時方一月，春意將生，夜雨寒燈，相對默然。排編既竣，因作後記於上云。

民國二十八年一二八後一日文載道手記

周木齋作

原

书

空

白

页

坐實

獨裁者秦始皇，被荊軻行刺的時候，階下的衞士因格於法威，致不敢越階而拔刀相助，而使秦始皇險些兒喪生。——即使喪生，衞士也是不負責的，因爲要守獨裁的法；否則越階盡職，自己反要因違法而喪生，至多只落得一個事後卹其族罷了。

這是獨裁者的矛盾，獨裁者的悲哀。不准衞士越階，衞士的職責便盡了，卻也喪失了衞士的本義，衞士的職責了。但爲什麼又要衞士呢？獨裁者是更不能不要衞士的。但爲什麼又不要衞士發揮其應有的本義，應盡的職責呢？獨裁者是更不能要衞士的，往往更會變起肘腋。

趙高將鹿獻於秦二世——始皇的兒子，繼承者，說是馬。二世說：「丞相誤耶，指鹿爲馬。」問左右，或沉默，或說是馬，或說是鹿。趙高便暗中繩一般說鹿的以法。

二世是名義上的獨裁者，這看「始皇」和「二世」的名稱，也可知是繼承獨裁的，但實際上已是傀儡了。（自然，這與認賊作父的傀儡有本質的不同）因名實的差異，所以辨認馬鹿要問左

右。沉默的是知道這名實的差異的。說是馬或說是鹿的，貌似代表兩種勢力的分野，而其實說是鹿的，也正是指實情而言。到趙高暗中繩一般說鹿的以法，誰是眞正的獨裁者便判明了。

但獨裁者之造成獨裁的那種不擇手段，也顯筋露骨，窮兇極惡了，而這又釀成了獨裁者的「教育。」

墨索里尼在貝魯納城演說，對於捷克總統貝奈斯，加以攻擊，當時一般法西斯黨員聞提及貝奈斯之名，多口出怪聲，以表厭惡之意，故墨索里尼說：「汝等厭惡之聲，當聞於全世界，（汝等皆屬於偉大之古羅馬民族，……）」眞正「偉大」得很，得意得很。又說：「當日內瓦及五十二國開會，由現任捷總統（羣衆聞捷總統名，報以噓聲）主席，討論對意制裁事項時，余對意民衆之勇敢，絕未發生懷疑。當時並有一種荒謬之口號：『麵包或大砲。』吾人對此，將作何種答復？（羣衆一致呼大砲）吾人認爲無論大砲之製造何等堅固，苟無堅固之人力利用之，則亦歸無效。」雖然在挽回，但已大殺「偉大」的風景了，「亦歸無效。」

據說聆聽演說的，不下三萬人。那麼，至少這一批不下三萬的人，是「出類拔萃」的了。但可惜墨索里尼的訓練，還不夠高明的；或者，這一批羣衆，是太老實了。所謂當時有一種「荒謬」的口號：

「麵包或大砲，」是墨索里尼說「要以大砲代替麵包，」而爲世所恥笑，並加以諷刺的。現在墨索里尼提出於那一批羣衆的面前，詢問答復，是想以口頭的「公民投票」的方式，徵求「民意，」作爲掩盡天下人耳目的翻案，正如報復貝奈斯總統在國聯中曾創導制裁意國以制止侵略阿比西尼亞一樣，以報復世人的恥笑和諷刺的。不料那一批羣衆不明瞭此意，卻墨守成規地牢記着「要以大砲代替麵包」的一句話，於是舊事重提，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囂囂曰「大砲，」「大砲。」這大砲雖然是空氣砲，卻已轟擊了墨索里尼的「雄心」了呀，想要翻案，反而坐實。

秦始皇的老實的衞士，猶可說也，因爲秦始皇沒有想從衞士製造「民意」的意思，固然作繭自縛，卻不想脫蛹而出，更不曾因想脫蛹而出而仍自縛於繭。

趙高也不曾既指鹿爲馬而又指「馬」爲「鹿。」

世道日下，倒是在這裏的。不擇手段，反覆無常，使大批的羣衆瘋狂了，又要使之瘋狂的清醒，苛政猛於虎，則民無所措手足，而獨裁者於自作自受的得意忘形之餘，也自作自受地暴露了尷尬的嘴臉。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而墨索里尼的方式是：民「信之」矣，足兵，

「信之」以至於死；又從而言「足食，」足兵。但言「足食」是欺世的，也是欺民的，而前言不對後語，更顯明的是失信。有三重的欺騙，剩下的路，是死。

「具有歷史意義」

在上月希特勒訂於二十六日晚發表廣播演說的事先，其宣傳部長郭培爾爲他的元首發出了預約：「全國人民，均應恭聆此項具有歷史意義之宣言。」大概因爲「具有歷史意義」的關係罷，「記得」希特勒在「過去不久」的紐倫堡國社黨大會中的演說，也曾有被以類似的話稱述過的說法。

誠如希特勒所屢次不憚煩言，日耳曼族是上帝創造的，而日耳曼族又負有創造歷史的使命，那麼，爲日耳曼族的秀氣所蒼萃的國社黨，又是國社黨的秀氣所蒼萃的元首——希特勒，說句把「具有歷史意義」的話，那又算什麼東西！

可是啊，歷史本有兩種，意義也不例外。依普通的說法，歷史代表善惡兩種勢力的鬬爭，這就是

兩種的意義和歷史。依中國的一種舊說：「大丈夫雖不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這原是無恥之尤的下流話，卻也指出了兩種的歷史意義，而這兩句話的着重點是在「遺臭萬年，」可知存心就在「具有歷史意義，」藉此以遮羞的。

但話又要說回來啦，這兩句無恥之尤的下流話，還總算能明知，而且敢說出具有的「歷史意義」是「遺臭，」還總算能分別兩種歷史意義的好醜：「流芳」和「遺臭」較之籠統宣稱「具有歷史意義」而又自命爲「神聖誓言」者，畢竟下流到還高一等。

甚至把前言當眞作爲「具有歷史意義：」成爲歷史的陳迹了，又把後語作爲「具有歷史意義，」這樣地一而再，勢非一舉一動，甚至放一個屁，也都「具有歷史意義」不可。但這也正足以反映出另一面：「具有歷史意義」之多，頻繁，恰恰顯得朝生暮死，方生方死，毫無「歷史意義」可言；卽使有之，也是模糊的，不準確的臉譜。

逢惡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這是就比較而言的，的確如此。人惡，其罪小；長其惡，其罪大；逢其惡，其罪更大。人之惡，人皆知之；長之逢之，客觀上已等於又從而爲之辭，且其勢必然主觀地又從而爲之辭，惡便不彰明較著了，甚至有時且顯得僞善。惡極，因之罪大。

逢惡較之長惡，是更圓滑，不着邊際，使結果模糊的。

漢奸之罪，深於敵人。因爲敵人本惡，漢奸又復爲虎作倀，長惡，甚至逢惡。

然而世又有國際的「漢奸，」而且不是長惡，還是逢惡。

幫兇可怕，軟刀子的幫兇，卻更可怕。

有了幫兇，正兇便可不親自做兇手，而借手於幫兇。軟刀子的幫兇則連兇相也不容易看出。

但也引起了相應的結果。

玉碎原是憤激之言，其實不見得一定這樣的，然而既連寧爲玉碎的悲壯都不可能，則毋爲瓦全也不可得。

金聖歎以殺頭爲痛快，倘在未殺之時，使決擇於殺頭和凌遲之間，那是寧以殺頭爲痛快的。

引起相應的結果非逢惡者所掛懷顧惜，但又激起了相應的反作用。

凌遲處死，不就速死，乍痛乍停，痛定思痛，於是向僞善的逢惡者，軟刀子的幫兇之一發出另一種憤激的慘呼：「再會罷！」將自趨於惡流，長惡而不逢惡；幫兇，而不軟刀子地幫兇。

俗說「擒賊擒王，」這王當然是賊王，但擒王的同時也須擒賊。

算命看相者流

漢口陷落以後怎樣？以及這樣或那樣，甚至所謂國際間的調停中日戰爭，也必假定是在漢口陷落以後，似乎是在等待着，等待着這一個機會，這種種，由來已久了，而於今爲烈，好像漢口的陷落的命運是被這批貌似關心而其實是隔膜與貌似愛好和平而其實是幸災樂禍的算命看相者流的信口開河所註定了。

稱之爲算命看相者流，自然並非就是算命看相者，但不能不說是算命看相的流亞，而事實上確也只配是。

算命的給人家算命，但若有人反過來問算命的：「你算算你自己的命運又怎樣？」算命的便瞠目不知所答了。對於看相的，也可以這樣。這眞是最好的辦法：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身；說得更激刺些，便是以毒攻毒。這辦法的所以奏效，正在於截斷他的根。

最後，略有小聰明的算命看相者，可以作這樣俏皮的答覆：「我算算我自己的命運」或者「我看看我自己的相貌，」「註定我只好做一個算命的」或者「看相的。」

話雖俏皮，但事實上，他只不過是做一個算命者或看相者，而俏皮的答覆的語氣也的確有「只不過」的意思的。這能作爲命定的事實的證明麼？不，原來是自己先跌下來的「戰術。」

至於算命看相者流，恐怕還不會來這一手，那麼，還要請問：「算算你自己的命運怎樣罷，」「看看你自己的相貌怎樣罷。」

自然，因算命看相而有的算「算命，」看「看相，」根本並非算命看相可比，不在此例。

賣弄

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即使是唱戲罷，登場雖然有時要說什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話，但也頗識大體，開始總是先說「孤自登基以來，」而表示自謙的；歌功頌德乃是屬於臣民的事。

但這是封建社會的禮儀，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便有轉化爲廣告的賣弄，自我宣傳的出現了。德國薩爾勃魯克城新建「邊境劇院，」舉行揭幕典禮，希特勒又登場發表演說了。話呢，自然是像貓捕捉了鼠般的叫囂，不在這裏的話下；所不能已於言的，是當我看到了那句像在得意顯形，而其實是得意忘形的「余自信乃係一英武的堅決的民族之元首」以後，不禁爲之毛骨悚然，肉麻膚皺。

封建式的自謙，固然覺得肉麻，但廣告的賣弄，歸根還是封建和資本主義的混血兒——法西斯的囂張，更有覺得逼人肉麻之感的。

舉行揭幕典禮時，照例也先由他的宣傳部長郭培爾發表演說；現在，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了；想來，假使那句話是出諸他的宣傳部長之口，雖然也覺肉麻，但總比較可算權其輕罷。

男盜女娼

舊小說裏有淫人之妻，而不知自己的妻也墮落娼門，更由自己狎游自己的已淪爲娼妓的妻，於是發現澈悟因果報應的道理的故事。這自然是作者爲要宣講迷信的因果報應之說而起的想像，想像固不足爲據，迷信也不足爲訓，而且苦口雖然由於婆心，刻薄雖然爲了勸世，但畢竟太刻苦了。

然而也有足爲訓的現實，乃是歷史的無情的刻毒。

世俗有句罵人的話，叫做「男盜女娼。」這不但是罵人，還含有充分的詛咒意味，不足道的。此外，這句話的「男盜」和「女娼，」是並行的，卽男爲盜而女爲娼。

然而現實也有派生的「男盜女娼，」卽男爲盜而女爲娼，乃是歷史的無情的暴露。

據十八日報載：據住於浦東某處之來人談：日前，白蓮涇港南附近某草房內，有兩日兵自縊身死。其致死之物，爲足上之綁腿布。自殺之原因，係發覺渠等二人之妻在虹口爲妓，因二人赴虹口狎

游時，適乃妻等油頭粉面，含笑逢迎，相見之下，轉喜爲悲，互相飲泣，一陣傷心之後，歸而出此下策。死者皮帶上紮有遺書數紙，略述二人因赴虹口帝國婦女安慰所，撞見離別已久之愛妻在內爲妓，據皮肉生涯，遭遇生平未有之恥辱，無顏再見世人等語。

侵略者師出無名，只得以「帝國婦女安慰」士兵，用麻醉刺激士氣；侵略者勞民傷財，「帝國婦女」也只得出去「安慰」士兵，寄飲食於男女。狎妓而撞見離別已久之愛妻，應該得到眞正的「安慰」了，但也是黷武主義之典型的結果，「帝國」社會之典型的現象。

這是悲劇呢，這是喜劇？都不是的，卻也都是的。在帝國社會是悲劇，而在「帝國」則是喜劇。

侵略者在中國蹂躪婦女，這對於中國的侮辱的暴行，而也是侵略者本身的恥辱和罪孽，歷史已在促其自還血債了！

「誰會笑的，誰最後笑」。

「誰會笑的，誰最後笑。」這是蘇聯的革命導師列寧在革命期間諷刺敵人的兩句話，多麼有

力！

當時，這兩句話也是最後勝利的意思，預示最後勝利時的生動的形象，才是堅實正常的笑。

現在，我們久已提出了最後勝利的口號，而且具有信心和信力，那麼，對於廣州的淪陷，和武漢的撤退，爲什麼要氣短，頹喪，悲觀！

日軍大亞灣登陸後，該國的陸軍省發言人，竟公然宣稱喜出眼淚，這中間，大概經過笑罷，但笑得太早了，眼淚是不值錢的。廣州陷落，上海日軍更紛紛開砲，大放烟火，算是「慶祝」，這表示笑得更厲害了，有點失了常態，但也因爲太早，砲火是要蝕本的。

形形色色，都暴露欲罷不能，極度苦悶之下的急燥，我們爲什麼要以氣短，頹喪，悲觀來反襯輕薄失態的笑，反而使之好像堅實正常！

要緊是在還要樂觀，但不幻想，幻想也是悲觀的由來；不悲觀，但必須警惕，警惕便無所用其悲觀，毫無悲觀的餘地。

要緊是在不使輕薄失態的笑成爲好像堅實正常的笑以外，還要粉碎那種使輕薄失態的笑變爲堅實正常的笑之傾向。

這個，就如：「日人方面對於汪（精衛）氏談片，頗爲欣喜；惟彼等現不掩飾其惶慮，蓋以中國游擊戰略將無期延長日本現已捉襟見肘的人力與財力之負擔也。」（路透社倫敦二十三日電）由於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同時的形相，所以可知欣喜也還是輕薄失態的，因爲汪精衛的談片究竟還是談片呀，而惶慮卻是堅實正常的，否則何必驚喜交集？但這使日人發生輕薄失態的欣喜的談片，卻有使輕薄失態的笑變爲堅實正常的笑之傾向，而從日人的喜「和」而懼戰，豈非也充分表示有粉碎這種傾向的必要麼！

栽刀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然而世更有不揣自己的本而齊別人的末，甚至不揣引起別人的末之自己的本而齊從自己的本引起之別人的末者，非但拉扯誣陷，還是推諉責任，陰謀轉嫁罪魁禍首，以掩盡天下人耳目，使於血腥尚未消散的時候，便已栽換了刀，創痛未定，便已顚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也便償了借刀殺人的本意。

廣州失陷的時候，路透社香港二十二日電有云：「此間觀察家，批評日軍進攻廣州之大膽與神速，謂登陸日軍僅有兩師團與一旅，其中有一師團，係張鼓峯有事時，由日本調往東三省者，足徵日本既知蘇聯不活動，乃決定南侵一說爲非無因。蘇聯之不活動，在最近歐洲危局中尤爲顯著。衆信日本最高軍事當局認東三省未有駐紮大軍之必要，決定移用此項軍隊來華南。香港現甚寧靖，絕未受華南戰事之影響。」這一推，是推得很遠的，推到蘇聯在最近歐洲危局中不活動。這一咬，也是咬得很重的，咬到衆信日本最高軍事當局決定還要移用駐紮東三省的大軍於華南，俾借刀以殺刃，而顯出蘇聯的罪孽深重。於是自己便很輕鬆了，輕鬆到香港絕未受華南戰事之影響。

但也幸而推得遠，用力過猛，把自己也拖過去了，較之再次飛德，僕僕風塵的張伯倫，蘇聯自然是不活動的。也不料咬得重，用力過猛，更膠着自己了，華南是在九龍臥榻之旁，是和香港只有一衣帶水之隔呀。

雖說乘機拉扯推諉，卻也正因拉扯不着，推諉不掉，所以一拉再拉，一推再推。當漢口淪陷的時候，路透社倫敦二十二日電，又引述泰晤士報的批評，有云：「蘇聯今在中國危急之秋，竟抱完全消極態度，無論白魯轍將軍命運如何，事有極明顯者，遠東紅軍並未處於可重演張鼓峯往事，在北方

牽掣日軍之地位。」張鼓峯，張鼓峯，一再舊事重提，言下似有不勝婉惜之意者然但那有什麼辦法呢？可婉惜的，其實是像屈服於希特勒，有日本的屈服，而史丹林又不是希特勒，不會侵略，不能使張伯倫那樣放心。

飛渡

多爾袞恫嚇史可法說：「豈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天塹是指長江，但飛渡天塹，投鞭斷流，畢竟恫嚇而已。

然而任雄據者，卻可以斷流的，便是封鎖；要想渡，除非飛，但飛機也不行。

不料路透社重慶二日電，竟替日軍飛渡起來，說要「進攻」宜昌，累得「英砲艦蚊號已由漢開赴，」「人心頗覺惶惶，」而且「至於平日來往宜昌長沙間之外輪，是否照常開行，尚無確訊。」陸地行舟，是可惜只能讓隋煬帝專美於前了，現代反而落伍了，豈止「尚無確訊」呢？

日軍沒有後方；有之，後方是新火線。由於在廣東偷機的登岸，算是截斷了中國的後方，但中國

的後方不在沿海，不止一個，於是一陣狂熱，驟然冰涼，剎那興奮，馬上沮喪。明知不能不故犯，笑顏不能不強調，於是又截斷西北交通線呀，截斷西南交通線呀。這些，說來也覺話長，且回溯一下罷。日軍固然會迂迴，會包抄，還會說包圍——包圍卻不同於迂迴，包抄，因爲兩翼俱齊，單缺後方，直落得一次次撲空，眼睜睜撤退。截斷西北交通線，通的，截斷西南交通線，一樣通的，不通的是後方，不從後方，從那裏去截斷？

這除非是飛渡。

但難關又來了，太遠，飛渡不到。於是又不得已而求其次，以五十步代替百步，揀定宜昌。

但莫說宜昌非後方，日是亦飛渡也。

正如飛渡一樣，「進攻」宜昌之說，也僅足以恫嚇而已。

但只要一翻地圖，便不會驚嚇，除非是張松的地圖；只有駭怪，其果爲張松的地圖乎？

「固有精神」

該算是我們的「友邦」了罷，牠勸中國「恢復固有精神。」這指的是什麼，雖然沒有直白出來，但意慾是很明顯的：所謂「反共。」「反共」而稱之爲「固有精神，」倒也新奇得很，因爲共者乃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有古典的共產主義和現代的共產主義，也就是空想的共產主義和科學的共產主義之分，「固有精神」當然包含有古典的共產主義之正反的兩方面，而又都爲現代的共產主義所反，籠統地說，也可以說是「共反」罷。「友邦」的「美意」自然是指「恢復」反古典的共產主義的「固有精神」以反現代的共產主義了，這才說得到「恢復」和「固有，」但現代的共產主義乃新興而後起，反古典的共產主義的「固有精神」連做夢也未想到，試問怎樣反起？倘以爲這種「固有精神」爲現代的共產主義所反而欲代爲復仇，「恢復」以回反之，則又類如古人爲今人所批評，而欲起古人於地下了，這除非是殭屍的出現。本無所知，卽知亦頗朦朧，老實說，如此而猶申言赤化不赤化，還覺是多餘的，最好的辦法是不睬，因爲根本可以不屑。

而所謂「反共」本來就是幌子，使人朦朧的烟幕，所以因之而有申言，也正中了牠的奸計。

且所謂恢復「固有精神，」不單是指「反共，」還指些什麼，雖然更難於直白出來，但意慾也是很明顯的。說到「固有，」的確有的，我固有之，人亦有之，雖然相互外鑠，卻非盡屬外鑠，較之那種

根本已經在「片假名」呀「平假名」呀地了，除非也是「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而文化上的無政治意味的被同化，還只罷了，卻竟侈談「合流，」儼然等量，「同文同種，」貌若齊觀，而根本已經是忘本甚至乳臭未乾，反食親娘，則人我的固有，也的確可以「恢復」一下的，要說「恢復，」也的確可以「恢復」一下的：拿出鏡子來照一照牠的嘴臉。

插話似乎說得遠了，但決不是廢話，不必帶住。「筷頭上出逆子，」吃了母國的精神的食糧，要母國再運用「筷頭上」的精神，俾便再獲得和消化「筷頭上」的實物，這就是「恢復固有精神」的意慾。

這個，在牠是自以爲一把鋒利的軟刀子了，照「固有精神」說，便是「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但也照「固有精神」說，這個「長久之道」由於畢竟夾雜文武，即使想要棄武修文，但畢竟武已用過，所以也還是霸道，算不得王道。縱使道還從「王」升到了「皇，」那樣飛躍得快，也徒然的，且正見得也是本無所知，即知亦頗朦朧，好笑煞人也。

其背比較老實地不飛躍，其果眞能講王道乎？照王道講，是沒有征服的，不用征服的，講的有的是讓天下，如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就是「禪讓。」要「恢復固有精神，」恐怕正是這種偶

合的而不曾被意識到的意慾罷，是的，可惜飛躍得太快了，講「皇道」及「王道」講得太糟了，糟到漆黑一團，空無所有，有現成的——「固有」的王道還不曾講，卻更白白地去講那「皇道。」這樣講來，講王道要被認爲「正中下懷」罷，是的，可惜王道不離乎仁，仁者相人偶也，不是單方面的，一定要有像舜禹那樣的人，堯舜才肯讓天下給他，而又一定要被堯舜看得起，自以爲舜禹是不行的，如後世的所謂「禪讓，」便其實是自以爲的，不過是篡奪。

那麼，王道也，禪讓也，成爲畢竟是優美的理想，甜蜜的糖果了。然而不然。這又要話又說回到「反共」的共。大同之世，沒有國家，自然也就沒有國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才能禪讓，才有禪讓，藏天下於天下，自然也就讓天下於天下，說不到「亞洲人的亞洲」了。雖然讓天下要被認爲「正中下懷，」但請慢看，尤其對於「反共，」是太遠了，太遠了，太遠到沒有被看得見。

望火止寒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二十七「假譎，」有一則云：「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

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這就是成語「望梅止渴」的故事。

怎麼士卒聽了「前有大梅林」的話便會「口皆出水」呢？這是由於精神的嗎啡針的作用，而收到了欺騙的效果，列入「假譎」一門，是很對的，蓋假者欺騙，譎者猶俗說的急智也。

日軍之實行欺騙，打精神的嗎啡針亦多矣，可並不是急智，除非是單純的發急之智；望梅止渴亦久矣，可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除非是在侵犯武漢的初期，侵犯黃梅，遇長江的水灌，望黃梅而止渴。

屢次滿想從侵佔重要的城鎮，打實質的嗎啡針，而因屢次撲空，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打精神的嗎啡針。但也正因撲空，所以還是沒有嗎啡的空針。否則儘打儘打，豈不混身成了蜂窩！

這次，又在武漢撲了一個大空，更發急了，便襲用望梅止渴的故智，說「華軍撤退時，秩序紊亂，並曾遺棄若干軍火。」「遺棄……軍火」雖只「若干，」卻是形容「華軍撤退時」的「秩序紊亂，」不是有計劃的。可惜一團熱慾，撲空猶如劈頭被澆了冷水，這倒又是望火止寒。

何止「獲得」「若干軍火」而已？還獲得大火的餘燼；何止望火而已？還置身於一片焦土之

上；何止止塞而已？還放火以洩憤。

需要批判論爭

不沒落於亡國論的深淵，不輕墮於速勝論的泥淖，有持久抗戰的認識，有最後勝利的信心，如果這樣，則在長期的過程中，在統一的戰線上，爲了抗戰力量的加強與促進，實行自我批判，以及因之而發生理論的鬬爭，都是需要的。

但一方面，卻有的是磨擦。至於磨擦出來的毫光，生產呀，分配呀，大貧呀，小貧呀，國力盡在沿海省份呀，理智呀，感情呀，排除宣傳的刺激性呀，爲什麼誤解焦土政策呀，從游而不擊到游來游去呀，壓雙呀，壓單呀，輕敵呀，……如是等等，雖然也像自我批判，但都是無的放矢，予人以磨擦的印象，而在不知者，使被淆亂了視聽。

又，一角落，卻有的是胡鬧。還沒有弄清論爭的由來，就舉起了斧頭亂砍；不熟悉史事，就妄以史事比擬；不明瞭近事，就狂向近事詆訾；不知道今事，就隨便張冠李戴；用罵代替批評，從罵進至漫罵；

斷章，摘句，而又不加思索；支離斷裂，濫肆羅織；拉扯不相干的事情，不自覺幼稚到可笑。……如是等等，雖然更標榜着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但也是無的放矢，予人以胡鬧的印象，而在不知者，便被激起了對於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的嫌惡。

所謂磨擦，其實是磨擦抗戰的，而那些磨擦出來的毫光，就是對抗戰的各方面的磨擦，待到議和論起，磨擦抗戰便很顯然。這決非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應該是爲了抗戰的。但需要對之作理論的鬬爭，在事實上也已經有，且已一再被克服了。至於胡鬧，則非但也距離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遠甚，還足以攪亂理論，混淆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的本身。但一經指出，理論還是理論，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還是自我批判和理論鬬爭，還都需要，絕對不能攪亂和混淆的。

樂觀和悲觀

我們時常可以聽到「樂觀」或「悲觀」這兩種說法。尤其對於抗戰，「樂觀」之說更多，而「悲觀」呢，雖然沒有顯明的說法，但總不能否認有這種氣氛，隱約的，或者包含於某一種姿態而

表現。這是普通的兩個流行語，尤其是對於抗戰的，關係更大，影響更大。

樂觀或悲觀之所以樂或悲，首先自然是根據觀察的，然而關鍵還在：觀察的是什麼。要問樂觀或悲觀是否是眞實的，也先要問觀察的是什麼。

觀察，總是從現象觀察的。但只觀察現象，所得到的結論，樂觀或悲觀，是否是眞實的呢？這裏最好借用莊子齊物論的譬喻：「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這就是只觀察現象而引起的樂觀或悲觀，都不是眞實的。但莊子所要說明的結論是「因是」，因是非而無是非，從相對論到齊物論，這裏卻要說絕對的，眞實的。這就要觀察通過現象的本質。那麼，再以狙公賦芧的譬喻來說，不管現象是朝三而暮四也好，朝四而暮三也好，總之，本質是狙公在欺騙衆狙，愚弄衆狙，在衆狙是應該只有悲觀的，而悲觀也才是眞實的。正如敵人製造僞「滿，」僞「蒙，」僞「臨時，」僞「維新」以後，一會兒說要合併僞「臨時」和僞「維新，」一會兒又說要製造僞「聯邦，」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僞名實未虧，而漢奸喜怒爲用，迷惘於現象，不知道本質是欺騙和愚弄而引以爲悲哀，這就因爲哀莫大於心死，漢奸畢竟是衆狙。

「最後勝利」這句話，是觀察通過許多現象的本質而得到的，是從許多現象的本質中提煉出來的，所以是眞實的。對於抗戰，只有樂觀，沒有悲觀。曾經有過幾次預言最後勝利的傳說，但這是根據虛幻的現象，穿鑿附會，荒誕不經，自然更說不到本質，如果因此而樂觀，那只是迷信，決不是眞實的。因城鎭的淪陷而悲觀，因焦土而悲觀，因一二國家的態度一時暗昧，便認爲背棄中國而悲觀，這些，都是根據一時的現象，不是本質的把捉，因而也都不是眞實的。

樂觀的根據，悲觀的解消，都在觀察通過現象的本質，都在本質的抗戰，惟有抗戰才是本質的。

游擊戰的雜感

凡是侵略者，都怕懼游擊戰的，牠要速戰速決，牠挾持優越的武器，最希望陣地戰，牠想從決戰擊潰對方的主力。游擊戰是在不利的作戰環境下產生的戰術，但較之陣地戰，卻是更富於藝術性的戰術。藝術本來是反抗的表現，反抗者總是處於不利的環境，劣勢的地位的。它迂迴，但也突擊；突擊固然迅速，但迂迴也迅速的。它採取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曲折聯繫，而不能機械地分開。

如果不能否定文學應該是戰鬪的，則巧得很，雜感正類似游擊戰，異於類似陣地戰的論文，而且也是在不利的寫作環境下產生的，較之論文，也富於藝術性。梁啓超的「新民體」文，章士釗的政論文，胡適之的明白如話文，都曾經哄傳過一時，但較之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的魯迅先生的雜感後來，直到現在的影響，又是那一種大呢？不用說是魯迅先生的雜感。這固然由於魯迅先生的雜感是最最戰鬪的，更具有社會價值的，所以更具有歷史價值，但同樣也因爲更富於藝術性，更具有藝術價值。有迂迴的，卻也有明快的；明快既迅速，迂迴也迅速；迂迴如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突擊如匕首，如投搶：形成了文學的游擊戰，游擊戰的文學形式，文學之一特殊形式的雜感，而最爲所謂正人君子所怕懼，因而也最嫉視。

正人君子利用寫作環境的優越，寫作論文，蔑視雜感，而魯迅先生還是不放棄他的雜感。之後，有說雜感只有社會價值，沒有藝術價值，還懷疑被他批評的人難道一個都沒有變好，儘寫雜感的，甚至有說雜感妨礙了偉大作品的產生的，但雜感的比較富於藝術性，並未因此而被抹殺，文學之一特殊的形式非但不妨礙偉大作品的產生，就是本身也不容易寫好，更不是拙劣的雜感所能罵倒，即使以這些爲例罷，要積重難反的環境一下子就變好，是難說的。

此時此地，倘說環境不同，或者可以不顧環境，所以不需要迂迴的雜感，只需要明快的雜感，首先，是以爲環境已經好轉了，那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能強人所同的；或者，便是急躁，正如對於抗戰的抹殺游擊戰而主張只要陣地戰一樣。其次，是只看到魯迅先生的雜感的明快，沒有看到迂迴，沒有看到迂迴也迅速的，也明快的；只看到單純的明快，取了明快的一點，沒有看到迅速的迂迴，明快的迂迴：是抽刀斷流的看法，不是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的看法；是機械的看法，不是聯繫的看法；因此，便無視了雜感的特殊性，無視了雜感的比較富於藝術性，其勢非使雜感也成爲論文不可。

藝術性也不是孤立的，而正是爲了強調社會性和戰鬥性，增高社會價值和戰鬥機能的，和爲藝術而藝術絕對不同。爲藝術而藝術的弊病，也在把藝術孤立了，割裂了，跟社會性和戰鬥性機械地游離了，成爲了頭重脚輕病，較之無視藝術性，是過猶不及的。

相提並說

在快要到民族復興節的時候，汪精衞已經離渝赴河內了。這裏所以把這「偶然巧合」的兩

件事相提並說，由於使我記起汪精衛這次出國以前的回國，也是在作爲民族復興節之由來的蔣委員長西安脫險返京以前的時候，也是「偶然巧合」的兩件事。把這兩個「偶然巧合」聯繫起來，眞也「偶然巧合」於所謂「壓雙」的妙說，是可以使汪精衛的來去格外分明的。

再說一句，這裏只是相提並說，並非相提並論。但歷史的事實，有些是只須說，不必論，即使非不可說，有時也不可論，然而論已包含在說之中。何況這裏還是以今事溯往事，以往事證今事，如此「壓雙」「偶然巧合」一來一去，脈絡分明？假使一定要勉強地論列，則如此「壓雙」的「偶然巧合」既不容易措辭，也實在糟塌了如此絕妙的題材——「壓雙」的「偶然巧合。」

話，似乎說得玄之又玄了，不過這裏總想保持一貫，超出論列；無已，則有一焉，曰「點。」想當年汪精衛的回國，據說是「共赴國難」的。現在汪精衛出國難道就不「共赴國難」了麼？那時尚未發生全面抗戰，還回國來「共赴國難，」現在已經全面抗戰了與正在全面抗戰着，而且持久抗戰着，怎麼倒反可以說不「共赴國難」呢？汪精衛的出國是因爲「心臟舊病復發」和「脈搏間斷病，」而這又因「過度飛行，」不消說歸根還在於「共赴國難」了。但出國「療治」較之力疾從公，對於「共赴國難」已有間矣。——說要「點，」雖然也超出了論列，卻已經在反覆地辯了，總之不大得

體，是顯然的。無已，還是再來「點」罷。然而爲了避免再有脫輻，逸出範圍，這裏首先還要確定「點」的意義，「點」者點明，是說明的縮小，是經濟的說明，要緊是在把捉緊要之點，指出關鍵，提綱挈領，有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所謂見微知著者也。那麼，再想當年汪精衛的回國，是在西安事變以後，不過西安事變尚未終了，這才以負創抱病而新癒之軀，回國來「共赴國難」的，而且在談話中還發表了「共赴國難」的南針，曰：「討伐叛逆。」原來當時的「國難，」是指多方面而言的，扼要地說，是外患和內亂。西安事變也是內亂之一，也是內亂的具體的表現，但這內亂是因外患而起，也爲了外患的，因此，終於逢凶化吉，化險爲夷，因禍得福，而這些還不僅是個人的，更是通過個人到全體民族，整個國家的，形成中華民國以來所希望，所從事，然而所未實現的局面，結成民族的統一戰線，從安內到攘外了，這才成爲民族復興節的由來，的確也眞正是民族復興的開始。對於這樣的歷史的突變，在事後，在現在，是可以解釋的，但在當時，卻誰也不能夠預料，自然，在回國途中的汪精衛，也意想不到的。

流寇新義

指游擊戰爲「游來游去，」爲「明末流寇的作法，」說是「不知道全面戰爭的意義，」在如此這般指說過的汪精衞，卽使心目中的所謂「全面戰爭」只不過是天眞爛漫的「要戰爭才行，不戰爭一定不行，」亂打一陣，混戰一場的「意義」也罷，卽使轉彎摸角的念頭是要輕易把自己的主力奉送給挾持優越武器的敵人去擊潰，遺忘了而又不遺忘他的「鷄卵撞石」的唯武器論也罷，卽使這樣急躁，但總還「要，」總還經過戰爭，亂打，混戰才行，「不戰爭一定不行」的。然而「流寇」呀，「要戰爭才行，不戰爭一定不行」呀，不料竟成爲了他的懺語，由於並不「不戰爭，」而且是不急躁的持久戰爭，使他不能「一定不行，」也就是「要戰爭」使他「才行」——出亡，從坐寇到流寇：流入於寇了。

不絕被引用的，這精神的武器，這歷史的名詞——流寇，我以爲只有指說這樣的人物，才恰當的，不管由於成敗之別，形式屬於坐寇，其實是一樣的。至於歷來被指稱的「流寇，」那只是坐寇的說法。至於「細細想來，秦檜算不得漢奸，」那麼，也說是流寇或坐寇罷，不過秦檜是先破金寇所虜而後歸爲宋相的，這個方式倒是從流寇到坐寇。

所謂「流寇，」並非明末的獨佔品，就當時說，也是古已有之的了。這裏就先說「算不得漢奸」

的秦檜時的，南宋高宗時的，「等貴賤，均貧富」的流寇楊么，他的部下周倫，就曾兩次拒絕那金寇所製造的劉豫僞齊的利誘勾結侵宋，並殺僞使三十五人，向宋朝的岳州太守程千秋報告。大致的詳情，如宋鼎澧逸民所撰的楊么事迹卷下云：「紹興四年十一月，水賊周倫寨去岳州稍近，一日，令人齎申狀，赴岳州太守程㦸撰陳訴，稱：近有僞齊下襄陽府李成太尉，差人自安復州取水路來故縣灘水寨，送金帛物口文書，言欲水寨諸首領各備人船戰士，剋日會合，水陸並進取，復向下沿江州縣，得州者做知州，得縣者做知縣，別命官賫優加犒賞等事。周倫與設來人，以乾魚鮓脯回答，報言周倫等止是鼎州龍陽縣稅戶，爲被知州程吏部凌逼，要行盡底殺戮，不得爲王民，且在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曉得會合事節，發遣來人歸回。後月餘日，李成又差三十五人來，內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員，又將官告金束帶錦戰袍並羊羓之類，再三相約諸寨首領，剋日會合。周倫知事勢異常，難以依隨，又恐日後多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一夜，將來人以酒醉倒，盡行殺戮，沉尸入江中。有此事，因申岳州，乞就便申奏朝廷，早乞別差鼎州知州替了知州程吏部，使周倫等諸寨□□□路保全老小，耕田種地，輸納二稅，復爲良民。程㦸撰爲申朝廷，蒙樞密院備奉聖旨，褒賞周倫忠義，特降黃榜一道，差二使臣賫至岳州，令差人送入水軍張掛，安慰人民，候事定日，應首領人並重賜推賞。」褒賞之爲忠義，是

的確的，「細細想來，」「算不得」「流寇」的，因爲他雖非大夫，卻也知春秋之義無私交，不會「接洽，一知事勢異常，不願「批准，」恐別生患害，不敢「響應；」雖有戰士，卻不「誘惑」諸寨首領，自行陳訴，不要自己被別人「報告」而出亡。總之，他不會和外寇內奸合流。

被直接指比的是明末的「流寇，」就再說明末的「流寇。」汪精衛說「明朝亡於流寇，」是的，但只限於李自成攻佔北京的一點，明朝是的確就此亡於「流寇」的，而這也不過是普通的改朝易姓，朱姓換了李姓而已，並非亡於外寇。亡於外寇的是因明朝的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出關投降滿寇，引滿寇兵攻李自成。李自成是抵抗滿寇的；李自成敗退後，滿寇才南侵的。而且，明亡以後，李自成和另一「流寇」張獻忠的部隊，還在作反抗滿寇的鬥爭，如李自成的部隊幾乎完全投降何騰蛟，成爲南明的軍隊，張獻忠的養子李定國，孫可望，餘黨白文選等，在張獻忠死後，都投奔明永曆帝，共同抵抗滿寇。他們在川，滇，黔一帶的勢力，竟能保持十幾年，甚至後來當三藩起兵抗滿寇時，王輔臣在陝西，還曾據寧夏以響應。要說「明朝亡於流寇，」但「流寇」倒是明朝的政治和社會所產生，再加上吳三桂認賊作父，做滿寇的爪牙先鋒，所以間接直接，都是亡於坐寇。

自然，「流寇」有其缺點，弊病，也不能否認的，但這是由於時代的關係，無法避免。然而曾經革

命過的汪精衛，卻竟忘記了時代的進展，指說革命的游擊戰爲「明末流寇的作法。」

倘一定要說是「流寇」指爲「流寇」，那也可以，就是流動地，「游來游去」地寇着敵人，有什麼不可以？倘存心於研究，而非意在誣衊，則游擊戰雖未說過是「明末流寇的作法」，又何嘗否認是「流寇」的作法？史諾著的西行漫記第十章戰爭與和平第四節關於朱德中，記述朱德自述的生活史裏，曾坦白地說游擊戰的來源道：「劉湘所以關心我的位置，因爲我的特殊戰術已爲人們所共知，所害怕。我用以攻擊敵軍而獲得絕大勝利的戰術，是流動的游擊戰術，這種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和匪徒作戰的經驗得來的。我從跟匪兵的流動集羣作戰的艱苦經驗中獲得的戰術，是特別有價值的戰術。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得到的學識配合起來。」可見有採取「流寇」的，但也另外有滲進的，是從實踐中得來的，也是和學識配合起來的，後來更有政治的發展，培植和鍛鍊，而對外的游擊戰又和國內的游擊戰不同，是眞正的流動地寇着外寇的。

「流寇」敵人的革命戰術，自然要被流入於寇的「革命」販子所嫉視的。

吳佩孚的「三不主義」

因爲侵略者想利用吳佩孚，引起人們關心他的出處，公西華先生在儒將與儒術一文中所論，是有獨到的見解的。這文從吳佩孚的「三不主義」說起，我也從吳佩孚出處的被關心想起了「三不主義。」

「三不主義」是：一不出洋，二不入租界，三不坐外國輪船；還是在第二次奉直戰爭失敗後，困居鷄公山的時候說起的，曾爲人們所稱道，傳爲「美談，」至今不忘。——其實由此可見其頑，是他的惟一的長處，也是他的最大的短處。

長處和短處的出發點雖然只是一個，但成爲長處或短處卻因事而顯，應該分別開來看的。較之其他軍閥的失敗下野，或出洋，或入租界，或坐外國輪船，是差強人意的一點，而也成爲了他的長處。但「三不主義」一看就可知是三位一體的——盲目的排外。「三不主義」本來不成其爲主義，卻象徵了一種主義——封建思想對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深閉固拒。外來文化倘屬侵略性的，固應深閉固拒，但他的深閉固拒卻是盲目的。

他不想到本身存在着一個根本的矛盾：過去他的軍隊所用的槍砲是外來的，他也有國際的背境，他也是帝國主義的爪牙，但他的思想是盲目的排外的。這正是一脈相傳的士大夫的「中學

爲體，西學爲用」的矛盾，決定了幻滅的命運。

到自己的「西學爲用」不行，「中學爲體」不成，失敗的時候，「中學爲體」便更趨極端了，連「西學爲用」也索興不要了，於是有所謂「三不主義。」

因談「三不主義」而又想起了他被侵略者想利用，假使早無「三不主義，」乘外輪而出洋，或徒步入租界，則侵略者想利用，施威脅，縱非不可能，至少當困難些罷。

因談「三不主義」而又想起他的出處，爲他個人的名節着想，爲希望他不被侵略者利用着想，倒又希望他貫澈「三不主義」——排外，以毒攻毒。

凌遲

汪精衛在過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總是稱病：心臟病啦，糖尿症啦，脈搏間斷啦，……而病，總是在出走後，養痾時稱的，可知稱病以前倒又健躍得很。

不過並非因此，人們也知道是生政治病——心病，賣弄風騷。

然而賣弄風騷首先便是出賣自己，這回更不例外，甚至心病更是喪心病狂。

據說這回出亡，乃是舊病復發。是的，病根的確很深，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就已種下了。因爲是心病，尤其是喪心而未病狂，所以不大看得見。

但是不能說因此就沒有傳染和流毒。

在三國志演義裏，孔明爲周瑜看病，劈頭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孔明是知道周瑜的心病的。於是兩人各在手心寫一「火」字。脈案既開，孔明又開藥引：「萬事俱齊，只缺東風，」還說能借。周瑜的病就霍然了。

汪精衛的舊病是在借西風的時候復發的，病根不在要火攻而在要滅火。卻也只缺藥引：東風。不，東風已經自吹，他也已經自借了。但可惜風既不能滅火，東風又是吹煬火種的，而周瑜的心病，孔明的借東風，更是爲了抗曹。

出賣自己，出賣難友，出賣民衆，汪精衛都出賣過了，現在更大出賣民族和國家，以至友邦英美法蘇的友誼的援助，誠所謂大拍賣。

不賣則已，一賣，便不知伊於胡底的。

但結果大蝕本，也不知伊於胡底的。

貪心不足的汪精衛，既已是中政會主席，參政院議長，國民黨副總裁了，幹麼還要通敵求降？奴隸總管的心理，首先是「寧贈外寇，不給家奴。」

汪精衛的豔電，日機曾經到處散發。想來，雙方要有會心的微笑罷。

但散發的豔電，是經過檢查的節錄。此亦可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取消的放大法

世間有兩種取消法，要歸結到虛無的。一種很明顯，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倒並不限於抗戰以前的汪精衛外交的，可以說是縮小法，縮小到沒有，便被取消了。另一種則相反，相反的是放大法，相反的是不容易看出，也可以借用兩句成語，就是：「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但作用是相同的，也是取消，從放大到沒有，類似兒童吹肥皂泡的遊戲，愈吹愈大，終於消散，雖然天曉得取消的放大法也是遊戲。

而這種取消的放大法倒恰巧落在汪精衛的頭上。

有人「認爲最近汪精衛的機關報南華日報被禁止郵寄是一種不適合的步驟，」既已「事實上，該報被禁止郵寄與否，對於中國最後的勝利毫無影響，」卻接着又「而且假使沒有禁止郵寄等限制，那末，中國抗戰前途，必更爲有利。」爲什麼呢？理由大得很：「中國抗戰的重要點意義是言論的絕對自由，無論那種步驟和行動，必須絕對民主化。中國的抗戰光明正大，任何方面的建議批評，都不會影響抗戰的前途。」不久，又「認爲現在一切『嚴懲』汪精衛的要求，未免是有些過火。就是我們認爲愚蠢，疏忽，在國難時期不重視國家福利的人，他也有行動的自由權。無論如何，我們應給他言論上的自由，我們認爲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最近汪精衛發表和平宣言結果，已使中國

內部更爲團結，一致反對投降，這足以證明言論自由的確是一種健全的學說。」理由也大得很，而且「最近汪精衛發表和平宣言」好像是「使中國內部更爲團結」的膠水漿糊似的。同樣，也有一點小關節目，就是既已「認爲」「有行動的自由權」了，卻又「以爲汪先生現在應該遠遁他國，」好像「行動的自由權」沒有「言論自由」那樣「重要」似的。

但理由雖然大得很，可惜並非眞大，而是放大，表面放大自由和民主，實際取消自由和民主。

自由和民主，的確是很成問題的。過去所謂自由和民主，曾經指出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實際還是獨裁。蘇聯號稱自由和民主，資產階級也反過來問過：你們既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有自由和民主麼？這是善於順水推舟的。現在中國抗戰，保障自由，實行民主，於是有人也反過來問了：你們禁止郵寄漢奸報紙，要求嚴懲漢奸，還算自由和民主麼？這也是善於順水推舟的。「愚蠢，疏忽，在國難時期不重視國家福利的人，他也有行動的自由權」的呀。順水推舟是放大的步驟，放大了，就可取消了。

答覆卻很簡單。蘇聯的答覆是：多數！我們的答覆也還是：多數！

後記

這裏十九篇雜文，除了需要批判論爭，游擊戰的雜感和凌遲，取消的放大法是先後刊於華美週刊，魯迅風週刊，譯報週刊以外，都是先後刊於世紀風的，正如前一個合集邊鼓集裏所收我的雜文大部分是刊於世紀風一樣。

提及邊鼓集，我便想到曾經引起過有些人的重視的藐視，「魯迅風」成爲被攻訐的焦點。現在纔該遺忘了罷，因爲根本已經無視，而無視也是從廣告到本身，固無所用其重兮藐了。這使合集的作者可告無罪的。

但在我卻難說。當「魯迅風」被攻訐的時候，我的收到這裏的雜文逢惡，算命看相者流，栽刀，就已曾被或截一段，或割一句，說是不如「打倒××朱羅，」「××小鬼媽特皮」的「原始性，」倒也罷了，甚至又摘我的收到這裏的雜文「固有文化」和逢惡，栽刀的一兩句，和摘自別人的句子，更和摘者自己的造句雜串起來，以達到「讀不懂」的目的而後快。那樣的羅織工夫，是眞使我

覺得沒頭沒腦的。凡所尋章摘句，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所以不贅摘了。我慶幸於賴有合集之出，章句能得還原，——本來還是在原文裏面的，因此我也覺得筆究竟不是刀，那麼就說是「示衆」罷，但又並非梟首裂屍式的「示衆，」則復頗爲遺憾而亦慶幸者也。

是爲「後記。」

一月二十七日

周黎庵作

原

书

空

白

页

救火者的工作

魯迅先生挾着一枝健筆，在人海中搏鬥了十幾年，死了之後，便有自命不凡的批評家出來蓋棺論定曰：魯迅是枉費心力了。一方面推崇他少數的譯作，一方面便是奚落他大量的雜文，這批評眞是聰敏得很。

然而也有礙脅意得很，魯迅的全集一印出來，全部的戰蹟編年的給排列在面前，有誰肯用心思挨次的讀來，準可認淸楚十餘年來中國文壇的一副面目。倘使沒有這樣一枝衝鋒突圍的健筆，則今日文壇上，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正不知是如何一番情況。這些廓淸的工作，在我們後人看來，前人的功蹟，眞是值得推崇和難得加以抹煞的。

而且，在抗戰中的今日，一切的蠹蛆和犬類跳踉中的四周，作爲後人的我們，更應該暫時放下不關緊要的工作，而拾起先驅者的戰具，奮勇地向四周應戰的。

在今日的四周，除了正面的敵人之外，定睛一看，文壇的盛況，原也不減於當年，市上固然久已

有了品賞『名畫』的『雅人，』也不乏專談『香豔肉感』的『學者，』中間更插了『順天應命』的『論客，』談狐說鬼的遺老；而且自命超然感嘆房租可憐難民以示馴良的，也大有人在。那樣的痲痺和悠閒，總不能不令略有正義和不忘記自己立場的人看了舉起標槍吧！

標槍是鋒利的，至少是刺破了痲痺的沈醉和悠閒的幽夢，然而舉槍者的心卻是溫和的，絲毫不存些惡意，除了對於正面的敵人不辭衝殺之外，對於那些動搖者和沒落者，總是想用最嚴正的言詞，喚醒他們的迷夢，叫他們回頭是岸。

高爾基在奸細裏描寫一個沒爺娘的常受世人毆打和虐待的孩子埃夫賽。他在受罵挨打之中，卻看清楚人世間眞眞團結的時光只有一個時候，便是：

對於火災鬥爭的時候，能夠看到這樣協同一致的行動，確是非常愉快而值得高興的事情。大家互相的鼓勵，相互的稱讚着各人的靈巧。卽使高聲命令的時候，那種態度也是非常的和善。在他們的喊聲裏面，毫沒有一點惡意。

對於家國民族的危亡，總該千萬倍於火災，而救亡的工作，也總該千萬倍緊要於救火的工作吧！喚起每一個人的呼聲，雖然高聲些，甚至於嚴厲些，但內心一定是和善，絲毫不會含有惡意的。

至於非但不共同起來救火，而且相反地在火上加油，助長火的惡焰，增加救火者的困難的人們，那是無可加以恕道的，勢必舉起了武器，一槍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血肉的演習

古時候，人類是野蠻的。除了自己之外，對於他人的生命，好像今人之於家畜一樣，一些也不值得重視，高興就可以拏來宰割。不獨宰割已也，而且還可以把人命玩出種種花樣。地不分中外，自古都是已然的。

在古羅馬帝國，是有過『鬥獸場』的，那遺蹟到現在還保留在負有『開發人類文明』使命的首都中和『墨索里尼運動場』並峙着。所謂『鬥獸』的主體，倒並不是獅虎之類。而是以血肉之軀的人類和野獸相搏鬥。觀衆，當然也是人，而且結果也是有一定公式的；便是人總是被野獸撕噬得血肉模糊，於是觀衆也和現代劇院一樣，拍拍手掌而散。

在中國，那種把戲比較來得莊嚴一些，不像羅馬人那麼之出於嬉戲，我們不逢有軍國大事是

不玩那一套的。故名將出師時，總有幾個囚人活生生殺死在將軍大纛底下，說是祭祭旗而可以『旗開得勝』云。次要些，便算是釁鼓了，把人的鮮血塗在新張的鼓皮上，說是可以使鼓聲響亮，於是也殺了幾個人；而鼓不是用於戰事，便是用於祭祀的，可見也是莊嚴的事。

以人命爲工具，雖有出之嬉戲和莊嚴之不同，但其結果是一般的，便是把他人的鮮血作成河流，將自己浮上高高的寶座。在後世讀歷史的人們，看到先民如此的野蠻和殘酷，眞也覺得汗顏無地，頗有些與古代是什麼世界之嘆了。

然而人類畢竟是進化的，由野蠻而至文明的坦道，不知浪擲過許多志士的頭顱，熱濺了多少英雄的鮮血；到了今日，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世界眞是已不是和古代一般的野蠻和黑暗了。

因爲人類到今日已有了法律，不獨有了國內的法律，連國際間也有公法的。雖然有時還免不了要殺人，但畢竟殺得文明些，要通過了法律的堡壘才可把一個人命送上電椅去；而戰爭呢，則據說是要依據國際公法，可見得人類的確是進化的了。

然而正因其進化，所以用毒瓦斯殺敵，強姦致死等等『美舉』會使人們驚訝；但倘使和古代的以人命爲嬉戲一比，便反會覺得茫然若失的。實在也少見多怪得很。

但是也切莫以爲現代人沒有古羅馬那麼有閒情逸緻，在瘋狂的國家裏也正有這種瘋狂舉動的。且不提在阿比西尼亞飛行中以擲彈爲有趣的英雄，順手一找，便找出我們天空上有這樣的人物在。九月十三日香港電云：『某某兩國飛行學生，在航空母艦上飛行各地實習實地投彈。』

這條簡短的電文，是很可耐味的，『航空母艦』和『各地』是兩個『衝突』國家所有的，而『某某兩國』的『飛行學生』呢，則不難想像其國籍的。惟其爲學生，故需要演習，而演習不在假設的目標上，卻用眞實的炸彈擲在我們活生生人民的頭上，這樣用血肉的演習，眞是在軍事史上找不到前例，而只好歸之於古代先民一律看待了。

世界上儘多狐鼠結黨的國家，除外交上的沆瀣一氣之外，又在軍事施行那麼沒有人性的行爲，這是在把世界的進化，人類的文明倒拉到什麼年代去呢？

血肉的演習，總有一天會用血肉去報答的。而人類倒底還要進化。不信，請看今日古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廢垣殘壁吧！

文士的沒落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被譽爲『憲政之神』的八旬老翁尾崎行雄，年來目覩六十餘年功績，毀於一旦，悲痛之餘，不甘沉默，拾起他一枝健筆在改造雜誌九月號上暢談起對華認識來，他除了否定自己民族的偉大，和不承認支那民族的低劣外，更給國內的一些文士下了一針見血的批評，說是『日本未曾遺下世界的事業，亦沒有世界的巨著；在中國方面，則反有驚天的大事業，亦有偉大的著作』云。

眞的，一個『善能吸收他國文物』的民族，『未曾遺下世界的事業，』不論任何方面，便是他們絕大的悲哀。

而且尾崎行雄所還有忌諱而未發的話，是『不獨未曾遺下世界的事業，而且相反的毀滅已經吸收的事業』呢！作爲一個身經六十餘年創立憲政過程的白髮蕭蕭老翁，目擊時艱，無怪乎他的憤懣要流露在字裏行間了。

和尾崎行雄處在同樣苦悶中的，還有被譽爲『憲政之父』的西園寺公望元老，自從他親手提拔的後輩一手毀滅了艱辛奮鬥的『業績，』一手建立瘋狂慘酷的『偉績』之後，便一直沉默了年餘；以沉默來報答暴行，比老的悲痛，也該不在尾崎君之下吧！

所引爲扼腕者，這兩位白髮蕭蕭的元勳，只是紙上談兵的文士而已。在舉國兢兢業業創業建國的時候，一枝健筆固然抵過十萬橫磨；但到了一肚皮『王道，』滿懷子『膺懲』的今日，文士的命運，不是卑劣地做了爪牙，便是悲壯地供了犧牲。兩位老人的憤懣，倘使不是元勳重臣和白髮滿頭，恐怕早已在軍閥魔掌下關在牢獄中討生活吧！

一方面卻是跋扈飛揚，以出身行伍的軍人，稱跞掌理全國學子的寶座，踐踏思想，摧殘藝術。這是證明：文士的命運，已陷入沒落的深淵了。

在這一羣裏，除了加入抗爭的鹿地亘，身陷於囹圄的勝水君，寥寥可數外，連一個石川達三都要予以刑事起訴的。然而等是文人，卑劣的要算是菊池寬之流了，他除了跟着林房雄跳跟外，還帶領着大隊文士遠來上海，說是輔助軍部攻略武漢云。這樣的消息讀了之後，眞不能不令人爲數十年來的文化運動倒抽一口冷氣的。

再等而下之，如佐佐木邦、森下雨村、甲賀三郎之流，或託跡於大衆，或寄意於報國，奔走獻媚於海陸兩省之門，不獨忘記了自己的使命，連先賢們創造的業績也不復予以顧惜了。無論自動或被動，情況都是可憐得很。

若是眞爲共存共榮起見，爲東亞文明着想，作爲鄰邦的我們，對於那些文士的可憐相，眞也不能止於一歎吧！

勸懲

清人的筆記，除了談狐說鬼和紀錄要人嘉言懿行之外，還有一種敍述民間傳奇事蹟的。那些筆記，當然是有眞實性的居多，但作者並不——或許是不知道——用創作的手法來寫，像劉半農先生簡述茶花女的故事一樣，一部有很動人事蹟的小說。在他的筆下，便變成『某生悅一妓，其父懇其與生絕；生果怒其無情，妓亦抑鬱殉情死。』這樣聊聊數語，毫不動人，看着便滑過去了。

比這種故事更多看到的，是『冶遊逢妻』這一類型，自『某生好狎邪遊』開始，以至於在妓院中逢到一妓，『卽其妻也，』『因抱頭痛哭，』『頓悔前非焉』而爲結束。這樣的故事，作者是不惜用二三千字來敍述的，因爲其中有一個『勸懲』的大道理在，要告訴人們冶遊是要得到惡報，也便是適合了作者寫作的目的。

但可惜的是，這類型的故事雖多，卻沒有小仲馬這樣一枝筆，社會所產生悲歡離合的事蹟，只成了迂腐的『勸懲』品，否則，豈足令茶花女專美於前。

現代報章平鋪直敍的記載，也很同於清人的筆記吧，於十月十九日於報紙上，又發見了同一類型的一條：

日前白蓮涇港附近草房內，有兩日兵自縊身死。其原因係發覺渠等之妻，在虹口爲妓，兩人赴虹口狎遊時，適乃妻等油頭粉面，含笑逢迎，相見之下，轉喜爲悲，互相飲泣，一陣傷心之後，歸而出此下策。遺書略謂愛妻操皮肉生涯，遭遇生平未有之恥辱，無顏再見世人。

故事所不同者：是『某兵』並不喜『狎邪遊，』因爲所遊的不是妓院而是『帝國婦女安慰所；』和不能『頓悟前非。』因爲前者可以和妻子去謹守本分，後者則非但不可能，而且還要去『忠勇殺敵，』讓妻子繼續過其『油頭粉面，含笑逢迎』的生涯，因之，就非歸而出此下策不可了。

這故事於我們普通人，雖很少『勸懲』成分，但給法西斯軍人看來，實在也是很好的『勸懲。』要是彼邦文人中肯據此寫一篇小說，倒實在是頗『有裨於世道人心』的。

商辦祭孔

儒林外史總算得是一部出類拔萃的小說，然而結局也脫不了大團圓的舊套，演出一齣公祭泰伯的好戲，莊徵君，虞博士，尉衡山，馬二先生等書獃子一齊登場，進退雍穆，韶樂雅奏，好像置身於三代之間，書生的大業便完成似的。

吳敬梓不寫祭孔而無端捧出一個吳中大聖人泰伯，可見在他的時代對於祭孔已經有了不滿。但猜測起來，他的不滿也有限得很，至多是大成殿上擠滿了『官生』（以官卷應試的生員，）或是古樂奏得不雅，八佾舞得不像而已。這些已招致衞道的書獃子生氣；但那時的武官和商人，則決沒有一個敢闖進神聖的學宮的。否則，書獃子們就得嗚呼大吉。

何時起纔給非聖人之徒闖進神聖之宮呢，考據起來總在革命之後，聖人打入冷宮之時。首先混進的是武人，因爲微武人則聖人的冷猪肉便無着處，不得不妥協一下。後來由督軍而至主席，等是武人，情形也相同，不過後者懂得一些革命的宣傳方法，我們便聽得洋洋乎盈耳哉了。

武人作了臨民的有司，混進大成殿蓋已二十餘年於茲。剩下來的人物，學生早已舉起了叛旗，泥腿子的農工永遠不會和雍容肅穆的祀典有緣。只有商人，到今年才得一步跨進大門。現在不獨跳蝨稱王，連買辦也作了大官，幾千年來劃得很清楚的衛道界線，這一次連最後壁壘都破衝破了。

商人的手段自然更不及武人，武人有幕客有軍師，而商人只有賬房和跑街，這齣戲文不獨去雍容肅穆已遠，而且牛頭不對馬嘴，竟變成文明戲的演出。十月二十一日申報告訴我們說：

國民政府規定國曆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節，而僞組織則仍沿用舊曆。僞『市長』傅筱庵，特於昨日祀孔，並『令』各『局』『所』停止辦『公』一天。傳本擬於昨日上午七時，親至南市文廟，而又畏首畏尾，故臨時改在三元宮內舉行。菩薩寶殿，權充孔子聖廟，淨素佛座，陳設太牢三牲……

連道教和儒家都分不清楚，已經很可笑了。更有趣的則別的報紙上還有報告，說是當時還僱維也納舞女二十人參加云。在商人眼中，舞女之舞華爾茲，也正相同於八佾，再輔以凡華林銅鼓而代韶樂，這就十足顯出買辦手法的祭孔了。孔子雖是聖之靡登者也，看了一定也就氣死完事。

然而以上所記，也正是說說笑話解悶氣而已，倘使誰要認眞起來，硬爭道統，你依陰曆祀孔，

我照國曆祀孔；你祭得非驢非馬，我祭得分外認眞；你商人舞女，我文人學者。爭這閑氣，是大可不必的。

佛教有大乘小乘，眞眞的儒家也得有個分別，在今日馬祖對付佛像的辦法是可以效法的，皇皇然的聖賢木主，不論其放在大成殿或是三元宮，都當作『乾橛矢』看待可也。

時代與時代

一九三七至三八這個年頭中，眞可以說是『大時代』了。一切的抗爭，撕毀，滅亡，儘量的在改變舊時代的面目。一位公法學者告訴我，他把書店約他寫的一本『國際公法』簽約退還了，因爲他恐怕寫出來的東西，會不成其爲『現行法，』而變成『歷史，』就不免誤人子弟。時代是演進的，決不是幻成的；而今日操縱時代的魔手，卻比幻成更快，此時代之所以爲『大。』

正因在大時代，所以容得下許多形形色色的東西，新奇的貨色來不及趕出來應市，則棺材裏掏出些朝珠花翎也是好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中，在立體型流線型的建築下，陳列着乾淸宮內『佛

爺』玩厭的寶物，也不會不調和；正因爲這是大時代，不論新舊，凡是動人聽聞夠刺激的，來吧，都會有它的位置。

當然，也得供人鑒別。

乾清宮，還不夠舊，知短只有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再舊的還有，那便是世界上最早一個死去的『陛下』放在斷頭台上面死的，誰都記得。但還有誰記得他的聖子神孫嗎？沒有。我也今天看報方才知道，叫做『巴黎伯爵』的。這位『伯爵』的『采地』實際上已做了一百多年民主政府所在地，他其實是連踏進巴黎一步的權利也是被剝削的，然而終也趁着這個大時代，飛到邊境鬼鬼祟祟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起來，說『自慕尼黑協定成立之後，法國在政治上所處地位，極爲危殆，更因全國人民在政治上見解未能一致之故，遇有緊急問題，事實上即無法採取重要決定，惟有恢復君主制，始不致被迫而在衰落與實行獨裁兩者之間，有所抉擇』云云。

慕尼黑的協定，固然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黑點，無論這個黑點將擴大至『實行獨裁』或趨入『衰落』之途，但挽救的辦法，則決不是『惟有恢復君主制，』諸色人等，誰都明白得很。這樣的談話，要聳動聽聞是不會有的，因爲在大時代中，忘記了那個時代自己醜惡的臉譜，趁着亂哄哄的鬧

熱，搽白鼻子，作一個小丑的插曲而已。

那樣的人世界上眞也多得很，所謂舉世滔滔皆是也。

然而過去的臉譜倒還並不十分醜惡的，假使換一個不是『巴黎伯爵』那末的小丑吧，這樣的談話，就不免聳動聽聞而有些可怕的影響會發生了，但可惜法國的民衆對於民主自理的信仰已變成全國一致，要想動搖實在很困難。不過對於煽惑人心的罪狀怎樣呢？曰：有之，請看兩句詩：『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雙照樓詩詞稿譯雨果詩）不獨在雨果的共和時代已有了這樣森嚴筆法，迚一百年後的民主政府，對付『巴黎伯爵』之流，也還規定他們不准入境，和返歸本國，卽得判處監禁的。

在大時代中，雖容得下許多形形色色的臉譜出現，但畢竟也有個沉浮的；正如北都可以慷慨而歌，而西市卻變成囁嚅而言了。時代與時代，現在原也只有一個時代，不過有人說是『大』一些，但也決不會把過去的時代包括在內的，我懊悔錯寫了題目。

遺民今昔

『遺民』的起源很早，三代就有這些人物，伯夷叔齊義不王周，躲入首陽山裏活活餓死，這該是貨眞價實的『遺民』吧。後世以『遺民』自居者，便把兩位封作祖宗；然而行徑卻不同得很。

第一，以『民』自居者，大抵就不是勞苦大衆。他們不是特權階級，便是知識份子，而且在平時是並不肯以『民』自居的；但一碰到異族侵凌朝代更易的時候，他們抗爭既不能，幫兇又不屑，乃覺得還是民間可以托跡，於是搖身一變，掛出招牌，自居於『遺民』了。這塊招牌倒是金字的，八面玲瓏，雙方討好：對新朝表示消極沒有大企圖，對故國則表示尙存黍離之思，所謂『寄沉痛於悠閑』是也。於是不但當時得全性命於亂世，連身後的聲名都給安排好了：他們大都皆有一個集子。

『遺民』所缺的就是聞達，但聰明人，決不想在亂世求聞達，聖人早告訴他們，『治世則行，亂世則藏。』不過要緊的是有錢，因爲有了錢，才可以閉門著作，種花藝菊，吟詩遊山等等……否則，難免『遺民』做不成功，『西山蕨薇採精光，一隊夷齊下首陽，』給後人製造笑話去了。

可見『遺民』決不是大衆，但也決不會是大臣。明初蒙古的降臣危素還以遺老自居，這便是不識相，非給朱牧兒砍頭不可。大衆逢到異族的侵凌時是只有積極地抗爭和消極地熬受兩條路，決想不到在這時候把自己化成第三種人來渡過苦難的時代的。

明朝帝皇十兇九惡廷杖廠衛等等奴僕臣民的結果，把士氣摧殘得奄奄一息，因之亡國時艱苦的抗爭之士，實在聊聊可數；但是清室定鼎天下太平之後，『遺民』卻忽然多起來，這時便成了『遺民史』上最鼎盛的時代。那些『遺民』中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固然身與鬬爭，退陣下來，才加入『遺民』羣的。但也有在抗爭時無聲無臭而在『遺民』招牌上卻異常響亮的，如徐俟齋（枋）一『遺』山中便是四十年，連死後能挨到兩廡吃冷豬肉的理學名臣湯斌，以堂堂巡撫之尊徒步去看他，都幾次三番不見。這些人物都是清高的了，但大部份卻不免後來屈節事仇；一到了西山蕨薇將盡的時候，『博學鴻詞』的羅網大開，『遺民』『遺民』便如飛鳥投林各逞長才，榮稱翰林院檢討了。

然而，明末的士人，雖不身與抗爭，但『遺民』的頭銜和行徑，總還是在亡國之後才放上的；而今日的學者之流，卻更進一步，當舉國尚在一致抗爭中，勝負之數未可預卜，他們早已準備亡國後的事業，先把『遺民』的招牌掛出了。不信，有七七事變後六十有二天胡適博士致半友書爲證，他以爲『決心居留，也是最可佩服之事，』而埋頭著述，完成巨作，正得着一個『陳仲子匍匐食殘李』的機會云。

果然，不負博士所勸，今年便有人開來一篇帳單，不獨是臨川音系表已完成，連幾何原本也悠閑地予以重譯了。『閉門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鐵蹄下的籠城中，若不是掛了『遺民』招牌的諸公，恐怕早已束裝『飄蕭一杖天南行，』或是榮任『新民學院』教授了。今之『遺民，』不獨有異於三代之『遺民，』抑且和清初的『遺民』也不同，那個朝代有國家還在一致抗爭中，便先有遺民出現了的？

嚴格說起來，在歷史上或在今日拿『民』字來分類，是只有『順民』和『逆民，』決不能有『遺民。』如伯夷叔齊，餓死不食周粟，這是『逆』到了極點；即使是顧亭林和黃梨洲，前者遍訪天下郡國利病，後者到處奔走講學，無非佈置起事形勢和播散革命火種；亭林先生九死一生，他到臨終還是一個『逆民。』

至於所謂『遺民，』除了不做官故示清高外，其餘一無所取，還不是成爲服服貼貼的『順民。』更進一步，接交官府，化爲山長；鴻博一開，榮任檢討，這便成爲奴才了。

『遺民』是要不得的，在全面抗爭中的今日更要不得，凡爲被侵略國家的人民，不爲『逆民，』便爲『順民，』捨此並無第三條路。

救國的幫閑

善於做救國策議的人眞也令人佩服，好像無論什麼社會現象，一到他們的筆下，便會變成有關國計民生的大道理的。

前些時，有些摩登小姐和少爺們偶然高興穿穿紅襪子，便有人出來阿諛他們是『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這一阿諛頗使洋場上摩登男女高興一時，因此『先烈的血跡』就灑滿了上海柏油路上。但『前進』卻未見得，因爲一離開洋場這雙紅襪便和『紅領帶』一樣，會變成『赤化』的標識，而會眞化爲『先烈』的；所以他們只得『踏着先烈的血跡』而在跳舞場或跑冰場中大溜其圈子了。

我因此知道，眞眞在『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的人們，不但並不穿紅襪子，而且或許連穿一雙破舊襪子的機會也沒有，可見得這樣的言論實在是扯淡。

但主張穿紅襪子的，究屬還是抽象的胡扯，除了喜歡漂亮和趨時的摩登男女，畢竟普通人是

不大會上當的；於是乎人們雖然還是繼續在穿襪子，而『先烈的血跡』卻漸漸的沖淡而化爲烏有了。

不過，人們的閑情是未必因此而沖淡的。過了一些時，看見幾個愛漂亮喜歡新奇的女人穿着短旗袍，便又出來大喊大嚷，歌功頌德，捧她們是實行節約了。把旗袍下擺截去了一大幅，據說也和救國有莫大關係的。

節約救國，話說來非常正大光明，但能聽從他們口號的，也還是幾個愛漂亮喜歡新奇的摩登女人，趕快拋棄舊有的長袍，改買『救國』的短衣，於是『救國』的新裝確乎是風行起來。至於仍舊穿着落伍旗袍的女人呢，有的，而且很多。第一是做不起新的；再則要從舊有的剪去一截的，似乎還並無其人，而且截下來的一無用處，則去節約之旨已遠，所以她們對於這樣的『救國』也便不大熱心了。

專門對付女人，這是中國人的一貫法子，但這回也有分外認眞的，總算並不忘記自己，連男子的長袍也要改短了，說和女子有同一意義。但可惜只剩下一片嚓嚓喳喳的議論，到現在還沒有勇氣實行的男子。然而終年穿着短袍子的卻大有人在，他們生來就不曾穿過長袍，因之也沒有那些

高論。

因此我知道洋場上確有這些許多善於做救國策議的人物，連這幾大蟹上市季節，他們在告訴大家怎樣吃法之餘，居然也還拖着一句『切勿忘記蟹膏中所含的血腥氣呵』慘厲的尾巴，這樣每飯不忘的精神，眞覺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如此熱心於社會，是好的，然而也很令人感慨不公平。

例如有衣穿的，偏有人會勸導他穿長穿短，有飯吃的，還有人替他每星期開一張菜單，都在報紙上佔着絕大的篇幅；然而關於衣食兩缺人們的消息，卻給擠在找都找不到的地位了。

幫閑原是只幫富貴人家的，決不會幫到窮人身上。但我在這裏要鄭重請願，請別再把救國當作幫閑的手法了，因爲富貴人家的衣食住行，和救國是很少關係的，除非你能勸籲他們眞的肯樣樣節省下來。

然而，那又和幫閑的初旨相去太遠，他們要的是新奇，何嘗眞的要節省。而且眞的省衣縮食，豈不連幫閑們的飯碗都被敲破？罪過，罪過，不說也罷。

戰爭和犯罪

意大利學派的犯罪學者分析犯罪的原因時，常把戰爭歸入於消極一方面去，他們以爲戰爭的發生，足以減少犯罪的存在，因爲平時一切作奸犯科的莠民，一到了戰時都化爲兵士而出征，於是犯罪便無形的減少起來。他們所舉的最好例證，便是中古時代幾次三番的十字軍東征，不特帶回了若干西歐所不曾有的東方文化，而且連西歐社會所有的流氓，騎士，馬路豪客等等一股腦兒都『神聖』地變作從征者，頓時把西歐的社會秩序澄清起來了。

那次中古的連續性戰爭，後來的歷史學家和犯罪學者一唱一和地把它歌頌得神聖非凡，好像非藉戰爭，文化便不能溝通和犯罪不能消滅似的。

戰爭之不能溝通文化，這不但在後世已彰彰甚明，而且已在廿世紀化成侵略者卑劣無恥的口號，如開發『非洲文明』和『提攜中日文化』然者，茲不具論。而戰爭是否能消滅犯罪呢？答曰：是可能的。但若眞眞的從研究人類犯罪的立場看來，則主張者的眼光，未免太淺。倘使用侵略者的

手法來處理減少國內犯罪，則又是最適合這理論也沒有，因爲這無異把自己國內所有的毒蛇猛獸，驅放於外國；於是國內的作奸犯罪，自然是突然的澄清了。

然而，在國外呢，中古時代東方民族被那些西歐流氓騎士所組織成的『神聖』軍隊所蹂躪的史蹟，雖然到後世很少史籍可稽，但在今日龐大中國被侵略的土地上，要是世人不都是聾子瞎子，用不身歷其境，只要看看報紙上的記載，便可知道是怎樣的一個廣闊的犯罪世界：強姦，擄掠，酷刑，慘殺，種種犯罪學者在非戰時所不常見到的犯罪事蹟，都在外國土地上明目張膽地幹出來。這樣有活生生的事實在，除了爲侵略者張目之外，戰爭豈能消滅犯罪云乎哉！

但在國內，倒也不能不承認犯罪是顯著地減少。不信，請看不是連平時以舉發犯罪爲職務的檢察官也榮譽地出征了嗎？有例爲證，據日文報載：

有日本檢察官與刑事犯各一名，在法庭相見一年之後，又在戰場重逢。檢察官姓平山，現任陸軍中尉。刑事犯姓岡田，現充陸軍班長。兩人此次得以晤面，實非意料所及。其相遇地點，係在湖北咸寧附近。當時平山中尉，正率其部屬向粵漢路上之咸寧前進；而岡田班長所屬之軍隊，則適向另一方面[illegible]，[illegible]以互敘『舊情』云。

據此新聞，則很可以知道侵略者的軍團，除了和尙和營妓之外，是怎樣的一個集合體，一年前之階前囚和庭上官，在一年後都在異國並肩地幹同一目的的勾當，這在該日文報紙雖認爲榮譽，而實際上卻表顯出日本司法的破產和到處姦盜淫掠之所由來了。檢察官也可以出征，是在說明法治之不需要；而罪囚之榮任班長，則和十字軍一樣，正是叫他們在異國表現一些犯罪的技能吧。我不知道平山陸軍中尉和岡田陸軍班長在咸寧附近怎樣互敍『舊情？』但平山陸軍中尉在這時總不能引用法律條文對岡田陸軍班長的犯罪行動有所起訴，那是一定的吧！嗚呼。

日本的意大利犯罪學派學者如寺田精一和勝水淳行之流的本人和門徒們，觀此將怎樣自圓其說呢？

新朋黨論

輓近頗有一些志士把中國人喻爲一片散沙，說是缺乏團結力云。但古些時，中國人確是很知道團結的，在東漢時有過『黨錮，』東晉時也有要被人『投諸濁流』的『淸談派，』北宋時有最

著名的『元祐黨碑』直到明末，還有過『東林』和『復社』。不過，一有了黨派，便是有了集團的力量，總引起在上者和在野者的不滿，因之『黨』這一詞，在正統派的眼光中看來都是不好的。於是滿清的統治者便聰敏得多，硬生生把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取消，叫他們個別的去唸書，而由官方集團的來應試，更集團的到『金鑾殿』朝見皇帝。這正和後世的法西斯主義一般，只有俘虜或罪犯是配關在『集中營』的。

在中國歷代的結社運動史上，有一些其實也是『黨人』的君子，爲了要否認自己的一集團是『黨』起見，創造了一個『羣』字來和『黨』字對立，說些什麼『君子羣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羣』的話，硬要用字面把君子小人分開來，這在後世看來便不免可笑。單就字面上說來，除了眞眞是流氓無賴一竅不通的集團如『黃道會』外，誰都會把字名題得非常響亮和有意義的。而實在要緊的倒是集團的宗旨和手段怎麼樣。所謂『相交以義』呢，還是『相交以利』呢？

到了今日，『黨』這一名詞，固然已不爲大家所否定；而且除了法西斯以外，每一國家的憲法也明明白白規定人民有結社的自由。辛亥以前『十惡不赦』的『革黨』和抗戰以前『殺人放火』的『共黨』總算都已淸淸白白的佔有政治上地位了，於此可以見得爲了『黨』而殺身成

仁，流血坐牢，到底還不是『相交以利；』而是有其絕對嚴肅的使命的。決不是小人的所謂『黨』拿了幾十塊錢一月使奔走効命如『黃道會』等等然者。

『黃道會』總也可以說是小人之黨吧。那些傢伙，只要給他們幾塊錢，爲善爲惡一概都可以，眞是所謂『相交以利』的了。而且只要有利，什麼都可以不管，法庭上可以招供，丟下一根肉骨可以打架；然而，倘使有人幸而能看到他們的『會章，』據我想像一定也很動人，也是怎樣『共同防共』呵！『攻守同盟』呵！『經濟互助』呵等等，嘩啦嘩啦一大堆的。不過，以區區流氓無賴的集合體，詞藻文采當然沒有這樣好。

要看好的，也有，那要求之於國際的結黨了。這不但不像流氓無賴只會在新亞酒店內鬼鬼祟祟行動，而是大規模的派遣使節呀，羅馬柏林呀，什麼軸心呀。但究其實在，拉下一張臉皮，也畢竟露出小人『相交以利』的一副醜相來。不信，請看下列一段事實爲證：

漢口淪陷時，義國天主教教士三人所居之住宅，亦曾被日軍搶劫。該三教士當以義語表示抗議，然並未稍見效果。最後乃情急智生，連呼『莫索里尼！莫索里尼！』詎知日軍並不知其所言爲何物，仍將財物劫奪而去。事後該三教士，將經過詳情，報告饒家駒神甫。饒神甫答曰：

『余未聞教士於遭受危難之時，不求告天主而求告莫索里尼者。』

當日軍開入漢口之時，國際狐鼠結黨的黨友固然大家互相高呼表示慶祝，好像是眞眞同志互祝勝利似的；然而一到了財物關頭，便對不起得很，雖高呼『老頭子』的姓名也只裝得不曾聽得，非仍加以劫奪不可了；這雖是一樁小事，然亦足以說明小人結黨的一切。

而且擴大起來，爲了利益，一切出賣，爭執，攻訐，以至於火併等等把戲，必將在這些小人之黨中演出，世人謹拭目以觀其後。

論『痛論焦土抗戰』

晉劉敬叔所撰異苑有一條云：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此卽是後世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的出處。

到現代，像張華那麼淵博神通的人物固然沒有，但蜀郡的銅山卻時常要『崩』的，而海上的

大鐘也仍舊會響應，那就得歸功於無線電了。故重慶的銅山喊曰：『和平！』海上的大鐘馬上哄起而應曰：『和平！』一搭一擋，用不着『蜀郡上其事』來證實，已給我們讀異苑一類書的人拍手叫絕了。

『焦土抗戰，』蓋是大大有乖於『和平』之道者，此一名詞之建立，乃蘆溝橋事變後主張抗戰到底的人物如汪兆銘先生所贊同，故『使敵人毫無所獲，』必須厲行焦土政策，言猶在耳，口沫未乾，何其痛快哉！但這已是一年之前的事了。到了今日，長沙一火，災黎數萬，汪先生菩薩心腸，便看不過了，於是才發表了『爲什麼誤解焦土抗戰』的鴻文。

不過，光見題目，不看文章，是不行的，還以爲汪先生是對於鄂悌文孚恩那些寶貝的焦土手法有所匡正了。然而不然，汪先生之意若曰：燒光了物質，卻不能燒光了人，雖不資敵，亦不資我，這班衣食無歸的人民，就很容易給人家收買去啦。反不如有住有吃，尙不至流爲漢奸，云云。

這樣的話不獨不是匡正人家的『誤解，』而且由『動搖』而『否定』已定的『焦土抗戰』政策了。不過抱歉得很，大部份的人對於『焦土抗戰』的見解還正和汪先生一年前相同，和今日的汪先生大不同，而且恰恰相反。要知道『焦土抗戰』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燒焦了足以資敵的物力，主要的是燒焦了一般做『順民』的苟安心理，更要焚醒了『和平主義』的美夢。失了衣食住

所的人民才會知道仇恨之所自，才會由『哀民』而成爲『哀兵』。若說失了衣食住所的人便會給人家收買，會做漢奸，我首先要替上海多少住在收容所的同胞提出抗議，他們爲什麼還在苦難中生活教育，而不做漢奸去？中國人民大概還不至下流到這地步的。而豐衣足食的『順民』呢，則漢奸大部還是他們化成的居多。

除了像長沙那般舉止失措的舉動外，我想『焦土政策』對於抗戰還是需要的，故張一麐先生唱曰：『三年拜賜拚焦土，收復幽雲總有期，』張先生七十多了，似乎比他年青的後輩更年青吧：而貪圖苟安的，卻更顯得蒼老，連說話都沒有活氣。

表顯於這樣文不對題的文章，蜀郡的銅山又崩了一次，而這一次的海上東應者卻更來得抉微發幽了，爽爽快快的噹噹而敲曰：『汪副總裁　痛論焦土抗戰　應從喚起人心着想勿誤解而「激於義憤」』（見廿三日×報新聞標題）

夫『痛論』者，疾首痛心而論之也，和『爲什麼誤解』意義不同，卻覺得不同得頗有意義；因爲這一改雖和原題不同，卻與本文相吻合了。

『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善哉，善哉，然而對於這兩者也不能不加上一個『嗚呼。』

血

看電影的，大都很喜歡非洲探險一類的片子，內容有野獸，有英雄，也有美女，那些都是故事的主角，表演得新穎和駭奇，實在令人愛看得很。

然而看得多了，野獸和美女固然不過爾爾，即使英雄如『泰山，』影子也就漸漸淡薄起來；但卻有一層濃厚的憂鬱，老是籠罩在心頭，那就是並不是主角的黑人。

非洲腹地的旅行，也許正和中國內地一樣，是沒有大道和鐵路的，於是我們的英雄和美人，必須藉手於人力。而人力，就是黑人了。在長林豐草之中，由一個介乎黑白種之間的漢子揮着皮鞭押令着，一大隊黑色的人類，像牛馬似的替英雄美人們負着行李肩着篷帳，滿身大汗出現於觀衆之前。

森林中是有猛獸長蛇的，而且歡喜吃人，更有着峻峯盤谷，也會使人失足致命；但英雄和美人是註明不會死的。然而不死幾個人，又顯不出非洲的危險，於是黑人便遭了殃，每一部電影中的導

演總要把他們死掉幾個，不是被猛虎一口噬去，便是從高山下吊了下來，都死得有聲有色。

看罷電影，有時也會替他們擔心，是否眞的會死掉呢？自然不會，這是電影，並非事實；連黑人們也還在金元王國，並沒有到菲洲去。不過菲洲總是有白人去探險的，則實際上黑人的命運，也就和電影中相去不會很遠了。

作爲被征服的人們的命運是這樣的，在白人們娛樂消遣的作品中畢竟也給我們看出這一些些來。

然而，不是能在銀幕上所能看得出的一定更多；不必到遼遠的菲洲去；就是中國吧！負行李，肩篷帳，已是太平盛世的事情了。我們的同胞，恐怕比菲洲的黑人更不如，甚至會被迫的負彈藥，拉砲車，以至於互相殘殺。

但是，有一點是不同的，卽是顏色沒有像銀幕上那麼黑白分明，而是一律黃皮膚的，倘使也要拍作電影，那就簡直難加區別了。

不過，就在難加區別這一着上——好聽些就是『同文同種，』我們更有一層比黑人不同的『寵遇，』事實如下：

美聯社北平二十日電云：今日據中國報紙中刊載之日方報告稱：日本軍事當局願以洋五元購『人血』五百克蘭姆，作受傷日兵輸血之用。蓋以日本人民之血液，供給不足，不得不向中國人民購買云。

五百克蘭姆的『人血，』只值得五元錢，賤是透了頂的，但菲洲的黑人恐怕還沒有這樣的寵遇，總算是中國人沾了皮膚的光。但是，用了中國人的『血，』補助了『英雄』們的『血，』再由『英雄』們用飛機大砲去流出中國人的『血』來，這一筆纏七纏八的『血賬，』究竟將來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清算呢？

方法是有的，而且已擺在眼前，要仍舊用『血』去清算來。

中國的『黃人』和菲洲的黑人所不同之點，或許正在關於『血』這一點吧！

定命論者的寓言

寓言，這東西是很有趣的，它的出現很早，我們讀它也很早，記得幼小的時候便讀過伊索寓言

了。當然，只覺得好玩，並不懂得有什麼諷世的意味。到後來才知道這東西被紹介到中國來也很早，是在明朝的時候便有了譯本的，那時叫做意拾蒙引。可見得全世界的人類，連明朝人也在內，實在都很喜歡寓言的。

寓言的好處在於什麼呢？諷刺。中國人諷刺的本領也並不弱，往往能一刺見血，令人哭笑不得。就用明朝人的例子吧，據徐禎卿剪勝野聞說：有一位寓言家在知道朱牧兒皇帝要來的廢寺粉壁上，畫一布袋和尚，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牧兒皇帝大怒，窮索三日不得其人云。

明朝這位隱名的寓言家諷刺本領眞算不弱了，把『爲政尙嚴猛』的牧兒皇帝諷刺得入木三分。我想，把這札寓言放在伊索寓言中，也不會遜色吧！

但，寓言的寫作，畢竟沒有每天寫三四千字扯淡的文章來得便當，它是需要精審的觀察和謹愼落筆的，故上乘者刻劃世態，入木三分，令人哭笑不得。中乘者不過是架空，毛病是不會有的。至於不會道及人家半字，卻帶給讀者大家沾着不良的影響，斯乃下乘。即使自己沒有創作天才，便是引用古已有之的東西，也是不免有上下乘之分的。而且我之必須在這裏善意的指出者，乃是它帶給

讀者的不良影響，故對於抗戰大計，亦並非『毫無關係』者也。

譬如有人巴巴抄了一段陳舊的寓言登在報上，題曰：學習，原文照錄如下：

驢子聽了金鈴子的美麗的歌聲很想學習，而（原文）知道金鈴子是以露水爲飲食的；驢子便開始吃露水，而這學習的結果是——三天之後驢子死了。

這札寓言，倘使剝去了皮，實際上是這樣一句話：『凡是學習他人所長是要倒楣的，』便很不成其爲諷刺了；因爲普通的格言，卻是叫人『學習他人所長，』並不倒楣。以文章而論，金鈴子的文章比驢子好，驢子要想超越金鈴子，也就得學習金鈴子，決不至學了『三天之後，驢子死了。』至於金鈴子和驢子體格和生理的不同，那是寓言的皮毛，剝開它便算，不涉寓言本意。

這札寓言的本身，不獨是下乘，而且是有毒的。它告訴人家的是『定命論，』叫人安分守己，不要胡思亂想去學習人家的長處，因爲那是要像驢子那樣死掉的，這是奴隸的哲學，統治者的手法。中國近幾十年來不肯接受西洋文化的頑固份子，內中就有不少那樣『定命論』者的存在；這存在便是中國進化的絆脚石。

寓言的出處不同，時候互異，我們當然很難找到這札寓言的作者和他所諷刺的時代對象，但

據其意義來推測，則不是出於頑固黨的手筆，便是自命文化高的人士對於落後民族惡刻的諷刺，善意是一些都沒有的。總之，這札寓言在創造的時候已含了很多的毒素了。這且不必去翻舊帳。

但奇怪的，這札含有毒素的寓言忽然有人巴巴抄下來公諸於現代讀者之前，難道中國到今日還不該接受人家的長處嗎？叫中國今日再固步自封不去學習人家嗎？抄者存心如何，可以不問，但其出現於堂堂報紙上，只問目的，不擇手段，諷刺人家的落空事小，帶給大家惡劣的影響事大，這一點是最值得思索的。

這類『諷刺家』大都就缺乏一些思索的腦筋。

略論王皙南夫人事

寧波防守司令王皙南的明正典刑，他的罪狀一般人以爲是瀆職和貪污，巴人先生在略論王皙南的被槍決一文中卻把他更主要的罪狀明顯的指出，這種批剖對於現在某一些官吏是很有益處的。因爲抗戰中的官吏不僅以清廉和奉職爲已足，必須於此之外，更得推行政府所定的一切

國策，把自己的行動思想和時代相配合起來。否則，雖矢志清廉等因奉此，有時也不免做抗戰的絆腳石的。

例如王皙南及某一些官吏，居然還在今年於抗戰後的國民政府隸屬下的寧波，大大的舉行『清黨×周年紀念，』一大批的演辭中依舊是『赤禍橫流』呵，『根絕共黨』呵。其實在這個時候，王皙南之類的官吏，早就可以引用比瀆職貪汚更重大的條文而明正典刑了。直至現在才被槍決，雖像小報所說，『死得很風流，』但我們還敢批評賢明的政府，應該把他的罪狀定得更確實一些，使他死而無憾；而且還可使和他採同一『路線』的腐化頑固的官吏知所警惕，這一着是必須的。

然而王皙南明正典刑的罪狀之一是『違令娶婦，』一般輿論的眼光是短的，着重了『近果，』忽略了『遠因，』而且因爲有一女子的關係，不論是死者或執筆者，好像都飄飄然的風流起來了。巴人先生在前揭一文中嚴厲的指出大家的錯誤，但他反轉來也說：『在我以爲與其說那新婦是「白虎星，」毋寧說她是中國的「救星」！由於她，中國是除去了一個「汚吏，」抗戰是除去了一塊絆腳石！』

用這樣結果論事的看法，來論一個女子，雖是巴人先生有激於那些胡扯的輿論，其實也不很妥當。倘使認眞一些的人看來，頗有會把那位金耐仙女士看作『救國女俠』的危險。我們應該用『誅心主義』的立場來批評，那位金女士雖不是什麼『白虎星』，實在也並不是什麼『救星』。因爲那位金女士，既曾留學日本，必有高深的知識，既會和那貪汚之名著於滬甬人士之口的王皙南訂婚，以二十歲的女子，下嫁五十歲的老頭，已是『淘金記』中的人物了；何況竟至身趁專輪，赴甬下嬪。對於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女子，實在不能不致深深責罪的。

在以男子爲中心的中國社會，歷來總是看輕女子地位的，但到了危急關頭，男子又很輕易把責任向女子一推，姐己楊玉環等，頂着亡國的罪名實在也很悠遠了。

反抗那些誣衊而爲女子辯護的，自然也有，如杜甫詩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姐，』宋人咏花蕊夫人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那些詩人雖爲女子辯護，但實際上還是以男子爲社會中心而言，近年來持以批評社會現象的，如周作人先生。至於十分推重女子的也有，如清詩人吳梅村咏吳三桂陳圓圓事云：『武安席上見雙鬟，血淚青娥陷賊還。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

天教紅粉定燕山。』這正和前幾年提倡西施救國的一樣，巴人先生在憤激中無意也有那種傾向了。究其實，這兩種對於女子的批評，都是不對的，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觀念究未排除乾淨而已。

在眞眞男女平等的社會，女子是平凡的，平凡得和男子一樣。對於金耐仙女士，決不能因她是女子，便誣衊她是『白虎星，』也不能因她是女子，便推崇她有功勳而不負絲毫責任。我們應從客觀的『誅心主義』立場來批評，那位金女士實在並不是抗戰中前進的婦女所需要的。這次現實的教訓，也該驚破了她安富尊榮的官太太迷夢而醒悟過來，知道應該用她留學日本的高等知識來做一些切實有效的工作吧！

梁實秋的『自由』

當民國十七八年之秋，梁實秋教授大大喊過思想自由，現在保存在人權論集中的鴻文，有他的論思想統一，結尾幾句像電影字幕那樣擴大起來的，是：

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

第三個『我們』的反對主張和要求，是可以代表梁實秋教授及其朋友們的意見，也可以代表一般正人君子反抗專制的態度的。後來大家有教授院長可做，也就偃旗息鼓，久不見有什麼下文了。

梁實秋教授的重露頭角，是在於化爲梁參政員之後，他把英國議會中的自由應用到參政會中來，以爲英國議員在議會中發言對外是不負責任的，因此竟敢不贊成長期抗戰的國策。殊不知中國能明白英國政治風度的人究竟不多；而中國人也並不見得都是『喜歡容忍』的民族。於是竟使梁參政員的言論自由『遭了壓迫』，實在是抱歉得很。

這之後，梁參政員畢竟是白璧德的信徒，是忠於他的思想的，最近又在重慶中央日報發出『我們的要求』這回的要求也許和十年前的要求思想自由有關，是『要求無關抗戰的文字』了。

自抗戰發生以來。即有抗戰文字的產生，幾乎是全國一致性的，除了國家的宣傳人員之外，可以說是完全合於梁教授十年前的要求思想自由的原則。因爲抗戰文字的產生，正與抗戰時代相配合，如水成渠，毫沒有強制的成分在。中國行政宣傳機關也從沒有通令全國文人如何如何，而中

國文人爲了求生求自由，筆下自然產生抗戰的文字，這當然是履行思想自由這原則的了。

大家既沒有積極的提倡抗戰文字，除了漢奸的文字之外，相反的，也沒有消極的限制非抗戰文字。要是梁實秋教授不願和人家『同汚合流，』儘可孤芳自賞地在侵略者轟炸之下翻譯其未完成的莎士比亞全集，以和坪內逍遙之流爭一日之短長。我想，中國人決不至那麼不能容人，會把梁教授罵作漢奸或其他的。

然而，梁教授竟然喊出要求無關抗戰文字的口號，這意思說，不獨是自己將寫無關抗戰的文字，而且叫人家也跟着他一起躲進屋子裏去。在梁教授自己或許以爲這口號和十年前所喊的要求是一樣的，實際上正是恰恰相反，十年前他是爭大家的思想自由，而今日則是要限制大家的思想自由了。這無異是打自己一個耳光。

報紙上說：梁自『要求寫無關抗戰的文字，引起各方的總反攻，』蓋不亦宜乎！

順民之路

滿清末造，外樹敵國，內起革命，滿清政府一面拚命壓制革命，一面卻儘量簽訂辱國條約。那時皇室的行爲，有人批評他是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心理，意思就是與其讓天下與『家奴』的漢族，毋寧把國家送與外國做附庸。這樣心理的存在，便釀成對內專制對外恭順的一副可憐相，堂堂大國，就被不齒於世界列強了。

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心理，實是民族主義之大敵，以自力圖生存固然是唯一的辦法，但到了非把『外人』話『家奴』擇一而事的話，則無論『家奴』可惡到怎樣，總還是送給他爲是，然而世人大都是負氣的居多。一待連自己也被壓在外人下面，這才悔不與『家奴』了。

更顯明的例子是明末吳三桂的引狼入室，他之投降多爾袞而和李自成作戰，雖然裨史上有種種傳說在，但顯然的他也有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心理，因爲他畢竟看不起李自成那種流寇，而自己又沒有能力抗拒，除卻投降李自成之外，便不得不把中國向山海關外一送。

要說專事侵略的『外人』是殘暴的，固然事蹟斑斑可據。例如滿清末造列強在沿海的擾掠，明末建州衞在邊境的劫奪淫殺生涯。但除非他們是不曾開化的蠻族，一味知道殺掠外，凡是有文化的侵略者，都會有一縱一放手段的。滿清政府和吳三桂之流的秋波送過去時，畢竟也能裝出大

仁大義的幫忙行爲，鎭壓革民，興師復仇，使他們感激涕零。但結果總是擺出侵略者的面目，說他們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朱明也，一下子便送掉了大明天下。吳三桂要是像唐代借兵回紇的郭子儀，也只好瞪目無言；何況他早已薙了頭髮作順臣了。

明淸末造的事實，若縮小到今日，也還可以看到那樣不識大體的人物在。據報載：南市有江北人任希彭者，以鑽營爲僞『自治會委員』及『難民區區長』，恃日人之勢尅扣糧食，姦淫婦女；其子任小彭（綽號小鬚赤練蛇）尤屬無惡不作，藉辦理南市死屍爲名，數月以來，竟發現駭人聽聞之殘酷手段，係將喪家上中等之棺木，於夜間將屍倒出，易以四塊松板，並將屍體上之殮衣剝去，致發生慘案一百餘件，而被害者『迭訴』無效云。

向誰『迭訴』，報上未有明白記載，姑且不提。最近又經被害者潮州會館，四明公所，永錫堂，徽州會館，京江公所等聯合控告於饒家駒神甫，經饒君調查屬實，由日本憲兵將任希彭小彭父子人贓並獲，聽候查辦云。

像任希彭那種小醜，實在是滔滔皆是，無足驚奇，而且姦淫婦女，罪實浮於盜棺剝屍，這裏也可不論。所可驚奇的卻是被害者的手段，據申報所載，除上述事實外，竟是『現由一般被害者，又聯名

呈請日憲兵部要求將任父子等處以斬決，以快人心」云。

侵略者姦掠淫殺的暴行，已是昭著於全世界，但在這裏，則一定是「澤及枯骨，」會准如被害者之所請而「將任氏父子等處以斬決，以快人心」的。因爲斬決之後，人心大快，侵略者已踏上統治者寶座而「聯名呈請」者，則正走向「順民之路」的一條絕徑。

要是不能自力復讎，則還是讓任希彭父子之流縱橫天下吧，切莫走向「順民之路。」

後記

寫這樣隨感式的千字左右短文，我大概是始於立報的言林；以前當然零零碎碎也有過幾篇，但數量卻是在言林寫撰的時候多起來的。『八・一三』前一年，我編輯談風半月刊，那本是一册繼承論語而以『幽默』爲號召的刊物，但到後來人家愈鬧愈兇，身處上海，實不能算是隔岸觀火，甘心默示而息，於是『談鋒』這一欄，便專門由我寫二三頁這樣的雜感，發抒一些個人對於國家大事的小感慨，直到停刊爲止。

當談風停刊的時候，正是抗戰的烽火蔓燃着南北，我實在頗有些懷疑文人的這枝筆；恰巧有些事跑到內地去，滬戰一發生，交通消息全遭隔阻，一擱筆便是半年，除了看報紙和聽無線電的消息空懷興奮踴躍之心外，從不曾想到親近紙和筆。那時候，我以爲：筆尖和槍桿的力量，相去實在太遠了。

那當然是錯誤的；尤其是淪陷後上海出版界的魍魎鬼蜮之白晝現形，更覺得用相對的武器

衝鋒掃蕩，並不是毫無實益的工作。於是當四月間風子兄向我約爲世紀風撰稿的時候，就毫不考慮重拾起舊日的傢伙，加入了向黑暗勢力抗戰的一羣。從四月到九月間的三萬餘字短文，已編入六人集結的邊鼓集中，這裏所選擇的十六篇都是九月後的所作，編者命令要選幾篇反映抗戰初期的文字，那我只好有礙他的意思了。

這十六篇中，有兩篇是應香港星島日報而作的，有兩篇刊在申報自由談，其餘都發表於文匯報的世紀風，那第一篇刊在文藝新潮月刊的救火者的工作，可以代表我寫撰這些短文的全部動機與目的。

在文字方面，還是那麼的迂迴曲折和許多戰友對所謂『魯迅風』的詬病一樣，我覺得文藝性的雜感和報紙短評及牆頭標語之不同，其分野雖不全在乎此而也是異點之一。所以雖有不能『明白如話』之詬，也只得由他去了。

（『一·二八』七周紀念日，記。）

風

子

作

原

书

空

白

页

『和敵人一起倒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國際革命作家協會向世界有名的著作家，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進攻了，當這遠東的戰爭預示着將成爲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向蘇聯進攻的朕兆的時候，你正在做些甚麼？你預備做些甚麼？』羅曼·羅蘭答道：『爲了那正在被進攻着的中國起見，爲了那顯露着危險的蘇聯起見，爲了全世界人民起見，爲了人類偉大的希望——那被奴役着的亞洲民族的覺悟，和那普羅列太利亞的俄羅斯的英勇的改造，給予我們以鼓勵起見，我喊「援助！和敵人一起倒下！」』

這是這位老作家的正義的呼聲。身當其衝的我們，尤其應該從奴隸的命運裏跳出來，大聲地喊：『起來！和敵人一起倒下！』

在這次蘆溝橋事件裏，卅七師士兵英勇的抗戰，全國民衆熱烈的呼援，已經充分地顯出『和敵人一起倒下』的決心了。在血光裏，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國家的誕生。只有少數的漢奸們，利用

着特殊的地位和環境，屈辱獻媚，妄想造出一個懸空的和平來，這和平又如何維持得久呢？今天晚報所載，日軍已經佔領了廊房，華北的戰事又在發動了。

不過，下午五時發行的申報號外告訴我們，北平又舉行了所謂談判。

近讀公車上書記，看到康長素起草的疏文，不禁悚然。這疏裏記那時候的情形說：

『……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備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厘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居之說。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諍，都人惶駭。又聞臺灣臣民，不敢奉詔，恩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風，數日換約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構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

疏文未上，而局已大定，這回憶眞夠使我們痛苦。但是，其實也未始不是現在的好榜樣。我們只有要求政府速下決心，不要再在和戰的關頭上徊徘。在目前，要求能夠實現不屈辱的和平，是萬萬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堅決地朝着那條流滿着先人的血迹的大道走去！

中國古書裏有一句話，叫做『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是表示『與之同盡』的決心的。可

巧這『太陽』又正是我們的敵人的表幟。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四萬萬顆心等於一顆心，四萬萬句話等於一句話，那就是：『起來和敵人一起倒下！』

血寫的歷史

這幾天的報紙上，登出了好幾條新聞，述說日軍在平津的暴行，轟炸，掃射，拘捕，奸淫，虐殺，殘酷得使人們難於想像。這是帝國主義者的一貫的行爲，也是奴隸們所必有的命運。豈但歷史上的記載非常昭明，就是在文學作品裏，也何曾缺乏這種事實的敍錄呢？例如特列嘉可夫（怒吼罷，中國！作者）在他的自傳裏述說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日日軍向海參威進攻，打敗了當地的遊擊隊後，他這樣寫：

『……有幹革命工作的嫌疑的高麗人，特別難堪。這些靜默的人，潔白的長袍彷彿是醫院解剖科的大夫，受到更無情的肉刑。被綁到鐵欄干上的高麗人，成排的並着脚，站在車站鐵欄干的橫撑子上。他們的家屬蹲在街的對面看他們受罪。強烈的仇恨由受罪的人們的眼睛

裏冒出。有人告訴我說，被綁起的高麗人怎樣唾了發慈悲心的日本崗兵送到他嘴裏的食物。

『然後把他們帶到輪船上去了。以後，海參崴的人很久不願吃市場上賣的蟹肉。』

強烈的仇恨從受罪者的眼睛裏冒出，牠是會燒旺後死的同儕們的血的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平津的恥辱，這是可寶貴的火種。保護牠，使牠不滅，使牠旺盛，必須發動全面的鬥爭，我們應該毫不屈服地抗戰……抗戰……抗戰下去。

而且還必得看一個新的堅決的榜樣：

『……布爾塞維克的威信在這個敢怒而不敢言的時日長到無限的高度。很多執拗的恨蘇維埃的人在這一天被日本人教會了忠愛自己的國家。

『就是在最黑暗無聊的政客們中間，日本人都未能找到一個人，肯在這被摧殘的海參崴宣佈自己爲政府。

『在三天之內，海參崴沒有任何的政權。』

因此，海參崴也終於沒有被從蘇聯的版圖上割下來。

江朝宗，齊燮元之流的存在，是整個民族的羞辱，但是，對於大多數人，日本人也的確教會了我

們『忠愛自己的國家』的任務了。我們將毫不屈服地抗戰……抗戰……抗戰下去。

歷史是用血寫成的。當被壓迫民族的血淤漬了帝國主義者的鎗口時，這是新的歷史的開始。

遣送回籍

這幾天，在前方忙着的問題是怎樣殺敵，怎樣防守已經奪回的國土；在後方，則是怎樣救護傷兵，怎樣安置難民。這些問題，權衡起來，雖有輕重，但就整個的戰局看來，都是急待解決的。

關於難民的一項，現在已經有人動議把他們遣送回籍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以上海這樣多的人口，戰事持久下去——事實上是必須而且也應該持久下去的——將來的給養，定感困難。及早把他們散遣各地，減少一些在戰爭中的大都市的負擔，使賸餘的整個的力量能夠集中於對付敵人這一點，則最後的勝利，自可更有把握了。

不過遣送的辦法，也應該有所限制。難民之中，多半是楊樹浦一帶工廠區裏的工人，其中儘有粗壯結實，機警能幹的人物，只要趕緊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叫他們擔任後方的救護，消防，警

備等等的工作，自然非常勝任，簡直還可以做得比少爺小姐們更有成績。因爲他們未經嬌養，吃得起苦。

應該遣送回籍的，是那些老弱和婦孺。還有，那些靠着自己的財富，在平日只知享樂，到現在依舊無所事事，甚而至於還居間操縱的分利者，也應該趕緊把他們遣送回去。這也是杜絕漢奸的唯一的辦法。

所謂上海中立區

上海設中立區域問題，東京的電訊，已經明白地加以拒絕了。他們以爲日本在中國的三萬僑民和鉅額投資，不能托他國代管，並且認爲解決的唯一途徑，只有叫中國遵守一九三二年的所謂淞滬停戰協定，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國軍隊必須退出上海。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萬萬不能忍受的。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血路，我們必須衝出去。上海是中國的領土，理論上就斷不應該允許中立區的存在，更何況還有下面這些實際的問題：

一、這次的戰爭，是甲午以來的中日問題的總清算，我們不能因爲上海一隅，而開了局部解決的先例。戰爭既已開始，我們應該堅持的是：談判的時期已經過去，或者說是談判的時期還沒有到來。

二、有人以爲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保障上海的安全，也就是保障全國金融的安全。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見解。全體不能安定，僅僅一個中心的安定是無補於實際的，更何況戰事在上海以外的各區繼續下去，即使上海成立了中立區，金融也還是不能安定的。我們應該明白，戰時的經濟重心是在鄉村，不在都市。

三、在軍事上，日本利在速戰速決，而我們則利在持久；日本利在專攻一面，而我們則利在全面戰爭。有人說，戰事的重心始終是在華北，這是不錯的。日本的發動滬戰，起初不過是想牽制我們兩方的軍力，我們加以猛力的抵抗，予以挫折，日本爲保持國際聲譽起見，不能不惱羞成怒，調動大軍。這時候就反客爲主，轉而成爲我們在牽制日本的軍力了。上海的戰事愈激烈，日本在華北的軍力，也將愈益削弱，這是必然的趨勢。

四、綜觀這幾天上海方面的戰事，顯然地，我軍是佔着優勢的，勝利的消息鼓舞着全國的軍民，

尤其是國際的視聽，對於抗戰的前途，這都是有着極大的關係的。我們必須使上海的戰事能夠持久，惟持久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有着以上種種的關係，所謂上海中立區的計劃，對於我們，也不見得是有利的，戰事進展着，這計劃大概只能作爲一種幻想而已。

粉碎敵人的計劃

雍容揖讓是中國人的能事——到現在爲止，日本軍隊已經侵入了中國的領土，攫奪了中國的城市，屠殺了中國的人民，然而有幾位學者，卻還在力爭不宣戰而絕交的並無法律上的根據。不錯，宣戰是必須顧慮到各方面條件的順利與否的，取捨之道，自有考慮的餘地，但如果要顧全歷史上的先例，以爲不宣戰也就不能絕交，這就未免太書本子氣了。而且這樣的先例也儘有。不久以前，葡萄牙不是和捷克絕交了嗎？然而兩國之間，至今並不聞有鎗礮聲。

討論法律根據，尋找歷史先例，正當學者們議論紛紛的時候，日本軍閥卻把我們滬東區居民的財產，全部沒收，並且把小工業機器，五金零件等裝成三千箱，搬上運輸艦野島號。我彷彿看見了

一張漫畫，那上面畫着一位中國法學家，他張大着眼睛說：『將軍！我們還沒有絕交，這是並沒有法律根據的呀』

然而野島號一直駛到日本去了。

不僅如此，而且日商在上海的財產，倒反而有了出售的準備，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要使我們宣布絕交的時候，撲一個空，沒收不了。

但我們也不怕撲這個空，因爲我們對日絕交的目的，不只是沒收財產這一點，我們於斷絕邦交，召回大使之後，還得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停付對日債務，在關係上和日本完全隔絕，這些舉動的意義是：

一、世界各國人民的廣大的同情，是我們抗戰的寶貴的收穫，也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可靠的助力。我們要用堅決的自愛的態度，來保持這永久的同情。

二、國際形勢雖然好轉，然拆穿來講，大都還是爲着自己的利益，所以英美兩國，至今不肯放棄調解的念頭，我們必須用堅決的態度來回答他們，使他們知道所謂互相讓步的不可能，而進一步地採取可能的集體制裁的辦法。

三、以堅決的態度昭示蘇聯，促進兩國間更密切更實際的合作。

四、使漢奸失去口頭上乃至實際上的憑藉。

五、使人民能夠洞見政府堅決的態度，減少敵人造謠的機會。

六、改變所有觀望主義者的猶豫態度，讓每一個人都能更堅定地爲救亡而努力。

當然，絕交以後，有些問題，是頗費斟酌的，然而我們要從大處着想，要努力把不利之點克服過來。現在九國公約會議卽將開幕了，而敵人也正在作速決的迷夢，以應付國際惡劣的環境，以遂其局部吞滅的野心。這計劃是毒辣的。我們應該下最大的決心——對日絕交，甚而至於宣戰，來粉碎敵人惡毒的計劃。

我也爲傷兵請命

前幾天，各報上登着一個消息，說是宋美齡女士曾向英國呼籲，希望以醫藥上的供給，援助中國受傷的士兵；同日的某報上，又有一篇中暇先生的題做爲傷兵請命的文章，他引了幾段外國記

者所作的戰地通訊，說明前線救護設備的不夠，一面感慨地說：『我們環顧左右，還有許多錢財，許多人力，許多材料閑着，我們並沒有盡我們的力量，我們是不爲，不是不能。』

這是確確實實的情形。

但是，爲什麼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到了中華民族以白刃和敵人相見的時候，前線的將士慷慨浴血，而在後方，卻偏有許多材料，許多人力，許多錢財閑着呢？歸根結底，我們不能不怪平時太沒有準備，臨時又太不懂組織。我們不但沒有想到現代的戰爭不能專靠軍事，便是屬於軍事範圍以內的一切，也不曾精細地算到。例如關於救護傷兵這一點，就只是幾個慈善團體撐着場面，顯出了老大的漏洞，使忠勇的健兒不能得到良好的診治，這在整個抗戰的力量上，將是一個怎樣重大的損失呵。

但在這裏，首先必須指出，京滬線上的救護工作，比起津浦，平綏，平漢各線來，還是差強人意的，而且我們也的確看到了許多救護員的勇敢的犧牲。唯一的缺點，是在於組織的不完善。譬如吧，一個戰士受了傷，先是在戰壕裏輾轉，幾小時以後，幸而被救上車子，顛簸了幾里路，到得後方，又被從車子上抬下來，躺在樹蔭下，再等第二輛車子來把他從前線的後方載到安全地帶的醫院裏去，而

那些醫院呢，照例總是自稱額滿，拒絕接收的，不過倘使護送的救護員能夠用比較強硬的口氣，說幾句總會有命，必須收容等等的話，則又似乎每一個醫院都有餘額，都可以接收了。這眞是一齣殘酷的把戲。

再舉一個實例，某會所辦的救護隊，每一分隊，各有兩個醫生當着領隊，但是除了少數忠實的醫生，時時和救護員同上前線，予傷兵以急救外，多數的醫生，壓根兒就不曾上過前線，他們把總會所發給的急救箱束之高閣，每天躲在安全地帶的醫院裏，看看報，發發議論，幾曾把傷兵們長途顚簸的痛苦放在心上。有幾個救護員看不過，要求他們轉請總會，向民衆勸募幾個褥子，放在車上——因爲那些都是運貨的卡車，——說了幾次，而所得的回答，始終是一副怕麻煩的神氣！

這固然是人的問題，然而卻更其是組織的問題。我在這裏暴露了這些事實，卻隱去了當事人的姓名，因爲我並不想攻擊個人，只希望從事救護工作的人能夠切實地反省，坦白地承認，力求組織的完善，使我們英勇的傷兵能夠得到良好的診治。不錯，在救護工作上，我們需要多量的醫藥的供給，然而卻更其需要一個完美的組織！

紀念魯迅先生

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裏，魯迅先生替幾篇用日文寫的，而又由自己親手繙譯過來的文章作着說明，其中的一條說：

『「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託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裏，說明着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我說過，這是被壓迫者的『眞實的心，』也是眞正的中國的聲音。現在，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展開了，魯迅先生的遺言，終於成了四萬五千萬人一致的信念，覺悟到彼此畢竟不能成爲朋友，自然更不甘憑空淪作奴隸，因爲我們並沒有『對於橫逆之來的忍從。』僅存的路，就只有變做敵人這一條。

我們要抵禦，要反抗，要鬬爭！

魯迅先生的一生，盡瘁於民族革命的運動，力求中國的自由與解放。他是反帝的，因此也是反日的。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以他主張把『一切鬬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鬬爭這總流裏去。』他培泥澆水，種下了這苗壯的抗日的苗秧，卻等不到它開花結子，就撒手歸去了。

這是中國的大衆所引爲遺憾的。

但幸而在這週年祭的今日，全民族的鬬爭已經開始，統治階級和民衆的自覺運動採取了一致的步調，結成堅固的力量，予敵人以猛力的打擊了。我們相信，抗戰的開始，也就是勝利的開始，所待的就只是我們堅決的，持久的奮鬬。

『死亡的對於戰士，是空漠，但對於活着的同伴，卻是一種激勵。』這是我去年寫在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裏的一句話。我以爲紀念的意義也在此。那末，對於先生的紀念，除了繼承着先生的遺志，努力求民族的解放外，將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文藝界的團結

在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座談會裏，陳望道先生建議組織一個文藝界救亡協會，這意見立刻爲大家所接受，得着了補充和闡揚。同時，爲了表示繼續魯迅的精神起見，就定十月十九日爲成立的日子，從那一天起，上海的文藝界，眞的團結起來了。

我希望而且相信：這將是眞正的團結。

自從抗戰展開以後，上海一隅，文藝家的表現是非常微弱的，雖然也有人在辦壁報，印行小册子，然而這樣切實地幹着的人並不多，因此那工作就不能普遍和深刻，得不到系統的成績，使人們落得了一個『紙上談兵』的結論；至於另一些文藝家，因爲不肯切實地幹的緣故，在這大時代的前面，倒反而顯得閒散，充分地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這一回的結論，當然又是所謂『文人無用』了。

然而這其實是並不盡然的。

粗粗看來，在救亡運動上，文藝家的工作較爲空洞，當然比不上能夠肩鎗的兵士，也似乎比不上能夠出錢的商人，能夠出力的工人，以及努力生產的農人。但是，文藝也自有其特殊的意義。文藝工作者可以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它的力量。例如宣傳、鼓勵、指導、慰藉等等的工作，是切實的，而

且也是需要的。我們所缺少的是一個能夠領導和分配的組織。

文藝的力量，恐怕也眞像蒸汽一樣，看過去，輕輕渺渺，空空洞洞，隨着空氣逐漸消滅，誰能懂得它的力量呢？但是，如果把這些蒸氣集中在一個汽罐裏，它將發揮出巨大無比的力量，推動着「引擎。」時代的巨輪就是這樣地進展着的。

但什麼是文藝的汽罐呢？我以爲就是健全的組織。希望文藝界救亡協會能夠好好地盡它的汽罐的責任。

九國公約會議

九國公約的本身，是在列強在華機會均等的原則下訂立的，換一句話說，牠的目的是共管，是精神上的瓜分。對於中國，決不是一個可以安慰的條約。

不過這一次在比京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僅就目前的環境而論，卻可以說不壞。

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以積極的行動，暴露了久已蘊蓄的對華獨佔的野心，悍然擺去了

東三省，繼而又奪取熱河，進逼察綏，以至整個的華北，使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受到極大的威脅，當然更談不到什麼機會均等了。所以，我們的歡迎這一個會議，不僅因爲牠在道義上規定了『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和行政的完整』而且，在實際上，也要利用國際間錯綜的關係，使他們爲保持自身的利益起見，共同予日本以制裁。

但自然，要使道義上的是非和實際上的利害打成一片，必待我們多方面的努力。我們知道，英國的所以把中日問題由國聯移至九國公約會議，在表面上，雖然是要拉攏美國，使其和自己一致行動，但實際上卻正是在推諉，是一貫的狡猾而又無用的紳士外交的骨幹。但是，美國是不會上當的，他也決不肯去做日本眼裏的罪魁，於是乎彼此軟化，這就是調解口號的由來。現在，日本明白地拒絕參加了，然而調解的工作是仍舊進行的，我們必須堅決地拒絕這一點。

蘇聯的參加，誠然足以使我們興奮，因爲對於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建議上，一定可以有極大的幫助。然而日本方面，也將策動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使他們分擔着替侵略者辯護的義務。縱使這會議不至於流成西亂，不干涉會議那樣的僵局，然而我們實有嚴密地督促牠，使牠維持條約的尊嚴的必要。

不過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九國公約雖然沒有明確地規定制裁，然而卻表示着一種和平的願望。我們倘能特以堅決的態度，動以靈活的手段，即使在會議本身上沒有多大成功，卻可以使牠成爲達到制裁的一種助力。使牠的召集成爲達到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一種過程，對此以外，我們似乎也不該再有什麼奢望了。

爭取自由

魯迅先生把向自由談投稿的文章結集，而名之曰僞自由書，那時候，他以爲自由不過是一句反話，事實上決沒有可以任意馳騁的場所，這是確實的。然而倘有骨氣，骨頭畢竟不至於被抽完，這僞自由書正是一個證據。在行路者的前面就有路，則在鬬士的手裏，無論如何，也總可以把握得到自由的。

不過，這把握的程度，略有等差而已。

以清朝的箝壓之嚴，然而到了末年，幾經戰敗，統治階級的魔手也就搖顫起來，首先是掌心裏

的騷動『。集衆千三百餘人草，疏萬八千餘字』，伏闕上言讀書人也來議論朝政了於是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而且還要奏行憲法，召開國會，正在得意忘形，躊躇滿志，自以爲有了自由的時候，不料魔手陡的揑了攏來，造成了政變的一幕。三月新官，或死或逃，但一面早已有人從指縫裏爬上手背，號召排滿，倡言革命，要尋取更大的自由了。

來執行這一個願望的，是同盟會——也就是後來的革命黨以至國民黨，鼓吹和宣傳的方法多得很，反映在文人的言論裏的，那時候最激昂的是南社，『士不帝秦，人思復楚，』他們在大罵建虜之餘，『磨古盾以草檄，聞清笳而拔營，』說是要『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了，這種悲歌當哭的調子，不但提高了自己的情緒，而且也確乎感動了另一些人。但等排滿成功，民國肇造，過了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以後，他們打過了英雄結，仍舊穿上長衫，摸摸肚皮，揑揑下巴，閒來就塡豔詞，捧戲子，彷彿天地間眞的已經十分自由了。

然而他們是活在自由的邊框上，大多數的人民仍舊在壓迫下。

我於此看出了歷年來的紀念的悲哀。

但是，一面又有另一羣人，認眞地起來，承繼了這爭取眞正的自由的事業。

由老新黨到南社，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七七抗戰，凡鬬士，總在加緊着對自由的把握，那要求也日益進步，並且顯得十分堅強了：由虛君共和而排滿，而打倒軍閥，驅除土豪劣紳，而抵抗侵略，力求生存，而……。自由是一天一天地在接近了。

撫一撫心，現在正是應當格外着力的時候，倍因以爲不自由的地方才是他的祖國，我們不也應該從輕蔑裏翻過身來麼？沒有路，就鋪一條血路；不自由，就拋一個頭顱。個人的生命也許會碰到幻滅，然而自由將永生在我們的手裏！

感舊

沒有在涸轍裏度過日子的魚，大概是不會知道水的需要的吧，我生下來已是民國，念餘年來，戰亂相乘，眞也看不出牠的一點好處來。及等接交先輩，翻檢史册，這才知道還有辮子之類的事情，自己摸摸頭皮，倒也頗感幸福，及等讀了辛亥以及辛亥以前的許多就義詞和口供：『一我可殺，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吾言盡矣，請速行刑。』這才吃了一驚，分明地感到自己是活在先烈的血泊中。

痛苦咬住我的心，竟也動了『而起』的念頭了。

然而民國畢竟已經成立，豚尾既斷，可容後生小子大罵建虜的機會，也就歸於幻滅。雖然袁項城的僭號洪憲，使我還有做了八十幾天小奴才的『幸運』，但那時候我卻只知道吃奶睡覺，善惡兩面，各無所知，嗚呼噫嘻，眞是『帝力於我何有哉』了。

幸而我也終於長大起來，明白了自己是活在先烈的血泊中，要掙扎，要繼之『而起』了。不料事實又教壞了我，使我知道除了那些『請速行刑』以自己的血來灌溉革命的嫩芽的烈士以外，一面也還有倖存下來的人物，排滿既經成功，渡過了二十七年前的今日，老老小小，就一齊成了中華民國的主人翁，聽說有些志士們還打好英雄結，束上武士裝；方巾士服，活像戲台上的文武角色，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行走，威風得了不得。袁世凱的稱帝，給了他們一次打擊，張勳的復辟，又給了他們一次打擊，軍閥兇燄，狗官貪心，這打擊似乎數不完。既曰倖存，於是乎就只好別尋生路，或則遁入深山，或則爬上青雲，至於繼續來寫就義詞的，卻是些未通世故，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後生小子了。

雖然年歲並沒有多大關係，然而歷史畢竟是殘酷的東西。我不知道那些已死的烈士們如果活到現在，將是怎樣的感想。倘以眼前的事實爲例，則廿七年前慷慨一擲的頭顱，大可轉成昏庸，而

成爲沒落的一羣的典型的。

然而我決不至於胡塗到用這一桿尺來衡量一切戰士，也不至於胡塗到以此來否定雙十節的歷史意義，牠確是前驅的大纛，暗夜的星火，夢境的響鐘，給後來者以戰鬪的勇氣。我們的紀念牠，固然是因爲牠是孕育現在的廿七年前的偉舉，同時也因爲牠還是製造將來的今日的鬪爭的伙伴的緣故。

禪理

和尚大概是光頭的，然而也有僧帽，我一向只知道牠是一種灰黑色的元寶形的東西，但現在居然也給塗上『紅』色了，眞是稀奇得很。

前些日子，路透社的北平電訊告訴我們：良鄉『新民會』的行政部，決議派四個和尚，到日本去受佛學訓練，那原因是爲了該會的日本顧問，說中國佛教日漸墮落，趨向於共產主義了，派和尚到日本去，受一點並不左傾的佛學。這四個和尚業已動身，先到北平，從事初步訓練，不久就要東

渡了。

佛教的發源地是在印度。三藏取經，必曰西天；和尚涅般，一縷幽魂，也希望能夠投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到現在，大概是因爲『靈氣所鍾』的緣故吧，這極樂世界卻又由西而東，從西方淨土，搬到蓬萊三島了。但我恐怕脫去『紅帽』穿上下馱，以屐聲來代替木魚，也仍舊無補於禪宗的。

至多不過是『王道』的工具而已。

實在說來，不但光頭上沒有『紅帽子』，就是『王道』和佛法，雖然古稱同源，其實也是前人的批淡。晉以來的唸珠，佛像，小品法華經，也正如近代的黑眼鏡，紅領帶，色情文藝一樣，是一種時行的東西，門客幫閑，居士清玩，一概都少不了牠們。這不但顯出了那時候的士風，一面也表示着政治的動向：消極。

然而現在的中國卻不需要這樣的消極。僧侶救護，和尚受訓，事實也的確明顯得很。這就是趨向於共產主義，給戴了『紅帽子』的來由。但其實倒是和尚的本色。

佛經分大小二乘，大乘廣頤，小乘淺易，據說是因人而施的。愚民只知道唸經拜懺，那自然是小乘；一到士大夫，可就要應用玄理，作色空觀，到了末世，也自然會有佛法救國，和平祈禱之類的盛舉。

但這些與我都很隔膜，我只知道般若波羅蜜經裏的所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是禪宗的至理，我們現在的要求只有一半，那就是『不滅』和『不垢。』倘能以出世的精神入世，則僧侶救護，和尚受訓，原是大乘的敷衍，足以代表慈航渡世的精神的。

這樣說來，在中國，眼前如何會有並不左傾的佛學呢？屠殺是這樣地殘酷。如果說佛學裏少不了『不生』『不淨』義，則首先應該明白，釋迦牟尼的立場，是必須站在弱小者的一面，決不能爲侵略者搖旗的。

佛座蓮花，是潔淨的象徵，然則生在卑汚殘虐的時代裏，佛也應該是鬬爭的化身了。

從雜文得到遺教

在閑談之間，有一位朋友說：要寫雜文，必須先有嚴肅的生活。我以爲這很對。攻打追擊，手法固須干淨，脚跟尤其要立定，因爲首先得提防到對手的回拳。中國的向例，倘使立在河中，就不准批評水的清濁，必需爬到岸上，再發議論，否則就得捉住頭頸，灌下混湯——這一着很便利，但要原在一

起，所以通行的方法，是先把那批評者拉到水裏去。

有誰把脚跟種在泥土裏的麼？沒有。請先淹個混水浴。

然而也有以汗血來滌蕩身心，終於不沾泥污的人物，我以爲魯迅先生就是。他的韌戰，搏鬬，反虛僞的精神，完全是以潔白的言行來織成的。綜先生之一生，無不可以告人之事，無不可以示人之物，分明的是非，熱烈的好惡，喜笑怒罵，都極磊落。然而那些由舊社會現形的惡魔，卻無時不想把他拉入混水，衍太太之流用流言來把他塑成爲一個偷賣飾物的敗子，異國的同學用書面來把他封成爲一個私漏題目的劣生，在大官小吏的眼裏他是叛徒，在『正人君子』的嘴裏他是墮落文人，十五年前的盧布謠，六七年來的投降說，到如今消滅的消滅，收回的收回，然而他前進，兀立，幾曾動得毫毛！『踏了這些鐵蒺藜』『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這種精神表現在他的雜文裏的，是堅決，潑刺，逋脫，從容。形象的具體化，設境的富於詩意，舉例的切合現實，以及造句的愼重，用字的認眞等等，這些多多少少地決定了他的文章的文藝性，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出政治的立場；同時，也說明了這種文體，終於要因爲魯迅先生而走進了文苑的大門。

『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眞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鬬將！』

先生自己就是先驅的鬬將，以『血和肉，』爲後來者掃除荊棘，開闢路途，但因爲『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所以他採用了雜文的形式，這是匕首，是投槍，『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應用在愛憎之際，刻劃於是非之場，這是一塊分水石，是善和惡的最可靠的界線。

統治階級的憎惡雜文，雖說『古已有之，』然而所以『於今爲烈，』卻是開始於讀了先生的文章以後。『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這是先生的對於自己雜文的批評。他拿着的雖然只是匕首，然而卻能夠善使這匕首，他用蕩寇志裏林冲凌遲高衙內的方法，來碎割舊社會，割一塊，就說明這一塊所以被割去的理由，痛快淋漓。所以，我們在先生的雜文裏，能夠看到一顆憤怒的心，也能夠看到一副從容的態度；能夠看到尖利的批判，也能夠看到溫和的詩意。有深惡，才能有熱愛，這是不易的至理。

雖然在僞善者的前面被罵爲『迫害狂，』然而我同情於他自己的話：『我還欠刻毒！』

先生曾比自己的雜文集爲深夜街頭的地攤，雖然另星，然而對於我們，卻是切實而又有用的，我們本來不是富家的庶務，所以仍舊能夠在地攤上得到有益的教訓。

現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奔騰着無數新生的獅虎鷹隼，這是由被稱爲『雜感家』的魯迅先牛的血和乳來餵養大的，眞是偉美的壯觀。雖然音容已杳，然而遺教尙存，我要借用先生的一句話來作結束：『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時代的悲哀』

聽說香港是尊孔的地方，設社立會，向極熱鬧，不知道現在怎樣了，這一回的中秋，上海也有洋人在燒香斗，自然，他們原只是玩玩而已，我於此卻懂得了不少世故，張宗昌很尊孔，但他未必唸過四書，近年以來，陳濟棠將軍和何鍵將軍都主張讀經，自然，他們也未必通得一經的，如果說這無妨於對古道的嚮往，則廣東和湖南的居民，一定是非常明白的吧。

有什麼比身受的痛苦更悲切的呢？

不幸到了現在，這命運又落在湘粵以外的人民的頭上。侵略者攻陷城市，殘殺人民，而首先用以揩乾他們的血手的，正是這經書。不錯，這些原是古聖先賢的遺教，到了現在，卻成了後生小子的鴆藥了，這裏，歷史暗暗地埋下了時代的悲哀。

然而又豈僅時代的悲哀而已，孔子的畫像被搬上號稱『近代』的雜誌，經書列入教科書，讚美歌重見於報端，『王道』頒行於天下，這也是槍刺下的孽積。對於逝者，是無可奈何的寂寞，但活着的人，卻不但有感情，也應該有理智，可悲的是那些自居於聖人之徒的犬儒，卻迎着這『悲哀』興高采烈地跳跟起來了：『黨軍禍國』呀，『共匪惑人』呀，『弔民伐罪』呀，於是設會維持，作勢凌人，儼然自比於『識時務』的『俊傑』。但一看到南北兩僞組織裏的古道重於新學，老人多過青年，則可見時代終究在進步，而所謂悲哀，也還是釘着沒落的一面的。

然而他們卻自認這爲『識事務』。

有人以爲人生不過是舞台上一幕幕有連續性的戲劇，那末，在戲劇裏當然也可以找到各色各樣的人生的，而且我也確乎看見了這樣的例子——

『……每一個人

都在自己裏面保存着過去的傳染病，

而用一些言論，充滿着毒汁的，

充滿着過去形式的美麗的，到處散佈着那種病症。」

這是馬里安娜·雅洪託娃的一篇戲劇『沃德·泰祿爾』裏主角所說的話，是當年英國封建諸侯的實情，但也照出了中國的封建餘孽的眞形。死屍今已還魂，『王道』早成扯淡，槍刺扳不轉時代，悲哀，不過是沒落的先聲而已。

剽竊和模仿

剽竊了人家的作品，自詡爲不世的巨著的事，現在是不大聽見了。但是，上海畢竟還是納汚的窠洞，旗下屈膝，刀口幫閑，以津貼來偸生的報紙，有時候，也會有致力於抗戰的鬬士的文章。剽竊，劫奪，惡毒的陷害，這是需要分辨和指明的吧。然而我們的批評家的筆尖，卻首先對準了模仿、抗戰八股等等的問題。

然而這還不壞，因爲畢竟是值得討論的。

由模仿而因襲的例子，眞也多得很，世界史就是一部紀錄。亞歷山大因襲了斐列浦；奧古斯丁因襲了聖保羅；紀奧妥因襲了薛馬蒲；叔本華因襲了康德；大戲劇家希勒，因襲了莎士比亞；而沙士比亞的愷撒傳，卻又是逐字逐句地鈔錄蒲魯塔(Plutarch)的，倘要追究根源，這就使人無從說起。

但在這裏，我以爲應該唾棄的是剽竊。對於模仿，卻不妨予以屈諒，因爲這畢竟還是基於學習的。孩子習字，首先由描紅格入手，一到了相當時期，他自然也會跳出範臼，自成工架，決不至於在額角上貼着描紅格，以模仿終身的。較遠的如柏拉圖之於蘇格拉底，較近的如梁啓超之於康有爲，他們的超越，也還是經過了模仿的路，並非憑空跳上去。至於眼前的上海的陣線，則更分明：剽竊的是那樣的報紙，模仿的是這樣的文章。八股雖然有礙於文學的發展，但爲抗戰着想，暫時恐怕也還有存在的理由的吧。

波斯克爾(Poscal)在 Pensios 裏說：

『有些著名作家常常說他的著作是「我的書，我的備忘錄，我的歷史。」我又想起許多市民愛說這是「我的房子。」這未免太驕傲了。最好是說我們的書，我們的備忘錄，我們的歷

史。因爲應該知道，這些著作裏的好處，得於他人者多，得於我們自己者少。』

嚴格地說來，一切都是模仿，而且是經波斯克爾承認的了。倘以爲不是，則現在也並無刻意傲尤的東西。鄉下人初到上海，看看外國人的面孔，無論老的小的，覺得個個差不多，彷彿都是父子兄弟一樣，但據熟悉的人告訴我說：這是因爲他不曾多看，不曾熟視，還不懂得外國人的臉孔的緣故。

夜讀一章

現在似乎不大有人提起愛羅先珂了，的確，這位盲詩人的輕烟似的哀愁，恐怕是未必合於現代青年的胃口的。但是，我自己，因爲早年愛讀蕭颯的文章，到現在舊癖未除，每到中夜，感起蒼涼，就很容易記起前人走過的路由來。這一回的想到愛羅先珂，是因爲他的一個這樣的童話——

黃昏時候，兩只初生的蝴蝶，看見太陽沉下海去，覺得世界卽將黑暗，於是挺身而出，一隻向東，一隻向西，要去分頭努力，使青天上永掛着白日，宇宙間長留着熱氣，但首先就來了『有經驗』的蟋蟀的嘲笑，『池塘國民』的青蛙的恐嚇。然而沒有效，蝴蝶們飛去了。這使躲在衙門裏的貓頭鷹

吃了驚，連忙叫醒了正在瞌睡的蝙蝠，趕去追捉，不，也許是只散放一點謠言吧。這些東西的眼睛，是永遠見不得光明的。

但是，在愛羅先珂的筆底，終於出現了一隻小小的蝴蝶的死屍，雖然意在刻劃人們的議論，卻也成了他的虛無的註解。不錯，以兩只初生的蝴蝶，是決不能挽回業已暗下去的天空的，然而明天的朝暾還要上來，光明確有驅除黑暗的本能，有誰相信未來的世界，將是貓頭鷹和蝙蝠們的天下麼？倘不是胡塗蟲，我以爲是不會有這樣的懸揣的。

尤其是在眼前的中國，更沒有。

所以，對於在鬬爭中的我們，即使是讀了愛羅先珂那樣的文章，也難起虛無的感應。血使我們充實起來了。我們知道爭取光明的決不祇兩只小小的蝴蝶，凡鬬士，雖有必死之心，卻並無必死的豫感。在上面那個童話裏，我們寄與的同情是：對蛙和蟋蟀的鄙夷，對貓頭鷹和蝙蝠的譏刺，對扯淡、安命論、虛偽文明的駁詰，對一切喝鬬士的血以自肥的人類的嫉惡。然而，我們絕不相信那個由傷感主義者所安排下的虛無的未來。

這自然也還是由於事實的教訓，我們且看蝴蝶的話吧——

『我是無論如何，總不能眼看着太陽沉下去。』金色的蝴蝶說。

『大約未必有益吧；總之，先飛到那邊去，竭力的做一番看。』於是金色的蝴蝶對那銀色的說：『成不成雖然料不定，但總之，我們兩個努力一試吧。……』

我們祇有堅定的信念，卻沒有『未必有益』的想頭，這就是勝利和失敗的差分。但是，倘就『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一點看來，愛羅先珂的精神，倒也未必虛無的。

急就艸

倘使擊着了堅強的石塊，一定有迸裂的火花，倘使鑽着了結實的木頭，一定有奔騰的熱氣；只有散沙和朽木，這才隨手零落，消滅，連聲音都沒有。

但是，我們不能容忍這無聲的恥辱。

生活當然是要緊的事，能夠活命，這才談得到其他。但其實也並不這樣簡單。一面還得估計意

義，屬望來茲，不能迷戀於眼前的滿足。猪的生活應該是安樂的吧，然而牠首先得提防壯起來。

所以，說生活第一，是不錯的，鬬爭的目標就在於生存。但必須把國家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看成一條；必須把子孫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看成一條；這才是志士的誓詞。否則，說着這話的人，一定就是奴隸的候補者。

徘徊於屈辱和鬬爭之間，而不能自決，這是凡夫的通病，醫治這通病的最好的藥，是有組織的集體的行動。一流於個人的潔身自好，已經是末路，雖然可愛，卻並不可敬了。

不幸現在竟還有這樣的現象：

一個人因爲比較活動，有了一點小名氣，於是就不管他『名』在那一樣，大家來請他寫文章，題封面，講戰略，辦教育，理帳務，買用具，介紹醫生，召集會議。有一件幹得不起勁，就說他瞧不起實際工作。倘使這人是比較老實的，那就非被拖死不可；狡猾一點的呢，終於成了華威先生型的忙的扯淡者。

「主席，啊！我還有事，要早些退席。請先讓我說幾句話。我忙得很，今天午後四點鐘工人聯誼會開會，六點鐘局長夫人請客，七點鐘難民救濟會彩排，還有……唉！我忙得很，忙得很……」

於是，華威先生出現了。

然而短處還不僅這一點。會議的時候，本來是有些討論的，但是大家的注意只集中在說話上，乙的話只想超過甲，丙的話又只想超過乙，雖然後發言的人總比先發言的人說得漂亮，動聽，然而越說越高，往往也越不容易落到實際的問題上。

有誰對虛懸着的決議案下了批評，就連忙去打聽這批評者的家世，如果他是弄筆頭的，於是：

「老兄，做事體原沒有寫文章容易呀！」

但我仍舊在這裏寫文章，並且大聲地喊：把工作散佈開去，趕快做！

一種運動的領導者總比羣衆來得更爲覺醒，更爲進步，這是一定的。然而領導者並不需要把事事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卻應該和羣衆打成一片。因爲那任務是在領導着羣衆去做，並不是代替羣衆做。

從『抓周』說起

很久沒有看到好的漫畫了，最近卻看到了一張，這就是周彼得先生的『抓周』。閭里間確還有着這樣的習俗：孩子周歲，親族就羅列了一些百工士子的用具，讓他自己去抓一種，以測探他將來的志向的所在。彼得先生應用這題材，來紀念淪陷了一年的上海，使一個帶着軍帽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戰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國孩子呢，卻爬着去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劍，是的，一把復仇的短劍。牠將插在侵略者的心上。

但我以爲這張畫的好處，除了取材恰當，技巧純熟之外，主要的原因是這不僅是作者的設想，而是留存於每一個人腦裏的鐵一般的事實，一年來的上海，是從血腥裏渡過去的。牠在去年今日淪陷，也就在去年今日，新生在眞正的中國人的心裏。十一月十二日！這對於我們是一條鞭痕，一顆烙印，一枝響箭，一把血迹斑爛的匕旨。

但牠不能置我們於死地。上海，從刀叢，從箭林，從鞭影火光裏長大了起來。

不通和不懂

在過去，上海是代表着卑汚的窠臼，沒落的淵藪的。這裏存在着油頭滑腦的公子，花言巧語的鴇母，拆梢打棚的流氓，勒索逼供的包探，豪門淸客，洋行買辦，他們的『盛業』掩沒了鬬爭，玷辱了上海。砲火雖然沒有使洋場變成莽原，然而卻在人海裏築了一條長堤，劃分了善惡的兩面，那一面，飄飄然過橋去作『新貴』；這一面，立定脚跟，堅決地拿起復仇的刀子來。雖然中間還夾着一些吃飯睡覺，一無所謂的人物，然而他們的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意識，從去年今日起，已經逐漸分明；上海的作爲一塊中國土地的概念，從去年今日起，也愈益顯著了。

上海，永遠是眞正中國人的上海！

『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國！』不錯，我們應該記住這句話。我們的嬰孩早已生長，今天是他『抓周』的日子，但是，無疑地，他是從娘胎裏就帶了復仇的刀子來的，拿起牠，一點也不須猶豫。

我痛恨於上海的遭劫，但我也慶幸牠從血汚裏再生，上海，永遠是眞正中國人的上海。

作爲現行的雜文的缺點，其一，據說是難懂。

攻擊雜文的藉口，也正和保守文言的策略一樣，是逐漸改變，卻又愈說愈糟，愈到後來，也愈見其含糊和軟弱。在最初，當歐化紳士們在文壇上大出風頭的時候，首先是不滿意於雜文的戰鬬的內容：攻訐私人，不足以進藝苑的大門；一到了徒托空言的青年大作家的手裏，則又不滿意於牠的短小的形式：雜另狗碎，妨礙了偉大作品的產生；這一回，卻挨到非文藝的文藝家來出場，自然，留給他的路已經很窄，『奇譎！奇譎！』他只好自稱看不懂，一面又將這責任，推到作者的身上去了。

然而，通過了事實的眞實性，通過了被壓迫者同有的環境和正義感，現行的雜文，也仍舊能爲過去的雜文的讀者所看得懂，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所有的雜文，在抗戰期間，忽然都通了起來，大家都能懂得了呢？我以爲這也未必的。事實上，文壇上也大有使人看不懂的雜文在。

第一、我以爲是由於對事實的歪曲。譬如說，主張持久抗戰，以焦土來困敵人，這樣的文章，我們是以爲很通，而且也大家都能懂得的；一到了曲解焦土，非議抗戰，無論那文章的字面寫得怎樣流利，但留在讀者的腦海裏的，卻還是不很清楚。至於顚倒朝代，混淆是非，硬拉宋明大家，來做清朝人

的附庸，其歪曲歷史的程度，正和歪曲現實一樣，在文章的本身是不通，對於讀者，自然也只有不懂了。

第二、我以爲是由於舉旁證的荒誕。譬如說，要根究『毫不痛快，吞吞吐吐，很沉鬱的表現於紙上』的文章的產生原因，本來也大有根據可尋的，但有人卻用了『衣服的沉鬱』的題目，來說明他的形成，那結論道：『女子既有衣服的形式可以表現一切，那末男子所有沉鬱的心境，自然只能不通而又不通，若隱若現的使之表現於文章上了。』

『不通而又不通』的結果，自然也只有不懂。

如果是人間世的活生生的事實，則對着言語不通的大衆，即使裝一裝手勢，有時也還能懂得的。祇有用脚底皮思想，手底心走路的理論，這才是不通和不懂的例子。

不幸而現在竟還有這樣的類型。

懷曼殊上人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前幾天，在世紀風上讀到韋佩先生譯出的『大自然的靜與動』和『滑鐵盧大戰的前夜，』不禁記起上面的這一首詩來，這是曼殊上人的題拜輪集詩。所謂拜輪，其實就是擺崙的古譯。時序原來也眞的會留下痕迹，短短的幾年間，不但譯名有了不同，就是曼殊的名字，在現代青年之間，也在一點一點隱沒下去，遠沒有他寫『斷鴻零雁記』時的能夠哄動了。

時代進步着，自然，這是應該的。

我想：現在如果再有人想起他，也決不會是因爲他曾經寫過『纏綿悲惻』的『斷鴻零雁記』了，曼殊以絕頂聰敏的詩才，純粹日本的血統，跟着他的再嫁的母親，流徙到中國來，既受歧視，復遭磨難，遂使『詩人去國之愛，』一發而不可收，這身世，確也十分悲涼。但他畢竟愛中國，他的引擺崙爲同調，就正是一個例子。

然而，仔細說來，這兩個人的個性，是並不相近的，曼殊哀婉，彷彿還有點繁瑣；擺崙卻頗爲爽豁，豪宕，一怒而去國，再怒而獻身於希臘獨立運動，鞠躬盡瘁，以至於死，和曼殊的侘傺去世不同。但自然，主要的還是因爲時代各別，那時候的中國，和獨立戰爭時代的希臘比起來，實在也相去太遠了。

飄零之感，對於一個在異國爲僧的人，是無法自制的。

曼殊在廣州長壽寺落髮，正是中日戰爭的翌年，這時候，他因爲年輕，祇是作爲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着，也許還不十分痛苦。其後經歷了義和團之役，經歷了日俄戰爭，感時的熱情，就時時流露出來。民間的懼洋心理和朝廷的『寧贈外寇，不給家奴』的學說，很使他痛心，他大罵那些倚仗外力的洋奴；他也像擺崙哀希臘一樣地哀中國，努力介紹擺崙的詩，宣揚擺崙的『謀人家國，功成不居』的精神，他感覺到自己是日本人，更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應該爲中國盡瘁的日本人。然而，排滿一經成功，許多人覺得漢儀復見，鬆一口氣，終於又沉沉的睡了過去，他於是也只好賚志以歿了。

這眞是無可奈何的悲哀。

希臘獨立運動的精神，現在已重見於中國，解放的旗幟，插遍在廣大的土地上，倘使曼殊生在今日，也許眞的會像擺崙之於希臘一樣，和鹿地亘先生們一同努力於中國的抗戰的吧，他眞死得太早了。

闢『兩亡論』

經過一天辛苦的工作，躺在牀上，可以休息了，卻起了這樣無聊的想頭——

蘇曼殊說擺崙有『去國之憂』那末，努力於中國的民族解放，不惜和自己人抗戰的鹿地亘先生，是抱着怎樣的心情的呢？是憂傷，是痛苦，還是高興？如果日本敗了，他會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我的結論：是他是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的，首先因爲他並無背於作爲一個日本人的良心。他也正在爲日本努力着。

看近來日報的記載，日本軍閥的掌握，已經無力緊揑，卻在逐漸鬆懈了，因此，從指縫裏，時時漏出嘆息的聲音來，其中就有元老西園寺的慾慨：——

『津訊，月前僞蒙疆政府首領德王，李守信，于品卿，夏恭等四逆，東渡訪問日本軍政主腦人員，曾三次走謁西園寺，均被拒絕。後由首相近衞領見，西園寺一言不發，近衞數請，乃忿然曰：「講什麼中日親善，反正中國亡了，日本亡了，大家做亡國奴。」言畢，揮之使去。諸逆掃興而返。』

這雖然畫出了日本統治階級的悲哀，但西園寺的兩亡論，其實是不正確的。抵禦侵略，卽底於成，踏上了建國的大道，卻還潛藏着無限力量，中國是不亡的；便是日本，雖然難逃戰敗的命運，但又何曾會亡呢？她保有着最好的與鄰，和平的支持者：中國，蘇聯，美國。她將從戰敗裏覺醒，收斂野心，更

改國策，以新的姿態，和民主國家攜起手來，戰事的失敗挽救了她，此後的日子；於她將更爲光明。

這也正是鹿地亘先生所努力着的目標。

法西斯軍閥帶給日本人民大衆的是什麼呢？貧窮，痛苦，死亡。轉戰十八個月以來，奔走喘息，羅掘俱窮。賴以勉強維持其地位的，不過是欺騙和誇大，然而自有歷史以來，從沒有永遠愛聽着統治者的欺騙和誇大的民族。今日日本人民的利益，和他們的統治者，是衝突的。統一的中國決不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幸福之花，並不開在中國人民的血堆裏，而是苗生在軍閥的墓地上。

援助中國，打倒日本軍閥，這無背於一個眞正的日本人的良心。

我願意提醒所有的日本人：如果日本軍閥在這一次戰爭裏取得了勝利，那末，日本將有一個不堪設想的結果。反之，戰敗雖然將使那些兇燄萬丈的軍閥得到切腹的命運，但對於整個日本，這卻是一次清除運動。割去了一個毒瘤，也許有些痛苦吧，但請忍受這暫時的痛苦！

日本是不會亡國的，她還有前途。但首先須得推翻軍閥的統治，這正有待於賢明的日本人的努力，請看鹿地亘先生吧，他是多麼堅強呵！

後記

結集在這裏的廿一篇文章，是代表着兩個時期的。從和敵人一起倒下到九國公約會議，這九篇，都是一九三七年後期的作品，第一篇還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爲中流抗敵專號而寫的文章；爭取自由以後十二篇，卻是從去年十月開頭的。至於中間的一些，大抵都已收在邊鼓集裏了。

把在時間上有了距離的文章結集在一起，當然難免於不能調和，然而這裏面卻是一個梯型的路程，從呼號到擁護，從『一起倒下』到『兩』俱不『亡』，我分明地認清了自己的脚印，是的，這是我的脚印，但又何曾不是時代的脚印呢？

生存！在過去，我們有過強烈的要求，到現在卻成爲堅決的自信了。我欣喜於這現象的出現於我的筆下，因此，也高興於把牠送到諸君的眼前。

一九三九，一，廿五日記

柯

靈

作

原

书

空

白

页

招牌文化

聽說曾經有人編過一本書，是專講北平的招牌的。堂堂一巨册，有圖有字，內容十分充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對於各種招牌的式樣，意義，歷史等等，全都詳加考據銓釋。我頗想拜讀一下，卻苦於無從得到。大抵天下的好書，都容易變成「珍本」和「祕笈」的。

可恨閱歷又太少，沒有到過北平，不知道「文化城」裏的招牌文化，究竟發達到什麼地步，較之海派的招牌，又有怎樣的分別？

上海街頭的招牌，據我看來，倒也很有些洋洋大觀的了。

「名者實之賓也，」招牌的作用，大概也是表達內容的一種標幟罷？不過這恐怕還是很久以前的話，所以未免有點迂；目下是文明世界了，招牌的用途，已經推廣得很遠。招牌的形式，也早已由死而活，由拙樸而摩登，應時制宜，變化多端，進化到了極致。你跑到馬路上去，便祇看見搖頭擺尾，搔首弄姿的活招牌，紅紅綠綠的大旗子，閃閃爍爍的霓虹燈，直看到你眼花撩亂，脊梁上發出冷汗爲

止。

但你倘使看了招牌進去買東西，這就難免上大當。

招牌上寫的是「眞不二價」的「一言堂，」黑漆金字的；買東西卻還有折扣可打。明明打起招牌的國貨公司——據說出品都是「本廠自造」的，誰知連「三角」牌的戀愛小說都是販的東洋貨。連藥方也開不清楚的走坊郎中，上起匾來是「華陀再世，」「着手成春。」蚊蟲蒼蠅大本營的小麵店，總稱爲「衞生食品。」擺些破銅爛錫，自謂希世的骨董，古代文化的精英；東鈔西襲一大堆，補補綴綴，拿來應市，你說他像垃圾桶，不料他乃是「選購各省名產，統辦環球貨品，」大有來歷的。……

但這些祇能騙瘟生。門檻梢會精一點的人，就明白其中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花樣翻新，冒名頂替，外加插科打諢。杭州張小泉，蘇州陸稿荐，店號不會註册，自然大衆可用。倘若主顧不相信，不妨彼此掛上烏龜招牌一塊，對天鳴誓，務使眞理之神，坐在本店財神龕上。結果是弄得烏烟瘴氣，大家看不清究竟誰是誰非。

如今是市面不景氣，招牌的用處更大了。據說爲「優待主顧，」所以要「特別廉價。」僱幾個

口齒伶俐的腳色，當街站着，腳蹬口叫，做出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神情，直弄得汗流浹背，力竭聲嘶，天翻地覆。路人不明白以爲是有什麼人要打進店去，他正在誓死「防禦。」其實他是在吸引主客，待價而估。並且「犧牲」必須澈底，所以要聲言不怕「血腥氣，」把價目狂跌，跌到連血本，靈魂，人格，一起拍賣完結。

目下這種活動招牌，又打破了固定一處的成例。它們可以在汽車上裝成貨物的式樣，或者是一個大燈泡，或者是一瓶虎標萬金油，或者是一套「革命」中山裝，吹吹打打，招搖過市。——自然，這樣的風塵僕僕，也無非是爲的「犧牲血本。」……

讀報偶筆

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或是什麼事物的發明家，對於事業的研求祇有一種方法，這就是決定了信仰，看準了目標，埋頭研究室中，用了殉道者的精神，窮年累月，專心一致地幹去。也許是在十年廿年以後，研究成功了，於是將成績公開，貢獻於人類，爲世界文明的歷史增光。自然自己同時也「實

至名歸，」成功了名人。不然，甚或研究者鞠躬盡瘁，貢獻了他畢生的精力，悄悄地在窮愁交迫中死去；但他的事業，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因爲他已經爲人類的福利盡了最大的力了。

而中國的「家」們則不然，他們沒有這麼笨。研究是研究的，但祇要懂得點皮毛就夠了。——皮毛怎麼能稱家呢？其中有祕訣在焉：一曰海外鍍金，「出洋研究；」二曰遊歷半載，「學成歸國；」三曰拍電報，四曰刊玉照，在報章之上，發皇皇新聞。於是其名大噪，馬到成功，趕快鑽門覓徑，到南京做官去。

中國的報紙也奇怪。一個眞正埋頭苦幹的學者的消息，有價值的成功或發見，他們從來不會有記載；而唯有對於這些速成的「家，」則往往刊載肉麻當有趣的新聞以外，還刊出一張帶方頂帽子，滿臉等待拍照的表情的「某博士玉影。」

一看到這些「玉影，」我總是毛骨悚然，要想吃阿司匹靈。

「許案」漫感

上海有許多「名人」。「名人」照例是有別於常人的；手面闊，地位高，到處顯得不同凡俗。所以有許多常人，往往千方百計，把自己的芳名公之於衆，以便上儕「名人」之列。——例如許晚成先生，也就是竭力想爬上去的「準名人」之一。

爬的方法種種不同，最簡易的是用錢來買，但這又非有錢不行。窮人要成名，就祇好冒險，像買航空獎券一樣，想出種種新奇行動，去引起大家注意。可惜成效極少。

許晚成先生爬了許多年了。飯吃得飽飽的，今天發消息，明日投新聞，利用報紙，竭力把自己的名字推廣出去。而且還要編印叢書，出人生問題討論集，中國司法界黑幕大觀，該罵集……等等名作，公開徵文，請「海內文豪」踴躍投稿，共襄盛舉。而且還要在報上登出廣告，曰「許晚成工作報告，」名人題字之外，另加許氏近影一張，俾衆週識。——這方法，效力雖小，但幾年來孜孜不倦的結果，許先生的芳名確乎已有不少人知道了。卻不料功虧一簣，報告報出了毛病，其中關於「推事受賄，庭丁索錢」的一節，被法官認爲「謗毀名譽，」打起官司來了。

中國的法律，原是可以「從嚴辦理，」「從寬發落」的，杜重遠文字賈禍，法律上立刻增加了「誹謗友邦元首」的條文，請他郎當入獄；某捕頭（恕我記不清他的大名了，恐怕就是蔡洋其案

中的那位捕頭罷？）對無辜的嫌疑犯電刑逼供，傷及生命，審詢起來，屢次抗傳不到，卻也奈何他不得。但這一回許晚成是辱及法官，情形自然大異。開起庭來，推事高高坐在上面，疾言厲色，加以審詢；原告呢，就是法官自己。於是不問結果，先行拘押：生了病請求交保，不准；請求移送指定的醫院養病，也不准。

自然，我是毫沒有替許晚成先生叫屈的意思的。但我們卻從這里得到了一個教訓，這就是：處今之世，「黑幕」雖確有可「觀，」「人生」也誠多「該罵，」卻千切不可得罪「友邦元首，」辱及法官；否則就要「從嚴辦理，」剝奪言論自由權，不准請求交保的。

從許晚成先生求名心切這一點說，我以為倒頗「情有可原。」但他雖不幸而罹縲絏之災，卻不足為他的「盛名之累，」反之，許案開審，報紙喧騰之時，便是他十載苦功，一旦告成之日。——因為這也是成名的一法。

悲哀自然也難免有一些的。但成名不易，其吃苦也活該！

看熱鬧

時維五月，歲次丁丑，上海跑馬廳舉行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因爲怕參加的人太多，預售座劵，以示限制，劵價分五元二元一元等數種。據報上說，全部座位五萬餘，事先早已售罄；沿跑馬廳的國際、新世界……等旅館房間，亦在二星期以前定售一空云。

什麼人這麼熱心呢？報紙上沒有說起。可是我們不妨預測一下：加冕的雖是英皇，典禮也遠在倫敦，但到跑馬廳參觀儀式的，定旅館瞭望儀式的，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們的黃帝子孫。

中國的蟻民，大抵都在殷殷望治，希望自己不再被「攘」和被「安」，太太平平的吃一口苦飯了。而中國的閑人，卻只愁沒有熱鬧可看。

人家出喪，他們看；人家迎親，他們看，呆呆地在街上站上個把鐘頭，一邊看，一邊還要加以讚嘆，加以批評。馬路上巡捕打黃包車夫，看熱鬧的照例圍着一大羣，失魂落魄似地，彷彿賞鑑什麼藝術品，被打的一狼狽，他們就覺得有趣，在旁邊嘻嘻的笑。

汽車撞壞了小孩，也一樣若無其事地看，等到身子碰到西捕的木棍上，並且聽得連推連喝的斥道：「去，去看啥末事！」這纔猛然從夢裏驚醒似的，搔搔頭皮，悻悻然跑了開去，再去看旁的熱鬧。自己挨棍子，是從來不反抗的，因爲一反抗，就難免起衝突，自己就要被困核心，讓人家來看熱鬧了。

槍斃一個綁匪，看客總有千萬，途爲之塞。隣村失火，哭聲震天，而觀者大樂！

倘使有錢，對於熱鬧的賞鑑慾也就更強更廣。化錢的，不化錢的，凡有熱鬧，一律參加，但均以自己不會沾惹着什麼麻煩爲限。倘使有些不穩，趕緊跑回家去，戰戰兢兢的關上大門，躲起來。等危險過了，他再出來旁觀作樂。

豫西旱災嚴重，難民數萬，輾轉待斃。除了那些以「慈善」爲「事業」的紳士，誰有自動捐助一點的嗎？參觀洋人的慶祝儀式，卻早已座券賣光，旅館房間「定售一空」了。但倘使豫西的災區，可以搬到上海×世界來，公開展覽，任人參觀，則銷售門票，大抵也不成問題，愛看熱鬧的人，是不問喜慶與喪弔的。看看別人的災難，在他們也是一種娛樂，諺有之，曰：「隔岸觀火。」

而有時簡直連自己家裏的火也看。聽說瀋陽失陷，日本軍隊在街上游行示威的時候，也還有閑人（自然是中國的）張着口佇立參觀，第二天的日本報上，說是「皇軍過處，迎者夾道，盛稱帝國軍容之盛」云。

然而座券賣光了，旅館定完了，怎麼辦呢？——到馬路上「軋軋鬧猛」也好。擁擁擠擠，衝衝撞撞的大半夜，弄得滿頭大汗，然後莫明其妙的回到家裏，對老婆說道：「英國皇帝登基，人山人海，小

孩和女人軋壞了好幾個，眞正好白相得來！」

湊熱鬧

談過了「看熱鬧，」覺得還有談一談「湊熱鬧」的必要。

世有愛看熱鬧成癖者，同時還有以湊熱鬧爲生者。前者無所爲，而後者有所爲。

愛湊熱鬧的人，總是滿臉笑嘻嘻，熱心慷慨，彷彿我佛轉世似的。一些名人的宴會裏，掛着「總理遺像」的什麼集會上，我們總可以看見這些笑嘻嘻——但有時也緊張得若有其事的臉，搖來擺去，像蒼蠅一樣。

要人一下台，他們就發起開歡送會，表示依戀，歡送辭裏，說得感激零涕，眞是斯人而去，如蒼生何！但明天另一個要人剛上任，他們就又呼朋引類，執着旗子，大搖大擺的到碼頭上歡迎去了。而且還要開茶話會，對新貴人拚命拍着掌，說道我公一出，斯民之幸，眞是如大旱之得甘霖，再好也沒有了！

一邊歡送，一邊歡迎，他們就永遠這樣忙碌着。

此外則上體天意，或者慷慨激昂，開討逆之會；或者鼓舞歡欣，發擁護之電。打聽得某要人今年幾十歲，年高德劭，理應發起做壽某名流與夫人結婚已經幾年，雖然妾媵滿室，幸而德配尚未拆對，又趕緊湊上去，發起銀婚或金婚紀念。

然而這些都是高等的。中等一些的便到報上去做文章，歌功頌德。開會時到場任招待，襟上別一張綢徽，在人叢裏趕來趕去，忙得滿頭大汗。聞人演說時，拍起掌來，響聲猶如機關槍。看見同輩，笑笑，揩揩汗，又縐縐眉，察其神情，若有怨尤，而其實乃是得意。

他們什麼事情都不做，但什麼事情都有份。英皇加冕典禮之類，這些先生們沒有「職使」了，便軋到洋人隊裏去，恭而敬之，不勝神往之至的坐着，以「高等華人」的資格，躬與其盛！

他們是永遠忙碌的，主人忙，他們幫忙，湊熱鬧；主人閑，他們扯淡，做清客。金瓶梅裏的西門大官人，周圍就總環繞着這一類知趣的人物。

鶯鶯嫁人，忙的是紅娘。因爲向同輩鳴鞭，向主子湊趣，都是奴才的美德。——這有個好聽的名詞，叫做「助興。」

有了這一類善於「助興」的華胥，於是乎天下太平，民國萬歲！

人生快事

據說中國已經統一，外禦其侮的工作也將開始。新聞紙的爲用，因此也更其「大矣哉」起來。每天翻報，送給我們的都是些好消息：什麼成立紀念的「隆重典禮，」主席巡行返京的「軍樂禮砲，」以及「印象極佳」的談話之類，眞是洋洋乎一片太平景象。廿一日的上海某報上，還用整版的篇幅，登出兩位名流的少爺小姐的嘉禮特刊。

特刊開頭就是一篇闡明「人生眞正第一快事」的名文。說昔人以爲雪夜閉門讀禁書，是人生第一快事，其實那還不過是一時之快；惟有洞房春暖，美眷如花，眞個消魂以外，將來大量生產，十年生聚，以紓國難，才子佳人底下，接着就是忠臣義士，這纔眞的是樂事無涯，結婚爲最。說得讀者都飄飄然起來了。

然而仔細一想，恐怕也未必盡然。

昔人雪夜閉門所讀的禁書，大約不是唯物論，國難記；或者魯迅等左翼作家的著作，倒是把才子佳人的「嘉言懿行」描寫得比較澈底的金瓶梅肉蒲團等的所謂淫書罷？昔之儒者，雖然一樣的會性交，公然閱讀淫書，卻難免遭受物議。雪夜孤燈，重門深鎖，一卷在手，看得口涎直流，想來也的確「快哉。」但「革命成功，」世情一變，金瓶梅早經印成「珍本」發售，有些報上也日有「豔情小說」可讀，有一個時期，張競生博士編性史，開書店，登皇皇廣告，第三種水也可以從女店員手裏買到，禁書之味，早已沒有了。現在成爲「禁書」的，卻萬萬染指不得，思想自由，雖有明文；一讀禁書，即無性命。雪夜閉門，不料巡捕破關而入，翻箱倒篋的搜查一通之後，一翻白眼，喝道：「行裏去！」而看的也許祇是一份救國日報。記得香港有一位青年，因爲在箱子裏被查出一本紅封面的吶喊，曾罹殺身之禍。——今日讀禁書，「快事」云乎哉！

結婚是快樂的，但恐怕也要以名公巨紳的少爺小姐爲限。倘在窮小子，一旦結婚，就是終身重累。「半夜睡在郎身邊，半夜睡在債身邊，」這是俗語，大約也很古了，倒是今古一例地流行着。

「十年生聚，」勾踐以此復國，對的。但底下還有「十年教養。」名公巨紳記住了前一句，又沉湎於「洞房春暖」之樂。編號娶妾，論打生兒，快事既然無窮，產量也眞豐富。做起壽來，兒孫繞膝，客

人驚嘆似的打拱作揖，說道「老兄眞是福氣！」不久小姐少爺也可以嫁娶了，於是世代相沿，繼續乃祖乃宗的盛業。這倒確是頗合於中國古訓的人生觀！

大世界闔家老小跳樓自殺的是例外，因爲他們窮。

大家都說國難嚴重，這當然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可是如何自拯於危亡呢？侵略者略一鬆手，便覺天下太平，國事大有可爲，固然是可怕的自我陶醉。大家都來結婚，生娶教養，如果照現狀推究下去，照碼對折，不必十年，怕早已遭受亡國之慘了。

不過結婚畢竟是值得慶祝的事，讓我也來祝他們「百年偕老，五世其昌」罷。因爲能夠如此，總還算是「國人之福！」

名勝之國

中國的驕傲有三種：一曰地大物博；二曰開化最早；三曰風景優美，甲於全球。

這當然都是眞的，不過幅員雖廣，經不得一夜四省的揖讓，一讓兩讓，就要讓完的，所以第一條，

已經不大聽得說起。祇有第二第三兩條，還在沾沾自喜，加以發揚。前一種的表現是搬連古物和保存古蹟。至於後者，則三年以前，古物尚未搬走的北平，就有過將「文化城」闢爲「風景區」的消息。

現在是春天，鐵路上開的是遊覽專車，報紙上刊的是闊人名士遊春的消息。名勝之區，仕女如雲。中國固然是文物之邦，中華民族也的確是風雅的民族！

要人養病避暑的廬山青島，中外人士遊蹤不絕的杭州蘇州，名滿天下，不必說了。在野名流，名山拜佛，深林養晦，各處也都在大事修理，風景日有可觀。即使是窮鄉僻壤，總有幾位名士，挖空心腦想出「東山殘雪」「西江落日」一類的名目來，編成「十景」。闊老建別墅，亭臺樓閣，窮極奢華；富人造墳墓，玉砌雕欄，死人也須長眠於名山勝地。而這些別墅，這些墳墓，傳之後世，也就是各種各式的名勝和古蹟。——我們的文化！

何況山明水媚之鄉，靈秀所鍾，還可以出產如花的美女，這尤其配才子們的胃口。西施沼吳，勾踐因以復國，一直到前兩年，還有人希望西施重生，來復興中華民族。賽金花的「有辱國體，」則已經是今年開天闢地的大發見了。

倘使版圖易色，我們將如之何呢？這也不要緊。因爲河山雖然破碎，風景總是不殊。蘇州風景明信片中，日本租界的日本領事館，就被列爲當地「名勝」之一。上海的摩登文士，上舞場，喝咖啡，帶愛人在霞飛路散步之餘，還要寫成名文，禮讚那「動人」的「異國情調。」——不要緊的，將來勝景一定還要多起來，而且不必遠涉重洋，東洋西洋的「異國情調，」也都要運到中國，讓我們的名士遊覽欣賞了！

英雄的今昔

看京戲，我愛看全武行。看舊小說，我愛看俠義傳。因爲那裏面有些英雄的氣魄，逗我喜歡。

個人英雄主義要不得；可是英雄的氣度，我以爲有許多倒是很要得的。

殺人也好，放火也好，凡有行動，一律負責；連一些採花的強盜，黑夜裏侮辱了女人，也總在牆上留個記號，告訴人家這宗壞事是他做的。乾脆爽直，來清去白，不是也很率直可愛嗎？

英雄這名目，如今是被踩在腳底下了。實際呢，各種式樣的英雄是仍然存在着，不過已經不穿

夜行服，從形相上看，一律恂恂儒雅，很像紳士國裏的標準國民罷了。

自然他們也沒有從前那廢話。

劉邦做了皇帝，用不着讀書人了，說道：「乃公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倘使他生在現代，雖然依舊用手槍治國平天下，一定會自己打頭，叫學生去讀經的。倘有異端，必須加以格殺，就大抵先安排下一個叛逆的罪名，套在他的頭上。

無賴勾引女人，角逐情場，英勇得很；一打官司，就說：「她是野鷄，原是個賣淫婦」不然就說本是女的主動，有意引起了他的性慾。原來大爺還上了別人的當。

這是武的，文的英雄，做法就兩樣了。

雖然手無縛鷄之力，一封告密信，一樣的使仇頭落地，讓人家做了鬼也不明白是被誰所殺。不然就歪曲是非，筆鋒所至，誣衊隨之，這就叫做「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然而還有新發明，蘇雪林女士似的，向死人頭上噴狗血，噴得他滿面汚穢，而動不得手，開不得口。

在西班牙文豪西萬提斯的筆下，不是有過一位英雄堂·吉訶德嗎？有人說，我就是堂·吉訶

德。可是吉訶德先生向風車挑戰，是被風車捲去了的。前「車」可鑒，等風車停了，再橫槍躍馬，裝模作樣的刺過去！

敢作敢爲，是非不問，這也很近乎英雄行逕，我佩服。可是，我們的現代的英雄們，請拿出一點英雄氣概來，先洗掉親手塗在尊臉上的白粉再來罷。

高爾基氏致孫中山先生的信

在六月八日，文豪高爾基逝世週年紀念中，發現了一種對於我們極有意義的文獻，是高爾基氏生前寫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原信曾發表於高氏主編的現代雜誌上，時當公曆一九一二，中華民國建國的初年，信尾所署時間爲十月二十八。

那是一封慶祝中國革命成功的信，這樣寫着；

敬仰之孫逸仙！予俄人也，現所爭取之思想勝利與足下同，無論此種思想於何地獲勝，予之以此勝利爲幸，亦與

足下相同。予慶祝足下之美滿成功，對於足下，對於中國格爾古列士（希臘神話中之英雄——譯者註）凡屬忠誠之人，均以至意歡欣及驚異而注視足下之工作。我輩俄人所願望者，亦足下所曾獲得者也。吾人在精神上爲兄弟，在志願上爲同志；而俄國政府及其奴僕則使我人對華人處於敵對地位。吾人均係社會主義者，精誠信奉全世界將能度其兄弟生活，吾人能令貪婪魯鈍之外，推動人種仇視之發展，而成社會主義途中一黑暗而堅定之壁壘乎？反之，吾人現竭全力，以破滅我輩敵人，破滅全世界優秀人物之惡念，此種敵人欲吞沒太陽，以便更順利從事其黑暗鼴鼠事業，佈仇恨於世界，壓迫他人。我輩社會主義者，必須隨時說明，當世有政府間之仇視，不應有統治階級之貪婪所引起之民族仇恨。……（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大晚報）

最後，是要求孫中山先生寫一篇文章，論述中國人一般對於歐洲資本主義掠奪野心的態度，以及局部對於俄國資本家及當局行動所抱的態度。因爲他們可以由此聽取中國人民眞實的聲訴，而「不聽爲資本家利益服務之歐洲記者之敍述。」

眞摯，熱愛，光明博大的胸襟，對於革命的堅貞，對於全世界的正義的關懷。這一封短短的信裏，是說明了我們這位大文豪的全部人格的。

然而它卻給我們留下了感慨。

從一九一二年到現在，中國所經過的，是險惡的風波，無情的打擊。我們的「格爾古列士，」有

的升入了天堂，有的躲在黯無天日的地下室裏，還在走着他們艱苦的路程。黑暗和光明的交替，延長到一個可怕的時期。而回頭望望人家，卻早已將歷史縮短了幾個世紀，那偉大的發信者，曾經以「歡欣及驚異」注視我們的人，爲他祖國的成功，帶着勝利的微笑，瞌然長逝，也有一年之久了。

偉大的革命者，他們的靈魂是相通的，正如高氏信中所說對於彼此爭取的思想勝利的態度：「無論此種思想於何地獲勝，予之以此勝利爲幸，亦與足下相同。」孫中山先生當時是否看到這封信，看到了又曾否致復，現在我們都無從知道。但這封信的意義，不但對於目前的中國依然存在，也應當在人類的革命歷史中永久存在的。

債

現代中國的青年，是一出世就負了債的。

債的種類甚多，不但有物質的債，還有精神的債。其利率之高，又足以橫絕世界，豎盡古今。

女人生孩子，生下一個女的，老實的父親一皺眉頭，以爲自己多了一個「賠錢貨，」瞻望前途，

已經怒焉憂之起來。倘是男孩，則皆大歡喜，原來祇要這麼一來，他們就「終身有靠」了。

撫養，教育，都是放本錢。將來準備收十倍的利。生育兒女的意義，是和購置田產的作用相同的。

維護這放債制度的是一種特殊的道德。父母儘可以虐待兒女，給以種種不合理的約束；而一爲人子，卻就非犧牲自己的幸福，以奉行「孝道」不可。我們鄉間有一個無賴，不大孝順父母，有一次父子衝突，父親責問他的身子是那里來的？他一橫眼，說：「你們是成心生我的嗎？你們爲的是快活！」於是鄉黨失色，駭然走告，以爲世間出了妖孽。自然，這樣的兒子是不足爲訓的，但他說的其實倒是眞話。無賴不識字，就證明着父母並未對他盡過應盡的義務。

我們無數的「赤子」，借着高利貸，帶着傳統的重荷，剛剛成人，社會就又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向青年來收取不放本的重債了。

那是各種堂皇的名分，好聽的經文，青年對於社會的廣闊無邊的義務。

名士闊人，兼職纍纍；有靠山的坐領乾薪。倘有青年，因爲人浮於事，無業可爲，社會就來責備，不是「自甘墮落，」就是「不思上進。」倘使他替你找個職業，卻又是沒世的恩情，終身也補報不完。有錢的老人可以討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青年一談戀愛，就是寡廉鮮恥，社會笑罵，百計阻害。連我們

文壇上，新進作家的成名，也是文豪「提拔」的結果，並非因爲自己文章寫得好。

世風不古，國勢凌夷，都應由青年負責，但到青年們眞的要來改造社會，實行救國的時候，卻又全都「意志薄弱，受人利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了。

精神的負擔，物質的重壓，弄得債台高築，懦弱的青年受不起，於是先先後後地設法逃債。——逃到那里去呢？服毒，自經，跳海。

可是論客們卻又嘰嘰喳喳地來說閑話了。什麼「人生的責任」呀，「卑怯的逃避」呀，債主的逼迫，給卸得干干淨淨，臨了還加些罪名，讓死者的靈魂也帶了債去！

看錯了「病徵」

司法院副院長覃振先生在青年會演講「新中國之立法精神，」其中講到婦女參政運動，說道：

中國婦女在過去數十年，早已努力於此，但從精神上和其他國家婦運比較是遲緩而且落後的，原因不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而是由於事實上中國婦女未能免除最大病徵，即由惰性所造成的依賴性，致全國婦女消費者多，生產者不過佔百分之一……

覃先生是司法院長，這些高論又是「新中國之立法精神」中的一節，在我似的毫無法學常識的人，看起來恐怕難免不大了解。因爲中國的法學，原是十分奧妙，又富於彈性，是很不容易研究的。不過中國婦女的生活狀態，我們卻已看得很多，覺得法學家似乎未必懂得社會的醫理，例如這里所指出來的婦女的「病徵」就很有些問題。

說到女人的「依賴性」，也許有幾分眞實罷。但這卻正是男性中心社會的產物，這「性」乃是一種果，而不是因。說她們天生懶惰，是祇有在金碧輝煌的青年會的沙籠裏說說的，不然，不妨請到農村和工場去試試看，她們一定連恭聽高論的工夫都沒有。她們一天十幾小時，時時刻刻，都在拼手胝足，默默的做着苦工——生產。

然而所生產的是別人的，她們連自己也幾乎養不活。

是的，我們有不少高貴的小姐們，衣錦繡，食珍羞，一切享受，窮極奢華，而消磨青春的辦法，祇是打牌，跳舞，看戲，沉湎於愛情的游戲。也有不少的太太們，養尊處優，頤指如意，一襪之需，動輒數十金；而唯一的本領，不過是敲敲酒瓶，剪剪綵帶，做着電影明星似的嫵媚的姿勢，讓新聞記者拍幾張照而已。

但這又不是大多數的中國女性。

中國是農業國，人民中佔最多數字的就是農民。我們試到任何一角的田野間，去考察一次，會考察出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農村婦女來嗎？相反的，她們都是農村社會的生產者，家庭中沒有工資的忠實的奴隸。她們被丈夫用最低的代價娶了來，在田裏是耕耘，操作；在家裏是淘米，洗菜，從最粗重的到最瑣碎的。白天勞碌，晚上伺候丈夫，替他「傳宗接代，」生兒女。她們幾乎每一個都是這種平凡的悲劇的主角，然而自己從不覺得，她們相信運命，服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哲學。她們承認自己是依人者。

人類那有天生的奴、性的呢？這不過是幾千年封建勢力所壓成的假象。——都市裏的女工就比較進步，因爲她們和農村婦女的生活形態不同。

可是覃先生還要開方：

> 中國的法律，並未限制男女平等中國婦女要充分發揮在法律地位上所賦與的權力，必須肅清病源培養自己的能力……

自然，婦女應當培養自己的能力。可是讓我先問一問是什麼「能力」罷。生活的能力，像前面

所說的，她們何嘗沒有呀？倘指才能，孤零零的才能可不中什麼用——武則天，是有政治才能的，做過皇帝，與中國的婦女地位何補？一直到現在，連女子也在罵她是淫婦怪物。李清照，宋代的大詞人，中國文學史上佔着燦然的一頁的女作家，可是後來連自己的生活也潦倒不堪，「猥以桑榆之晚境，配此駔儈之下材，」中年再嫁，不料遇人不淑，要「依賴」男人都很難。祇留下「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一類的幽怨的詞章，讓我們多愁善感的佳人們，低徊吟誦。

教育，是重要的，但爲的是用這催大家醒過來，來爭取最後的勝利。倘令大家各自「培養自己的能力，」即使培養成功，一個個都做了「女界偉人，」也沒有什麼用處。——婦女運動的歷史，已經有了許多年，但直到現在，還是動不出什麼端倪。原因呢，老話一句：婦女問題是附庸於整個社會問題的，後者無法解決，前者也就懸空。

祇有把婦女運動和政治運動的主流配合起來，這才是最正確的路線。——譬如現在，婦女運動主要的課題，就應該是抗戰建國。至於對女性的個別的看法，我以爲如其多幾個嬌怯多愁的女才子，還不如多幾個有女性自覺的叛逆者好。祇要看看目前的社會裏，男子玩弄女性，從來不以爲異；偶然發見一個對男人負情的女子，就有「前進」的輿論家來舉起義旗，對她大肆攻擊的情形，

就知道男性社會所需要的是怎樣的角色；反過來，也可以知道婦女運動中是需要怎樣的女性了。

哀調

時局是沉悶的，看看報紙，卻常有些五色斑爛的壯語，看得你頭昏。

自然，主張抗戰是一致的了。前幾回「國難嚴重」的時候，還明明暗暗的主張「和平，」反對「犧牲，」勸國人學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胡適博士還叫大家靜待五十年。可是這一回，連「文化城」的北平和天津都淪陷了，我們再照老樣子，「臥」下去，「嘗」下去，直到四十五六年以後再抵抗嗎？

這可眞的不成功了。因爲小百姓雖然不懂兵法，卻知道當前國勢的危急，倘不抗戰，就要滅亡。適應這種民氣的，是許許多多的壯語。——要抗敵，當然非壯懷激烈不可；但有許多壯過了頭的論調，卻常常會盡了相反的任務，若加以抽筋剝皮，細細推敲一下，就會發覺，那底子其實倒是變相的哀調。

比方前天，日大使川越南下，和平空氣又有點濃起來了，報紙上記載外交部發言人對於談判的態度說：「現在局勢雖極度緊張，然中日外交當局，在兩國國交依然存續之際，本可隨時商談，惟兩國關係，刻已至最險惡時期……倘彼方果以最大之決心與努力，挽回危局，尚未爲晚，否則和平前途，殊難見有曙光也。」一聽，口氣硬得很，彷彿彼方在向我們委曲求全，要求和平，而我們不答應。但實際是相反的，彼方的「最大之決心與努力，」早已用在兵力上了，到現在還想和平談判以挽回危局的倒是我們，實際上可憐得很。

說到抗戰，從前的壯語叫做「敵軍所至，抵抗隨之。」那是要到人家攻了進來以後，我們再到後面去抵抗。現在卻更壯烈，變成「敵軍所至，焦土隨之。」——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死盡燒絕，地老天荒，使他們毫無所得。

這眞是「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切齒之聲，儼若可聞了。悲壯而激昂，論客謂之曰「沈痛。」然而仔細一想，卻又令人毛骨悚然。原來中國的抵抗力竟薄弱到這步田地，一打起來，就非使這「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全部化爲灰，而毫無勝利的希望嗎？這樣的壯語，我恐怕有些膽小的人們聽了，是要因此油然而生和平之想的。

然而事實並不這樣，世界上有被滅亡的民族，卻並無這樣燒焦的國家的。

叫大家決心犧牲，是一種壯懷。但犧牲豈不爲了求存？爲了民族的獨立自由的希望？一面宣布對於勝利的絕望，一面又叫大家準備變灰，這種「爲犧牲而犧牲」的絕叫，祇是一種十足的哀調。它不是什麼沉痛，乃是無底的陰黯。

在全國一心準備抗戰之際，鼓動和激勵是要的，但我們不怕犧牲，爲的是最後的勝利。那些哀調式的壯語，卻正是糖衣的毒藥，讓我們把它掃進垃圾桶裏去罷。

過去未來

北平曾經要被稱爲文化城，劃作風景區，都沒有實現，如今卻已實實在在，和天津一起，變成「特殊區」了。

在一張報紙上，最近已經看到了題作「憶北平」的風景畫。自然，這畫裏有很多的感慨。——但幸而古物是早就南下了的，老百姓呢，既不關東方文化，也不是故宮寶物，所以北平的好像除了

做奴隸，還沒有什麼，天津方面，卻正在受日本軍隊痛快淋漓的殺戮。祇是北平的山水宮殿，搬不了無從保存，令人徒與「山河易色」之感，實在可惜得很！

然而大人先生們卻還無暇感慨。他們正在忙着做論說體的宣言，和結算舊賬。

而算賬的結果，收支相抵，又非常合算。——因爲「九·一八」雖則失去了東三省，「號召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工作，卻開了頭。「一·二八」雖則訂了淞滬協定，但「安內」的軍事卻發動了……總而言之，我們都很值得。

眼前平津這一筆賬，照例是要幾年以後再算的。

把新賬的大漏洞擱下，翻出一場糊塗的舊賬簿，加敍理由，添註說明，向大家公布出業已無法挽回的賬目，作爲盈餘，這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會計學！——這以外，民間卻又有神妙莫測的預算法。

這就是「推背圖」一類古已有之的預言。

「中國二千年之預言！」某報已經登出廣告來了：「一切世界大事之關於中國國家之變故；冥冥之中均有定數，我國歷代名哲如呂望（卽姜子牙）諸葛亮劉伯溫輩，所發預言，事後句句應

驗，此種哲學，實爲我華夏四千餘年文化之最大結晶……」所以，祇要「讀者有若干智慧，」一看這本奇書，未來的賬，就可以預先推算出來了。——但其實是預算不出的，和前面的追算法一樣，要到事後才可以牽強附會的算出來。

「追算法」告訴我們的，是吃虧就是便宜。「推算法」告訴我們的，是一切都是命定，天數如此，不可強求。

常常想想過去，我們曾經有什麼錯誤，以致形成目前的局面？再想想將來，應當怎麼糾正已往的過失，愼重未來，免爲亡國之民，這是好的。平時把眼光老對着自己的白白的鼻尖，事情一急，這才想起過去和未來：算花言巧語的舊賬，獻糊塗透頂的預言，性質雖不同，卻祇是一樣的愚民的妙策！

他們的目的，是要使人們忘卻現在。

禁書詩話

廿六年七月廿二日，報載蘆溝橋事件談判告成，我方遵約撤兵，日方增運軍火，「和平」有望，

而舉國同悲。

廿三日申報載天津專電：

津郵局自十八日起爲日軍派人駐局檢查信件，該局曾分別報告中央及地方當局。市醫局長李文田迭次與日軍部交涉後，已得橋本藤井諒解，二十二日下午四時，駐郵局檢查之日人，已奉令撤回，不再檢查。

同日新聞報又載北平電：

綏署頃查禁市內各書店經售大批刊物，計有華北呼聲、東北智識、抗日戰線、抗日將軍、抗敵生活、國際智識、民衆之路、救國文選、讀書生活、中國人、中國呼聲、三民月刊、桂林月刊　等六十餘種，已令警局禁止發售。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你們既然准予停止檢查郵件，辱承「諒解」，我們自當嚴行禁售刊物，以示「親善」。你不查，我來禁，「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我們原是同文同種，十分親愛的「東亞兩大民族」呀！

盛事無邊，國家何幸！謹獻歪詩，以爲歌頌云：

蘆溝橋畔血痕殷，文化城中笑臉迎，誰說開門爲揖盜，將軍酷愛是和平。

綏署皇皇禁令申，無辜書報苦沉淪，滿城風雨文字劫，一片投桃報李心。

莫道神州大陸沈，中華國土廣無倫。祇憐無定河邊月，千古長明壯士魂！

算舊賬

對日本，我們正在結算六十年來的血賬；但在國內，大家卻以爲一切舊賬，都應該從此擱起，不必再算。因爲我們目前是正在一團和氣，共赴國難。

於是洋場小醜，市井流氓，搖身一變，都化爲愛國志士，熙熙攘攘，到「愛國」的新事業上施展身手去了。結果是借救國之名，作營私之實，弄得烏烟瘴氣，完結拉倒而後已。——有一位無線電播音台的經理，不是在播音募捐之後，傷兵和難民還未得到救濟，而自己已經發了橫財嗎？（後來可惜被正法了。）這不過是一個小例。

現實是冷酷的，它並不講情面。從前我們所有的賬，或虧或盈，都一筆不苟地掛着。民衆沒有組織，是因爲一向壓得太緊，目前也還不肯盡量放鬆；華北戰事失利，乃是過去政治上所種的因；今日的狗苟蠅營之輩，也不過是舊瘡中的新蛆。我們不要算賬，事實卻已經代爲結出來了。

章乃器先生從蘇州看守所被解放到上海，新聞記者問他的感想，說：「無此閑情算舊賬，有腔

熱血效前驅。」這正是壯士胸襟，值得感佩的。但我想：共赴國難，一定不包括漢奸奴才在內；一致對外奮鬪的時候，也不該忘記出清舊有的渣滓。因爲時代雖在進步，卻並不能劃然截分兩段，寬容漢奸奴才，包涵沉滓毒菌，這乃是自趨絕境。

還有更重要的意義：我們的抗戰，抵禦橫暴，最終的目的是在求中國的自由，獨立，光大；我們現在是正在做破壞舊中國的工作；新社會的建立雖在未來，卻不能不在破壞中有所準備。除舊不淨，也就難於澈底布新，用商業上的術語說來，這叫做「舊賬未清，免開尊口。」

自然，一切漢奸或準漢奸以外的人，在對外的立場上，應當絕對一致。凡有在這時候，還在暗暗的主張自相殘殺，排除異己；或則假公濟私，報復私怨的，就都是民族的罪人，不足以與言救國的！

一個高大的背影

這是聶紺弩先生的詩——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那走在前頭的，
那高擎着倔強的火把的，
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着歌的，
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
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是作爲魯迅先生逝世週月祭而唱出的悲涼的聲音，到現在已經將及兩年了。我們仍然行進着，在深得沒有邊沿的暗夜，冒着襲來的風雨。響亮的歌聲消散了，走在最前頭的「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去了，然而他留下了他的火把——那永明不滅的火把。歌聲的消散使我們寂寞，領頭的「高大的背影」的倒下，使我們鼓舞的心變得荒涼；但火把仍然照澈無邊的暗夜，我們仍然在行進着。

「高大的背影」是永遠站着的，因爲他已經哺育了無數年輕的戰士，而且替我們指出了向光明的路。

那就是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醜惡的堅韌的戰鬪。

從這老大民族的昏夢中覺醒，從千百年淤積的泥潭裏翻過身來，我們的巨人，魯迅先生，一開頭就以舊社會的叛徒的姿態，在空漠中喊出響震林谷的聲音。他用着他鋼鐵似的筆觸，烈火似的憎恨，開始向「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他攻打封建的軍閥，官僚，封建奉仕者的學者名流，正人君子，他唾棄革命販子，豪門淸客，在一些無恥的造謠中傷，陰謀迫害中，一直戰鬪到死。他勇敢得像三國志裏的許褚，可是他從不赤膊上陣，勇於戰鬪而又懂得戰術，受傷了，自己默默的忍受，還沒有養好傷，又上了陣，使一切敵人在他面前驚惶失措。

但剛從淤積的泥潭裏被叫醒過來的人，是有些麻木的，看着他對敵人的嚴冷與無情，大家就對他也有些戰戰兢兢，以爲這是一個冷酷的老人。

然而他的心裏卻是一團灼熱的火，他普遍的施人間以智慧，以光明，以溫暖；卽使對於敵人，下手的輕重也大有分別，決不肯因爲自己的無敵，一律加以格殺。「無情未必眞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眞正的民族的戰士，也總是最洞切人情的人。

強烈憎恨源於灼熱的愛，而這愛又像落地的水銀，無孔不入。遠在我們的「民族文學家」怪聲喝采，贊美成吉思汗征服斡羅斯，（這些「家」們曾經在上海活躍了好幾年，而現在有許多都

「過橋」去了）指斥左翼作家賣國之際，魯迅先生卻早在日本留學的時候（那時他祇二十三歲）唱出了這樣的詩句：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而且這三十年來，他就一直實踐着這誓言，「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流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爲快樂。」我們這些年輕的人，就都曾受他這一滴一滴的血所滋養。現在哺養我們的人，雖然已經由瘦弱而至於倒下，但我們，卻已經堅強地站了起來，在爭取這巨人所一直希望着的「將來」了。

路是分明的：這就是堅韌不屈的鬬爭。在這樣堅苦的時代，有誰明明暗暗，主張跟敵人妥協，對醜惡寬容的嗎？假如有，他就是民族的罪人，也就是我們的鬬爭的對象。

這里，我也還是來抄一節聶紺弩先生的詩，來作我這篇脆弱的悼文的結尾罷——

安息吧，親愛的朋友！
永別了，人民底同志！

我們要從你底屍身上走過，
踏着你底肉和骨和血，
踏着你指引過的路，
用我們底眼淚，
用我們底歌聲，
用我們底脚印，
造成你底墳墓，
願你底英靈永遠和我們同在！

焦土上的新芽

在日軍的轟炸與燒殺之下，犧牲最慘烈的，是民衆；最浩大的，是文化。——焚燬之餘，劫掠之外，還要肆意的糟蹋：

日軍厭爲北大至深　對於該校文物，摧殘最甚，圖書木器，俱作燃料；研究院考古學會室外之石刻造像漢磚等品，均作拴馬之用，殘碎支離，十無一完；室內玉器銅器等珍品，不遭攜毀，即被盜賣，繆氏珍藏藝風堂古今金石文字拓本，

於大雨傾盆中，爲敵日軍拋置戶外，尤爲痛心！（九月十八日文匯報北平文化界之浩劫）

北大是北方的最高學府，趙家樓的狂潮，「一二·九」的怒吼，又是中國學生愛國運動的發祥地，遭逢惡運，正也無怪其然。但回答這一切卑劣的暴行的，不是惋惜，不是悲嘆，而是沈重的憤怒，堅決的反抗。

雖然少數無恥的文人，也用了一支筆，在出賣着民族，出賣着他們的祖宗和兒孫，但更多的卻是風骨嶒崢的鬬士。我們有着陷身虎穴，寧肯淪爲販夫，和飢寒搏鬬，而不願代敵人施行奴化教育的教員；我們也有着一面參加軍伍，一面仍然以他們悲涼激越的心情，在一燈如豆之下，寫出莊嚴無比的聲音，傳達給讀者的作家；我們還有着無數胼手胝足，在萬分的窘境中默默地耕耘着的文化工作者。……

而廢墟之間，焦土之上，也就怒茁了文化的新芽。

以鉅大的人力和物力完成的魯迅全集，奇蹟似的出現了，而且不上兩月，已經在再版；瞿秋白氏的遺作亂彈及其它，也早以堂皇的巨帙問世：這兩塊豐碑的樹立，卻在劫灰零落的上海。足以爲思想界療饑的，我們還有着資本論和列寧選集。……

自然，這一面是說明了政治環境的轉變和進步，一面卻是給予侵略者的鋼鐵一樣的答復：中國的文化是不可毀滅的！——禁錮和壓殺，正在走着完結和墮落的路的，倒是法西斯國家文化的必然的運命！

蛆蟲的蠕動，蒼蠅的嚶嗡，不過是昏亂中的一團黑影而已。

蔡若虹先生有過一幅畫，畫着一個被日本空軍謀死了的婦人，僵臥地上，她的孩子被沒有炸着，卻還爬在已死的母親的胸前吃奶，而吸進去的祇是母親的血。——大概還有些微溫罷？——畫題就叫做「血的哺養。」記不清在什麼小說裏，也曾看到過相似的事實，那是因爲饑饉，母親沒有乳汁，咬破指尖，當作乳頭讓孩子吸着。而這次廣州的大轟炸中，就的確有着孕婦被炸碎肚皮，血肉狼藉，死去了，卻留下胎兒延續着她的生命的事。我們被摧殘的文化，也正由無數已死未死的民衆和文化人，用血哺養着，大踏步走向成長和璀燦的前途。

祇有專門扯淡的空頭，留下來的永遠是一頁空白！

後記

這里所收的雜文，大都是舊稿。開頭三篇，作於一九三六；看熱鬧以下八篇，作於次年春夏之交；哀調等三篇，作於「七・七」後，「八・一三」前；算舊賬作於上海抗戰中；祇有後面兩篇，算是去年十月以後的新作。

近年來，我曾寫過些雜感短評之類，那動機，有時因爲不慣沉默，有時因爲朋友們的催索，還有一種原因，卻由於當時雜文正受着奚落和夾擊，自己喜歡它，覺得不甘，偏要來寫它一點。但自知之明是有的，觀察膚淺，見解庸俗，再加上筆墨的不服驅遣，文章當然寫不好。偷空寫下，撈些稿費，本沒有要再「浪費」一次排印工的「企圖」，這一回的決定再「混進文壇」，在幾位前輩和朋友中間，打打邊鼓，卻祇因自覺還無傷大體的一點私心：替自己留個紀念，並非眞的想「捧住袍角，一同昇天」，如深通此中三昧的先生們所說所爲者也。

但我也曾經很躊躇，抗戰以來，早已時移勢遷，把這樣的文字印出來，對於讀者，能幸而不至於

有壞影響嗎？然而又想，我們確曾有過這樣的時代，無須掩飾，也無從掩飾。目前有些政治販，塗白了鼻子，又以「戰爭經年，萬民疾苦」爲辭，來歪曲眞理，淆惑人心，以售其「和平」之計了。是的，戰爭是痛苦的，但它的報償是自由和平——這纔是眞的和平——的新中國，而緊跟在妥協後面的卻是滅亡。「八・一三」以前我們的苦悶，彷徨，以及渴待抗戰和解放的焦灼，這里都還留着分明的影子，現在從新來體味一下，也許不算是毫無意思的事罷。

我的雜文原不止這些。許多不宜於目前發表的，都剔去了。此外除與抗戰有關者，自以爲凡所譏評，雖在今日，仍然不算是「落空」的，便讓它們留着。例如看熱鬧的閑人之多，直到上海淪陷，日軍作「勝利大游行」的時候，也還呈着「觀者塞途」的奇景。但高爾基氏致孫中山先生的信，目的卻祇在保存文獻。使我不禁感慨，而且想特別說明的是，哀調和過去未來，所指摘的都是汪精衞「老爺」的言論；招牌文化末了兩段所描摹，則是幾位「文學家」的嘴臉，如今有兩位就在虹口開店和做「官」，還念念不忘於把上海的電影界拖進火坑。年光也眞是不留情面，曾幾何時，這些看起來白白胖胖，文文雅雅的冷血東西，就都露出毛茸茸的本相來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於上海望江樓，柯靈記。